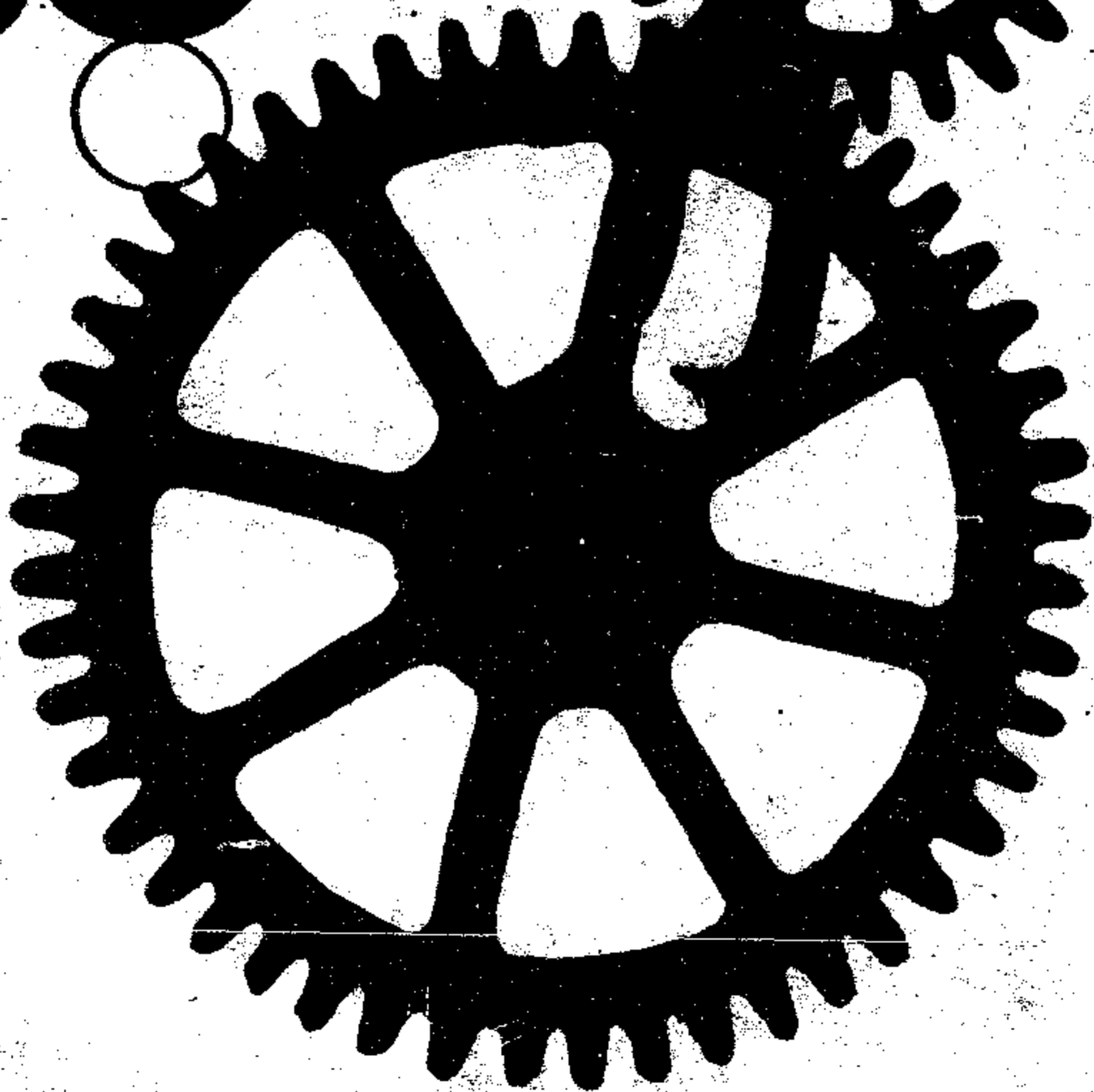


Der Mo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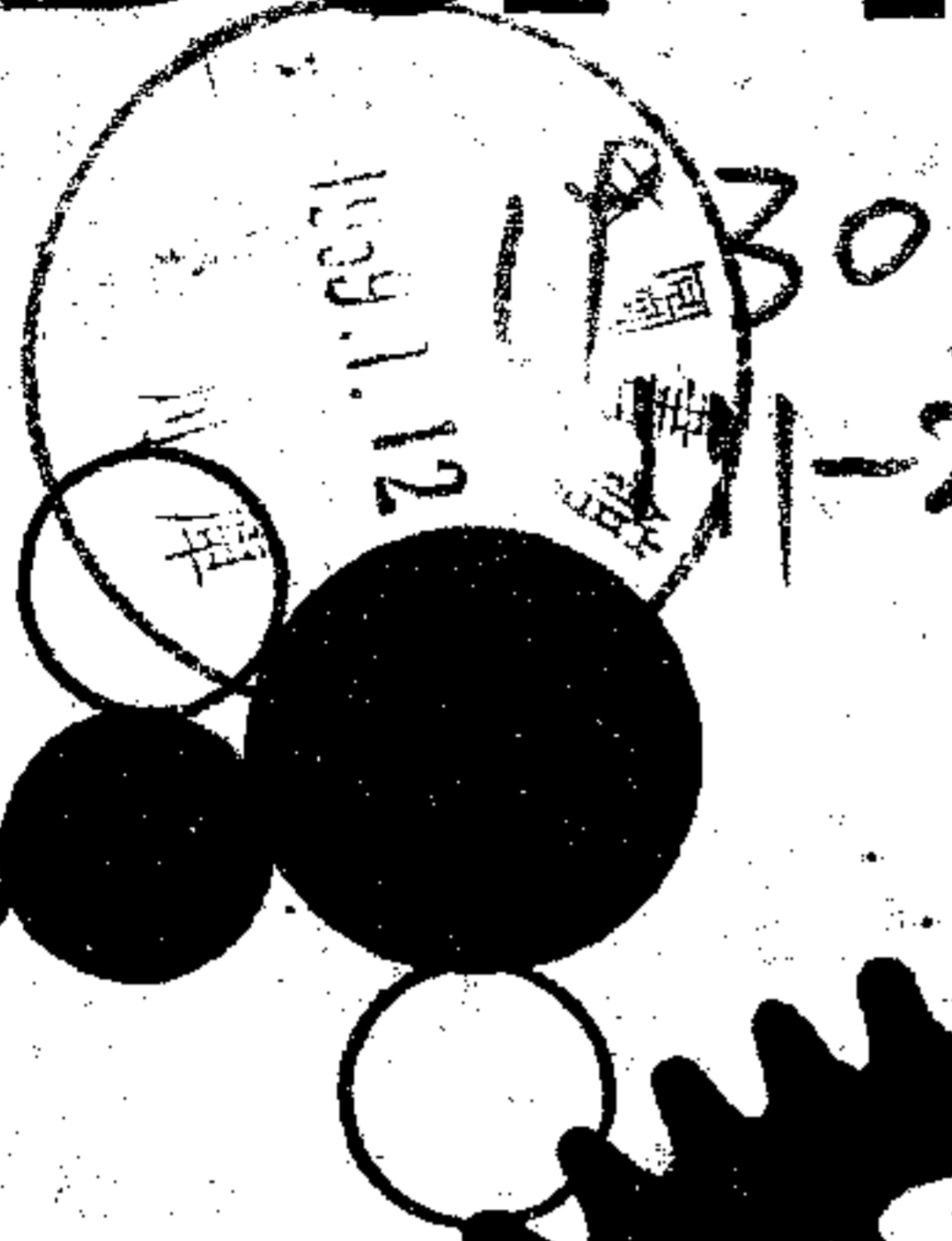
動機



第一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動力



第一卷第一期

周鯁生教授著

國立武漢大學教本

國際政治概論

不日出版

詳細說明在下期本刊披露

不僅是絕佳的教本，而且是最好的參考用書！

目 次

開場白

- 機械的唯物論與布哈林.....吳西岑
- 蘇聯五年來之哲學論戰.....彭葦秋
- 黑格爾哲學的歷史意義(樸列哈諾夫著).....魏芝譯
- 康德, 荻茨根, 馬赫與歷史的唯物論(德國墨林著).....葦森譯
-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 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 嚴靈峯
- 壟斷資本主義與經濟學(阿特拉斯著).....彭葦秋譯
- 馬克思價值論的基點及其與李嘉圖學說之區別.....
-(盧彬(Rubin)著).....代青譯
- 普羅文化與普羅藝術(托洛斯基著).....迅雷譯
- 藝術斷片談(馬克思著).....劍青譯
- 馬克思及其夫人的疾病與死亡.....季子譯
- 馬克思給古蓋爾曼的信.....



開 場 白

我們相信歷史的車輪是往前進的，但是必須有適當的“動力”。

自然，歸根究底說來，歷史的動力乃是一定時代的新生產力及代表該時代新生產力之新的階級；但是從另一方面說，新的“*Ideologie*”亦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實動力之一。所以“沒有革命的理論便不能有革命的行動”。

現在中國的思想界似乎帶着新的元素而活動起來了，新的*Ideologie*已在萌芽而開展了，自然這不是偶然的，自有其社會“內在”的原因。但是同時新的紊亂和曲解亦正在隨着而來，例如：人們表面上高呼擁護“辯證唯物論”，而暗地裏却是有意無意地發揮其各種各樣的修正論調，特別是“機械論”；人們表面上高呼擁護“普羅文化”或“普羅文藝”，而實際上賣的却是各種各樣的“小市民”的貨色。這樣的“魚目



A962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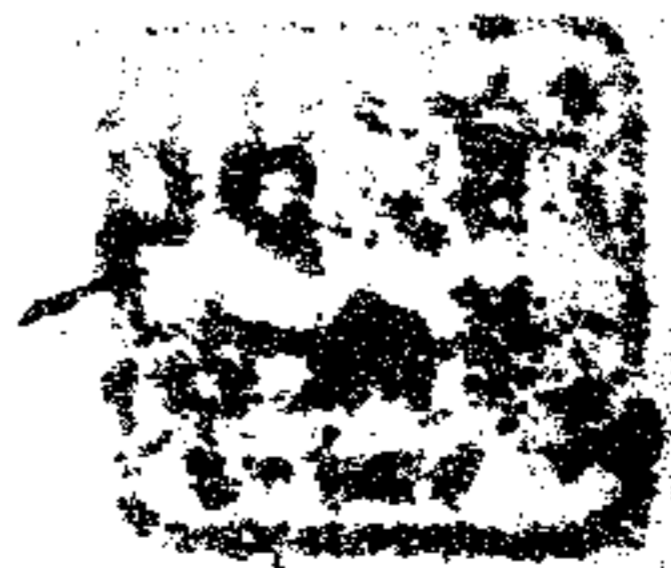
混珠”難道不障礙歷史的前進嗎？

我們希望我們的“動力”能夠作到“名副其實”的地位，能夠盡到牠推動歷史前進的使命；自然首先要“清除道路”，掃除歷史的障礙物；因此我們的主要精神是在“批評”，因為批評乃是“撥開雲霧見青天”之唯一手段，當然也要努力於“建設”，但是真正的建設只有從不斷的嚴格的批評中才能創造出來。自然，“批評的武器決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評，物質的武力必須由物質的武力去破壞”，但是“理論一經抓住羣衆，也會變成物質的武器”。

最後，我們希望：“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導”！！

22,3,1930.

202302



機械的唯物論與布哈林

吳西岑

“辯證唯物論”這個名詞，近年來已成為中國思想界一個最流行的時髦名詞了。治社會科學的人，無論懂與不懂，總喜歡生吞活剝的把這個時髦商標貼在自己的貨色上，以求兜攬顧客。一年以來，這種斷爛不全，錯謬百出的介紹唯物史觀的書籍，在市場上簡直像雨後春筍般的怒茁出來。這種烏煙瘴氣籠罩着中國的思想界，實是新思想運動前途的一大障害。

固然，除了這些冒牌牟利的著作而外，另外也還有幾部可讀的譯書。然而這些著作中，又每每包藏有很多嚴重的錯誤，却被人們“囫圇吞棗”的介紹過來。只是因為著者在國際

思想界的權威很大，他們的錯誤更易被讀者毫無判別的承受下來。比方布哈林的“唯物史觀理論”(註一)便是一例。

這本著作，平心而論，確有許多優點：它那獨創的說明體系，它那深入淺出的說理以及通俗化的成功，都在在使得該書有征服讀者的魔力。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對於這本書中所包含的錯誤——而且是主要的錯誤，不能不公開的指摘出來。

我們可以說，布氏這種理論上的錯誤，和他後來政治上的錯誤，都是有連帶關係的。當尼古拉·李甯看過這本書的手稿時，便曾批評他沒有徹底了解辯證法(註二)，而這一點恰是他後來一切錯誤的總根源。他在這本書中，雖把許多牛鬼蛇神的唯心論的理論從前門趕了出去，然而同時却又從後門中放進了一些機械唯物論的觀點，而這些觀點，在某種程度講來，恰又是十八世紀機械唯物論的還原(註三)。

(註一) Bakharin: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中文已有兩種譯本出版。

(註二) “在馬克斯主義旗幟之下”雜誌中，曾有一文提及此點，卷數及篇名已忘。

(註三) 比方在該書第三章中，他竟把人的有機體與鐘錶的機械體相提并論，這簡直是拉美德梨(J. O. de La Matrié) “人機器”說的還原。

本來辯證唯物論的學說，馬克思和昂格斯都沒有留下有系統的專著。昂格斯在他將死之前曾經說過，他們在這一方面還僅只是完成了初步的工作，系統的發揮，尚有待於後學。不過這一學說的堅實基礎，在馬·昂二氏的許多主要著作中，確是已經切實築成了的。此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曾有許多人在這個基礎上有過很好的建樹——尤其是樸列哈諾甫和尼大拉·李甯等在這一方面和努力，特別值得我們在此地指出。

樸列哈諾甫對於辯證唯物論這一新方法的運用和發揮，真可以說是精當絕倫！他亦有像黑智兒般的天才，把這一新的方法運用到各門學問的領域中去。例如：宗教，藝術，倫理等等，都經他繼承馬·昂二氏的餘緒，一一投擲以新的批評之光。他那深刻而又博洽的頭腦，他那銳利的筆鋒，確能在哲學上將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大敵攻倒——雖然在實際政治上，他自己後來却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雖能光焰萬丈的將反動哲學的氣燄壓將下去，然在馬克思主義者的營壘當中，却同時又產生許多不同的錯誤傾向。有人企圖以新康德主義和馬赫學說來修正，補充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更有人企圖以機械唯物論的觀點來替代辯證唯物論的學說。這些傾向，其危險蓋十倍於敵人攻擊論調所生的效果。

樸列哈諾甫在這一點上便不及李甯見得那樣格外真切。比方當布格丹諾夫和盧那卡爾斯基(註四)等發揮其經驗批評論的學說時，樸列哈諾甫雖亦曾積極加以批評(註五)，然却不肯出之以具體而堅決的鬥爭態度(註六)。李甯對於這些錯誤的傾向，態度便迥然不同。他在一九〇七——〇八年這個反動時期，著成了一部“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卒奠定辯證唯物論的基礎并給經驗批評派以致命的打擊。

經驗批評論——實際上是變像的唯心論——雖然經樸列哈諾甫和李甯等將它攻倒了，然而相反的一種錯誤傾向却又隨之而發生——這便是機械唯物論的傾向。這種傾向，一樣足以阻礙我們正確接受辯證唯物論的觀點。

當然，這一派的機械唯物論和十八世紀的機械唯物論是有某種程度的不同的。昂格斯在“費爾巴赫”一書中曾經指出，造成十八世紀機械唯物論的褊狹性，有兩個主要的原因：其一，由於當時許多重要的科學(如生物學，化學等)還剛在萌芽時期，而比較發達的只有天文學和算學。因此，當

(註四)一直到現在，他在文藝理論方面還時常發揮他的二元論的觀點。

(註五)見 *Materialism Militans* 一書，中文已有譯本。

(註六)見英譯「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德波林序言中所引李甯致哥爾基的信。

時的唯物論者只能呆板的拿機械學的規律去解釋一切化學性和有機性的過程；其二，由於太陽系和地球進化的歷史，在當時還未爲人所知（康德發表星雲說尙是較後的事），他們自然不能應用歷史進化的眼光來看取一切（註七）。現代的機械唯物論者則在另一種環境之下。蓋近代自然科學之進步，已迥非十八世紀之比，他們已能從近代科學中取得歷史進化的眼光，并習知有機體另有其特殊的發展公律。然只是如此還不足以幫助他們完全擺脫機械論的影響。因爲近代科學的許多新發見，雖往往足以證明辯證法的真理，然而近代科學自身，還遠沒有走到自覺的運用辯證法觀點的坦途上去。一般講來，近代自然科學的理論，還是保留有很多機械論的色彩。一般科學家雖然已經具有漸變的進化的觀點，然每將突變的現象看作偶然的例外的情形。比方他們固然知道物質的高級形態和低級形態，通是由不同量的原子電子組織而成，而高級形態又通是由低級形態進化而來的。于是便以爲研究任何物體，只須從他的物理化學過程來加以研究，卒種下新的機械論的根源。他們簡單以爲各種不同的“質”，乃是從或多或寡的“量”的轉變而來，因此乃只從“量”的或多或寡來說明一切。而不知“量”的變化會產生新

（註七）見英譯本“Feuerbach” P. 65.66. 中文本已由林超真先生譯出。

的“質”，此新的“質”的運動規律與特性，和那構成它的舊有的“質”，其特性及其運動規律已截然不同。原子固由電子組合而成，然從電子中決找不出原子所具有的物理化學的特性。有機體是由定量原子組合而成的，同樣有機體的一切特性也決不能從原子中找出。推而至於人類社會雖係由單個的人組織而成，然從單個的人的生活中，亦決不能找出社會生活發展的一般規律。由此可知，我們絕不能從低級形態物質組合的運動規律中，用形式邏輯的推論方法來找出較高形態物質組合的運動規律。近代自然科學家每不能認清這個關節，他們不是過於重視解析解剖的方法，走到機械論方面去，便是過於尊重他們唯心的抽象力，走到活力論 (Vitalism) 方面去。

現代唯物論者苟不能擺脫這種機械觀的影響，而以爲辯證法乃是黑智兒哲學之特殊產物，反欲從自然科學中吸收其機械論的精華以“彌補辯證法之唯心的缺憾”，其結果不唯將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領導到錯路上去，並且使近代自然科學會陷入無出路的深淵。因爲近代自然科學一般的發展，已達到一個新的階段，在它的前面已提出許多新問題等待解答。故現代科學如不採用辯證的方法則更不能前進一步。舉例來說，比方在生物學方面生命發生的問題，不是舊的機械論所可以圓滿回答的，於是生物學家只好提出活力

論來解答這個問題。德國的科學家杜里舒（他前幾年曾經來華講演過）便是一個著名的代表。實則所謂“活力”只是變像的“靈魂”，這個假設一提出來，於是進一步的科學研究便失去一切的意義了！

機械論的觀點既是不能適應新科學發展的需要，而同時又足以減弱辯證唯物論的正確性，所以我們絕不能聽任這觀種點在我們自己營壘中自由發展起來。布哈林在“唯物史觀理論”一書中所摻入的非辯證的觀點，雖不足為機械唯物論者主要理論的代表，然因其更易矇混辯證唯物論之實質，故我們不能不首先辭而闕之。

二

布哈林在說明“辯證法”的主要內容時，自然不會也不敢公開的鬧出什麼嚴重的錯誤；但當他把辯證法的觀點具體運用到實際問題上面去的時候，他便不由不露出機械論者的本來面目。關於布氏最實質的錯誤問題，我們且把它留在後面再說；現在且先將他在說明辯證法基本公律時所犯的枝節錯誤，在此地指出。我們認為布氏在這一方面雖只是犯了一些細小的錯誤，然亦值得指出，因為從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布氏實在是不願精確了解辯證法的實質。

什麼是辯證法 (Dialectics)? 我們可以簡單回答說, 辯證法乃是動的矛盾的邏輯, 藉此邏輯可以使我們構成正確的, 科學的, 與形而上學截然不同的認識論, 可以使我們的智識切合於自然界和社會中之真實的實際。昂格斯曾經說過:

“形體絕不能與運動分開。形體的式態只有從運動中去認識。拋開了運動, 拋開了對他種形體的繁複關係, 便別無形體可言……對各種運動形式的認識亦即是對形體的認識。” (見一八七三年五月三十日昂格斯致馬克思的信札。)

可見動的法則, 矛盾互鬥的法則乃是宇宙間一切現象的基本法則。既是一切形體都在不斷的流變過程中, 則我們自然亦只有採用動的邏輯, 從動態中去認識一切事物之實際。辯證法便是這樣一種科學認識的工具。

唯歷來的機械論者, 從不了解也不願意深切了解這一新科學工具的作用和意義。他們不是把辯證法看作一種詭辯 (Sophism) 便是把它看作一種折衷學說 (Ecticism)。便連布哈林也故意對於辯證法隨便加上一些不正確的解釋。

布哈林在說明辯證觀念之歷史起源時, 便已悄悄地把辯證法的觀點染上一些折衷主義的氣息。比方他說:

“辯證法一語, 在古希臘係指談話與辯論的技術而

言。當人們意見互相衝突時，是怎樣的進行辯論呢？甲執一端，而乙則另執一端以難之（“他否定”甲所講的事）。最後，“從爭論中產出真理”，而此真理則包含甲和乙的真理的各一部份（綜合）。”（註八）

辯證法的觀念是不是這樣產生出來的呢？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哥列夫（Goreff）在一篇文章中便已曾指摘過他的錯誤。真的，假使二人互相爭論，甲說“是”，乙說“不是”，這樣爭論下去，縱使爭論到世界的末日，也許還不會得到一個結果。而且照他這樣說法，真理只是發生在調和折衷之中，只要把甲乙兩方的衝突意見，調和起來，便可以產生真理。而這種折衷說調和說之產生，亦便是“辯證法”觀念之產生。其實這種論調，與辯證法觀念真是絲毫也沒有共同的地方！我們且舉個實例來說。比方甲乙二人互爭一個哲學上的問題：甲主張宇宙的最初起源是“心”，乙則以為“物”是最初的起源，從這種方式的爭論中能夠產生什麼真理呢？這“包含甲和乙的真理的各一部份”的真理，又是什麼真理呢？是折衷主義的“真理”，是二元論的“真理”。這種爭辯的結果，只是折衷主義之戰勝，毫不足以拿來說明辯證法的過程。所以布哈林以上的一段話，若果是想拿來說明“折衷”概念之產生，那倒十分精當；若果以為辯證法的概念也是這樣產生

（註八）見“唯物史觀理論”原文第七五頁。

的，那便有點荒誕無稽了。

辯證法的概念係由論爭而來，這是不錯的。然這種概念之發生，却是由於在辯論時要搜求對方論證內在的矛盾，以攻倒對方的論理。簡單你說“是”我說“否”，這樣爭論下去產生不出什麼結果；如果你從對方的“是”中，找出它的內部矛盾，并依着這矛盾點推論下去，自然會使對方得到一個他所不願意得到的矛盾的結論。而這種從對方論證中尋出其內部矛盾的論爭邏輯，便是最早的辯證法，故辯證法亦有矛盾邏輯之稱。在形式邏輯中，“是”只能說“是”，“否”只能說“否”（是——是，否——否），而在矛盾邏輯中却可以回答一個問題說“亦是亦否”，因為每一個命題之中常包含有矛盾的兩面。古希臘人亦便常利用這一點以攻倒他的論敵。

“辯證法”這個名詞的正確來源，大略如此。

布哈林對於“辯證法”這一概念之歷史起源的說明，其錯誤甚顯，我們可以不多置論。現在且進而批評其不了解近代辯證唯物論的地方。

辯證法一向本被視為解釋思辯發展過程之總公律，黑智兒便把這個公律和他的絕對意像說聯綴起來，以形成其辯證唯心論的系統。直到馬克思才糾正了黑智兒“首尾倒置”的錯誤，“於是，辯證法乃變成了研究真實世界和人類思想之一般規律的科學”（昂格斯語）。

唯物的辯證法，其基本公律有三，即：（一）“物質恆動現象互繫”；（二）“矛盾互鬥而生發展”；（三）“數量潛變進於質量”。這三個公律足以解釋一切自然和社會現象的總過程。

布哈林對於辯證法主要內容的說明，却故與一般馬克思主義者之通常說明方式不同。第一，他在分節闡述辯證法之三個基本規律時，却“橫雲斷山”的插入一個“歷史主義”的專節。在他看來，好像解釋到社會科學時單祇是那三個總公律還嫌不夠，必得再加上一個說明歷史範疇的公律，才算齊全。實則整個辯證法的作用，即在於說明自然，社會現象之流變過程。一切事物既在永續流變的過程中——亦即是在辯證的發展過程中，則自然通含有歷史範疇的特性。布氏在辯證法的三公律中竟加上這樣一個蛇足，這只是證明他對於辯證法之基本法則及其意義不甚了了。或者有人說，布氏並不是企圖於三公律外，另添上一個“歷史範疇”的公律，而這一專節，只是補充說明第一公律的內容。這種說法，其實亦說不通。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範疇說，是由整個辯證法的規律中孳乳出來的，決不是單純從動的觀點中產生出來的。單純從動的觀點中，只能產生資產階級“歷史學派”（Historical School）的學說，但決不能產生馬克思的“歷史主義”。然則布氏這一專節的插入，究竟是何所取義呢？

第二，布氏在分節說明辯證法的三公律時，亦太過於機

械，致將這三個公律的相互連貫性勉強割裂了。他在解釋第一公律的內容時，只是簡單說明一切事物都在動的過程中，而沒有緊接着說明這種動的現象係由事物本身內在的矛盾而來，這樣迫不足以使讀者正確了解第一公律的全般意義。

第三，他企圖“把黑智兒辯證法之神祕性的用語翻成近代機械的用語”（註九）。這便是說，把黑智兒的“三題式”（Triad）（註十），拿來建立布哈林式辯證法的主要骨幹。在這一點上，我很同意哥列夫對他的詰難。本來“三題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亦曾引用過，然馬克思始終也只是把這個含有“神祕性”的公式看作辯證法的穿插，決不是把它看作辯證法規律中的基本規律。這不僅因為“Triad”這個公式，含有數的神祕性，而且因為實際事物之發展，也并不簡單限於這個公式所包含的三樞紐（Moment）。一般馬克思主義者解釋由矛盾而生發展的現象及其過程，大都依據昂格斯“反杜靈”一書中“否定之否定”這一概括方式來加以說明，然而布哈林偏不肯這樣直截了當的去接近問題，卻偏要從黑智兒哲學之神祕殿堂中兜個圈子。這個圈子兜出來

（註九）見原著七五頁

（註十）“Triad”這個字，在宗教上本是「三位一體」的意義，黑智兒把他拿來說明「正，反，合」的思想過程。故馬克思稱其為有神祕性。

的結果，黑智兒哲學用語之神祕性固然去掉，却適如他自己所說的，另外却換上了一件機械性的外衣。這個機械性的外衣，便是他的獨特的“均衡說”。在他看起來一切體系在一種均衡狀態之下時，便無所謂“矛盾”，“鬥爭”或“衝突”——至少也是暫在一種休止的狀態之下。只是到了均衡破壞時，才有所謂“衝突”或“鬥爭”。你看他說：

“從以上這些例子看來，明顯可以知道，實質只是一個均衡的問題（圈點一仍其舊，下仿此——岑）。假若如此，那麼還有什麼矛盾和鬥爭呢？恰好剛剛相反，鬥爭乃是均衡之破壞呵（注意！一岑）！實則自然和社會的均衡，並不是絕對的，固定的，而是不固定的。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均衡建立，馬上又破壞，又在新的基礎上建立均衡，又重新破壞，如此輾轉不已。”

從這一段話當中，充分表明布氏是用機械的頭腦去了解了辯證法的基本原則。他簡單以為“衝突”“矛盾”只是顯現於均衡破壞之時，均衡未破壞之前，好像“衝突”，“矛盾”便不可想像似的。要保存“衝突”，“矛盾”的學說，又要保存均衡說，這怎麼辦呢？於是只好拿“馬上建立，馬上破壞”說來解釋，這樣，“衝突”，“矛盾”便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實際上所謂均衡，其內部便藏了很大的衝突矛盾，否則這個均衡，

（註十一）見英譯本“反杜靈”一五九——一七五頁。

只是死的均衡，他決不會走到“均衡破壞”這個階段上去。如果將均衡本身所含的衝突和矛盾，塗抹了或輕描淡寫的放過了，這只是不願意了解辯證法。我們現在且引一段李甯的正確意見，來校正他的機械觀點：

“有兩種基本的關於發展(進化)的概念：其一是把發展看作增減或循環反復；其另一則把發展看作對立物的統一(將單一分而為互相排拒和交相連涉)。

第一種概念是死的，乾枯而無味的；第二種才是活的。只有第二種概念才明示我們以了解現存萬物“自我運動”(Self-movement)之鎖鑰。也只有它才能給我們以鎖鑰去了解“突變”，去了解“漸變的休止”，去了解“截然變形”(“Transformation into the opposite”)以及舊者之破壞與新者之出現。”(註十三)

布哈林把“對立物的統一”這一活的概念，化為呆板的“均衡”說，於是一切物體的“自我運動”，便無法理解了。我們應該說：“均衡”的本身便是矛盾對立的產物。矛盾對立幾時都是要向前發展的，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便要產生一個突變的現象，把舊的“矛盾”的統一破壞而代之以新的矛盾對

(註十二)見原著七五頁。

(註十三)見“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附錄“論辯證法”，英譯本三二三—三二四頁。

立的統一，這樣不斷的發展下去。布哈林在這一點上觀念含糊，也正是鑄成其它錯誤的一個關鍵。

最後我們且討論辯證的第三公律，亦即是辯證法中最主要的部分。布哈林在這一方面也摻入了一些機械論的氣息。比方他解釋“由量的變到質的變”的現象時，曾舉沸水作例來說明：

“水之變成蒸汽，決不是漸漸地變成“小”氣，然後再由“小”汽變成大汽的。水未變成汽體以前，不會沸騰，但熱到一定的“沸點”，它便沸騰起來了。這就是一種突變。”（註十四）

照他這樣講來，水只是到了沸騰的時候，才有突變，換句話說，便是水的表面沒有發生顯著變化時，便無所謂突變現象的存在。然而我們知道，拿一杯水放在烈日之下，久而久之，它表面雖並沒有發生過顯著變化的狀態（沸騰），也終於會乾涸了，這又怎麼去解釋它呢？布哈林只是機械的去了解“突變”，以為在未發生顯著的突變現象以前，只能有數量的轉變，一定到突變（沸騰）發生，才能有所謂從數量到量量的變化（水化為蒸汽）。所以他竟這樣肯定說：“在水的溫度沒有到一百度以前，我們所見的變動，只是“量”的變動，水還是水。然而我們明明知道，在未到“沸點”以前，水的表面，

（註十四）見原著頁八二。

卻已無形中在那兒蒸發(這就是說,定量的水已經由“量”的變轉而為“質”的變),這一點卻被布哈林抹煞了。因此,他對於我們上面所舉的另一例便無從解釋了。其實解釋這一系列的現象,拿“沸騰”來作“突變”(從量到質的變)的例證,固然特別明顯些,然却不應抹煞那末“沸騰”前局部較小的突變現象——而且這種突變現象,正所以加速那顯著的突變現象之實現過程呢!

總括以上所指摘的幾點,可以看出布氏對於辯證法的認識是很不健全的,他甚至於在辯證法的基本規律中,攙入了一些非辯證的機械的觀點。正由於對辯證法基本規律認識不清——或如李甯所批評他的,也不願意認識清,所以在許多基本問題上通犯了機械唯物論的錯誤。現在我們且進而討論這一類的問題。

三

“自由意志與必然”的問題,是一個歷來哲學上聚訟紛紜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概括起來,可以分為三類:第一是唯心派的答覆,他們認為個人意志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必然規律的束縛。第二是折衷派的觀點,他們把“自由”和“必然”機械的對立起來,以為“必然”統治之域便無“自由”

之可言，那麼，反之在“自由”統治之域，亦便絲毫不受“必然”之支配。第三是辯證唯物論者的觀點，他們并不是否認“自由”，也不是把它和“必然”對立，而是認為“自由”係由“必然”所產生，是人類認識“必然”的結果。第一種和第三種的答復，都是一元論的觀點，只有第二種却是一種二元論的觀點（註十五）。

很有趣的是歷來機械唯物論者對於這個問題的答復，都通走到二元論的結論上去，不能把“自由”和“必然”的關係認識清楚。布哈林解答這個問題，亦恰恰陷入歷來機械論者的迷陣中去。

布氏在解釋“意志自由與必然”的問題時，很顯明的便是完全根據着“在“必然”統治之域便無“自由”可言”這一基本概念而發揮的。他列舉了許多所謂“意志自由”的例來加以批駁，說這些都有原因，都受“必然”的支配，毫無“自由”可言，而不是說明這些“自由意志”（當然，只包括那可能實現的）只是認識“必然”的結果，只是在“必然”限度以內的自由。他那種“非你死則我活”的機械對立觀點，與辯證唯物論者的觀點可以說迥異其趣。昂格斯對於這個問題在“反杜靈”一書上曾有過很明確的說明，而這種說明恰是被布哈林

（註十五）模列哈諾甫在「馬克思主義之基本問題」一書中，對於這一點曾有所論列。

所忘記了的。我們現在且把這一段全文引述如下：

“黑智兒是對於“自由”與“必然”的關係專門作一解答的第一人。在他看來，“自由”是（對於）“必然”的認識。“只是因為在不了解“必然”的時候，“必然”才是盲目的。”“自由”意志並不是由於對自然規律之意想的獨立而來，而是由於認識這些規律，且由此規律中所得到的可能性，利用之以有計劃地到達某種一定的目的”。

（註十六）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昂格斯的觀點迥和機械論者的觀點不同。比方布哈林拿喝茶的例來說明“自由意志”問題時，他只是很機械的說，喝茶是由於生理的必要，所以這兒并無所謂“自由”，然而他不肯更進一步去說明：“渴會致人死命”，這固是鐵一般的必然，但在人們了解了不達到一定程度不會因渴致死這一“必然”時，則他固可以自己決定，有時雖然喉乾，却不必立時去喝茶。這是不是“自由”呢？是的，這即是在“必然”限度以內的自由。當人們知道，喝了的時候，不喝茶而吃蘋果一樣可以解渴，他是否可以自由選擇蘋果來代替茶呢？是的，是可以有這樣選擇的自由的。布哈林只知道把“自由”和“必然”看作兩個勢不兩立的東西，以為在“必然”的王國裏絕不容許“自由”這個惡魔攔入，而不知

（註十六）“Anti D uehring” P. 147.

道人們在認識了“必然”的規律時，人們的自由意志，便可以到“必然”王國裏去做個入幕之賓。問題就在這裏——也只是在這裏。

由於這種機械論的認識，所以布哈林便不能也不敢更進一步來說明這樣一個原則，便是：人類的意志自由，是可以逐漸擴大的，而且最終還可以由必然的王國進入自由的王國。這個結論，也許會把一般機械論者嚇倒。但我們如果願意正確了解自由和必然的關係，則對於這點絲毫也用不着大驚小怪。因為“自由”既是由於認識“必然”而來，則對於“必然”的認識每近一步，「自由」也自然跟着更進一步。昂格斯曾說：

“因此，‘自由’是在於統馭其自身以及外界的自然，而此統馭則基於對自然之必然性的認識。剛從低級生物脫離出來的人們，也像低級生物一樣在許多關係上不能自由；但人類發展每進一步亦即是向‘自由’更進一步。”（註十七）

因此我們有權可以這樣說，人的意志自由須隸屬於自然的規律，但這不是說，人必須永遠做自然的奴隸，而是在隸屬自然的過程中，同時逐漸擴張其征服自然的權力——亦即是逐漸擴張其自由。

（註十七）“Anti - Duehring” P. 148

機械論者之所以要徹底殲滅“自由”這個惡魔，便是因為恐怕這個惡魔一旦取得了存在權，會“妨礙科學之發展”，其實那有這麼一回事？布哈林因為曾被唯心論的惡鬼攔過一掌，現在連看見自己的影子也胆戰起來，未免太不濟事了！

我們不但說，隨着人類發展的進步，隨着人類對“必然”認識的進步，自由可以逐漸擴張，並且我們還要指出，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自由意志”的本身內容，還可以發生突變。昂格斯在“從空想到科學”一書中便會更進一步的發揮過這個問題。他指明人類社會在達到生產工具公有脫離了無政府生產狀態的時期，便可以

“停止各個人求生存的鬥爭。……環繞着人類前此且統治着人類的生活條件，至此乃降為人類所統治，人類成為支配自己社會關係的主人，同時也就第一次成為支配自然的真正的和自覺的主人。人類自己社會行為的規律，前此亦像支配着他們的外來的自然規律一樣，統馭着他們，至此便會完全自覺的為所統馭，因此亦就是支配了這些規律……只是到了這個時候，人類才完全自覺的創造自己的歷史，而人類所種的社會因，至此才能逐漸正確的產生人類所期望的社會果。這便是人類由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註十八）

（註十八）圖點是我加的。見俄文“馬克思主義叢書”本頁七六。

正是這種飛躍，這種由必然世界到自由世界的飛躍，爲布哈林所忽略或沒有切實發揮的地方。他雖曾把無組織社會和有組織社會拿來比較對勘，然只是從另一觀測點去看它。他只是告訴我們，社會的花樣改變了，必然性的花樣也改變了，人們意志之不能自由，也達到一種花樣翻新的階段了。我們應該在此地指出，他之所以走到這種沾滯的觀點，主要的還是因爲他在攷察一般的“自由與必然”的問題的時候，沒有將二者的正確關係認清，沒有了解隨“必然”認識之進展而“自由”可以逐漸擴大。在他形式邏輯的腦筋中想來，“自由”既只是認識“必然”的結果，它既不能翻出這個“必然”的手掌，則亦只不過是“有若無”的“無是先生”而已，保存了它，倒在科學中多添了一個纏繞不清的鬼影。這真和辯證唯物論的觀點“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了！

四

機械論者解答問題，幾時都脫不了呆板對立的觀點，也幾時都把形式邏輯的推論當作萬能，而不能切中事物之實際。在“自由與必然”這個問題上，布哈林犯了機械論的錯誤，我在上文已經指出；可是在論“偶然”問題時，他的觀點，依然還是犯了同樣的錯誤，這可真不是偶然的事了！

一般講來，“偶然”固不是沒有原因的，但不能因為它有原因，遂說它不是“偶然”。如果只是這樣一氣推論下去，這只是用形式邏輯的觀點來看取一個問題，絲毫不與辯證唯物論者的觀點相合。布哈林的主要錯誤，便是好拿形式邏輯的三段論法作為唯一的法寶。他認定了某一大前提以後，便以為凡是違背這個大前提的都可以拿來開刀！他在“偶然”問題上，也同樣是這樣一個態度。

布哈林竭其智能，要打破“偶然”這個東西，他並且說，要把“偶然”這位先生，從社會科學領域中趕除出去。他用盡了一切氣力，說明許多偶然現象本身發生的原因，並且高興的喊道：“你看！這些‘偶然’都有它的一定原因，怎麼還能說它是‘偶然’？”然而可惜得很！他雖費了偌大的氣力，却並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身，問題的本身是這樣：所謂偶然現象，它本身固有其發生之原因，然把它放在整個現象的系統中看來，它適成爲偶然。辯證唯物論者絕不應單從單另現象中來研究一種現象，而是要把它放在一切現象的聯繫中來看它。布哈林對於這一辯證法的基本規律，始終是沒有了解清楚的。因此，他只簡單把“偶然”看作一個主觀的產物（不知道原因），而忽略了“偶然”存在的客觀性。

昂格斯在“自然界的辯證法”一書中，對於“偶然”和“必然”的關係問題，發揮得最爲淋漓盡致。他一面批駁歷來玄

學的觀點，認為把“必然”和“偶然”對立起來，是一個大錯。在一般形而上學家看來，某一事物之發生，它不是必然的便是偶然的。決不能同時是必然的而同時又是偶然的。昂格斯的意見剛剛和這些形而上學家相反。他認為決不能把“必然”和“偶然”形式的對立起來看，猶之不能把“原因”和“結果”形式對立起來一般。這二者通應該把它看作辯證的統一。因為我們知道，“原因”的本身便是一個“結果”，而“結果”又可以成爲某種新事物發生之“原因”。同樣，“偶然”和“必然”的關係也是如此。“偶然”的本身本是一個“必然”，而許多具體的必然現象却又爲錯綜的偶然現象所決定（這一層且留待下文詳細分析）。所以昂格斯說，“偶然”是“必然”的而“必然”又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昂格斯對於絕對有定論亦加以嚴厲的駁斥。這一派的論調恰和布哈林的說法相同，他們絕對否認“偶然”之存在。昂格斯斥責他們雖然想極力了解一般社會現象發展之原則，而實際上是對於具體社會現象，拒絕加以解釋。因此，也就同樣不能了解「偶然」對於社會現象具體發生之意義和必要。因此，也就只能一般解釋某種事件必然會發生，而不能更進一步去解釋某種事件何以於某種時間採取某種形態發生於某個地點（這即是所謂具體的必然）。

比方在解釋“歷史的偶然”這一問題時，布哈林這種機

械論的病根，便顯露得十分清楚。他曾舉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說：

“當我們講到帝國主義大戰之必然性（有原因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時，那麼我們只能從社會發展之最主要的原因——引起大戰的原因——來找出他的不可避免性……在這個例子當中，縱沒有刺殺奧太子的事，大戰也還是要發生的，因為奧太子被刺對於上次大戰并“不關重要”，重要的是隨着資本主義社會之發展而帝國主義列強之激烈競爭日益深刻。”（註十九）

這樣一來，他把“歷史的偶然”的作用和意義，便一筆抹煞了！不錯，造成帝國主義大戰的社會經濟關係，誰也不能否認。但只就這一點看，只能決定大戰發生的必然，而不能決定大戰于何時何地採取何種形式發生的這一具體必然。沒有刺殺奧國皇太子這一偶然事件的發生，則大戰還是不可避免，這是不錯的。但大戰因此也許便要遲些時間發生，而發生的形勢也必然不同。這兒“偶然”便起了極大的作用。

布哈林“把歷史的偶然”當作“一些細小事件”，說“這些細小事件於社會變革無甚影響”。這真如昂格斯所說的，是不願了解社會現象具體發展的過程。他不知這些在整個現象中看來是帶有偶然性的“一些細小事件”，正是規定歷史

之具體發展的必要條件。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必然要解決土地問題，這是我們所知道的，但是解決土地問題的經過和方式，英國和美國不同，美國和德國不同，其所以不同，便是由許多交錯的偶然現象所決定。這些各有其發生原因的偶然現象，在歷史必然的總趨勢中，却又儼然成爲決定“歷史必然”如何具體實現的重要因素了！戰鬥的辯證唯物者，不獨要能看清歷史必然的總趨勢，而且要認清那些犬牙交錯的偶然現象（即布哈林所說的“細小事件”），並利用這些偶然現象以促進“歷史必然”的早期實現，且採取某種一定的形態實現。誰忽視了這一點，誰便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也便不能正確了解昂格斯所說的“人類能創造歷史，但在一定條件下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這一句話的全般含義！

五

布哈林不理解或不願意理解辯證法的地方，在我們上面所舉的幾點上，已可以窺其大體。自然，他的機械論的錯誤，不僅限於上列各端，在他的全書中幾於逐處都可以發現這種機械論的趨向。

這種趨向的總根源可以說是起於他的“絕對有定論”。

他在本書中甚至把“資本主義定期恐慌”這個現象，拿來和太陽系運行的規律等量齊觀，其受病之深痼可以想見。這個是毛病從那裏來的呢？是從他過於爲近代然自科學機械精神所束縛，而未能抓住辯證唯物論之重要核心。

由於這種方法論的基本錯誤，自然在實際政治上也要收穫到同樣錯誤的結果。一般人不知道布氏實際政治上的錯誤，或偶然東鱗西爪的看出一點，而不知道這些錯誤的發生適有其哲學上的總根原。如果認清了他的哲學上的——方法論上的總病根，毫無疑義的更可以幫助我們深刻了解布氏錯誤的所在。可惜我們不能在這兒舉出實例來說明，雖然這種說明很有意義，且更能幫助讀者對於辯證唯物論的理解。

最後，我們不能不致慨於辯證唯物論所經歷的歷史命運！它本是一種極富於戰鬥意義的革命學說，但它自出世以來，却從各方面遭到許多無聊的塗抹和曲解附會。當它被人當作商品一般運入中國時，更憑空添上一層烏煙瘴氣的籠罩。這種情形會長久下去麼？不會的！我們堅決相信：

濃霧雖然瀰漫穹蒼；

但它豈能長掩朝陽！

一九三〇，五，十四日於上海。

蘇聯五年來之哲學論戰

彭 葦 秋

“隨着每一個偉大的發明，唯物論要進到一種更新的形態。”（昂格斯）。我們現在應當更引申的說：隨着科學上之每一進展，隨着社會發展之每一次新的更替，辯證的唯物論內容也更豐富起來。宇宙（自然與社會）是一個運動的過程，因此認識與解釋此運動過程之許多學理，也不能認為是一種一成不變的真理。自然科學的發展，不斷地在打破其原來的記錄，發見新的體系；社會的演變，也是不斷地的向着新的階梯，湧現着新的問題。社會與自然間之此種新的現象，新的物象間的聯繫與規律，在實際上需要與以具體的解答，在哲學上需要與以審慎的考究與整理。辯證法在考究與解答

這些新的問題上，必然也是在前進與發展的。而且，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有時也會遇到新的關鍵，表現理論上之新的危機。自然，此種危機並未能表示理論的衰落，反之，牠是在證明着理論的發展與新的生機。如果說在已經解決的問題上，在辯證法已被確證的領域之內，唯物的辯證論者不會有什麼理論上的爭執；但當辯證法擴張到新的領域時，它必然要撞倒許多新的事象和新的問題須待解答，則唯物的辯證論者的隊伍中，不可免的要發生種種分歧，要暴露出不健全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徬徨游疑。雖然每個唯物的辯證論者的任務，是在以辯證法為基礎而握住新的現象與體系，但是當此新的偉大的創造過程中，總不免要發生許多難以解決，難以統一的問題：以怎樣的方法來統馭這一新的領域？以怎樣方法來認識與解釋新的事物與新的運動的規律？這一些問題必然被提到人們面前，發生爭論，而此種爭論亦即是科學發展之一大關鍵。

蘇聯五年來的哲學論戰，正是表現馬克思主義的此種發展。五年來爭論的中心就是辯證法。“方法是一切科學認識的靈魂”，（樸列哈諾夫），“唯物的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此即是一切爭論都圍繞在唯物的辯證法周圍的原因了。但是以此來解釋五年來的哲學論戰，當然還是不夠的。我們應當看一看引起此種爭論的客觀背景。因為只有在客

觀事實中，才能夠了解爭論的實質。

第一件最顯著的事實，自然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在資本主義所統治的整個連環中，已有十多年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這十多年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事件與現象，在政治上，經濟上，人民的生活與階級鬥爭的形式及內容上，都表現着新的形態，新的關係，新的形式間的聯繫與新的發展的規律。這一切新的東西都需要與以理論上的解釋與整理。因此，在哲學上必然的就又重新提出了許多問題：質量問題，行為問題，運動的形式與現象的實質問題，形式與內容問題等。而研究理論之方法——辯證法，亦便成爲目前注目的中心。因爲只有在正確的方法之下，才能夠真正理解這一切事實。

第二件事實就是自然科學的發展。現在的自然科學，已處在深刻的恐慌時期，已表現着偉大的科學革命。此種偉大的進展，尤其在物理學上表現得最爲明顯。大物理學家湯姆生曾經說過：“……使我們否定以前之電子觀點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不久以前所指明的事實，運動（尤其是平衡運動）中的電子永遠要伴着“波”（Wave）而行。波好像是攜帶着電子，並且決定電子行動的軌道。由此看來，運動的電子是一種比較更複雜的物質，絕不是微小的“質點”而已。……正是此種參差，此種原子的精細結構，標明了物質之電質與化學

的特性。要解釋此種物質，簡單的說物質由多量的微小分子而組成是不夠的。此種解釋要直接聯繫到分子之內部組織——分子之電子結構問題。”

由此我們知道：自然科學的發展，現在又衝破了其原來的界限。如果說：過去認物質構成最小形態為電子（陽電核與陰電子），物質是由許多類似的分散原子而組成，那末，現在科學的進展，又進到了此種理論的否定，就是說：現在又發生了“原子的精細結構”，“電子之伴波運動”，以及其他“波與光的統一”，等問題了。

自然科學之此種進展，不只是對於自然科學本身有絕大的意義，它在證明辯證法上，也有莫大的作用。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整個的宇宙觀。辯證的唯物論乃人類一切科學思想之統一的表現。當馬克思主義在其他各種體系中取得了領導地位以後，其唯一的主要的任務，即在於將辯證法具體運用到自然科學方面去，以領導自然科學的新發展。自然科學的此種進展，正是給馬克思主義者以取得自然科學的關鍵，更迫緊了馬克思主義者征服自然科學的任務。因此，偉大的哲學論戰又不禁要隨着自然科學之此種發展，而更加激烈起來，而爭論的中心也就不期然而然的要轉向自然科學方面，轉向辯證法在自然科學上的應用，哲學與科學的統一等問題上來了。

二

在我未談到中心節目以前，在我未一個個的敘述他們爭論的具體問題之前，我們應當先看一下蘇聯在哲學上的一般狀況。一件最值得注意的事，就是幾年來蘇聯哲學上唯心論的復活與發展。隨着無產階級之取得政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哲學，在各種社會體系中也取得了支配的地位。自然，這並不是說唯心論便從此滅絕，亦正如無產階級專政之後，還不能馬上就消滅階級一樣，唯心論還是同階級一樣的在殘存着，並且還要隨階級鬥爭之加緊，而更深刻的表現出來。

唯心論近年來在蘇聯之各個體系中（並且還發現於自然科學中）之復興，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其表現在文學作品中者尤屬顯然。例如我們拿一個明顯的代表羅謝夫（Russev）來看，他不只是唯心論者，他簡直還是一個神祕主義者！羅謝夫是一個神祕的辯證論者，他曾以辯證法的復活者自居。他認為“思攷對於辯證法完全是無關重要的。辯證法只研究物質之純粹邏輯結構。”羅謝夫的辯證法不但是否定黑格爾，連柏拉圖也不採取。他將所謂原始的“純粹”辯證法，與馬克思的辯證法對立起來。他說：“我們或者是抱了純

粹辯證法的意志，因而拋棄了辯證的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或者是選取了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因而擯棄了古代辯證法及其世界觀……”（“原始的宇宙觀”）。羅謝夫自然是擁抱着神祕的辯證法而丟開一切的。

羅謝夫拿起腐朽了的“唯名主義，”來嘲笑並攻擊唯物論。他認為宇宙就是簡單的名稱與言辭。一切始于言辭。這是近來宗教神祕思想的新的論理特色。很顯然的，羅謝夫的辯證法，滿身充溢着中世紀的宗教色彩。自然不能與馬克思的辯證法相提並論。

自然，蘇聯唯心論的營壘中，絕不能說只是一個羅謝夫，羅謝夫不過是此種思想之極端代表而已。其他在別的社會體系之中，如美學，心理學，倫理學，歷史學等都有唯心論者的基礎。不過其他代表不如羅謝夫走的那樣極端，不如他那樣坦然公佈自己的觀點，而且他們也都帶有些現代科學的意味而已。

無疑義的，唯心論在蘇聯的復活乃蘇聯反動份子之活躍與發展之反映，而羅謝夫的極端神祕主義乃蘇聯最反動意識之表現。此種思想現在在蘇聯雖然還未能形成大的作用與力量；但是我們相信，隨着內部和外部階級鬥爭之進展，隨着工人敵對階級力量之暗長，隨着政治鬥爭之尖銳化，此種唯心論與神祕主義的思想，亦將更有力的爆發而擴

大起來。

因此，在哲學上同敵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唯心論的鬥爭，和政治鬥爭一樣，都十二萬分的迫切起來。

現在我們要講到在哲學上馬克思主義者內部的鬥爭。不過在我們未分別敘述其爭論具體問題之前，應當先看一看他們兩方陣線佈置的狀況。其鬥爭的形式大概可以分爲兩派：一爲以德波林(Deboring)爲首的德波林派，另外是以斯結巴諾夫((Stepanov, 他于一九二八年逝世, 現在主要的角色爲乞米里雅捷夫(Chimiliazeff))爲主腦的所謂機械論派。但是參加到後一派的人，在思想上並未能完全統一，不過在反對德波林派上大家是一致的。

爭論的中心雖然是辯證法，是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但因為各種問題都是相互連貫的，所以在這五年來的爭論中所牽涉到的問題也特別的廣汎，特別的繁雜。要想在一篇幾萬字的文章中一一敘述出來，當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只限于談談幾個我認爲比較主要些的問題，而且也只能給一個簡單的敘述。

我決定要談的問題，就是以下四個：

1. 辯證法與自然科學。
2. 客觀真理問題。
3. 主體與客體的統一。

4. 偶然與必然。

三

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乃五年來爭論的中心。因此，我們對於此問題應當有個比較詳盡的敘述。正因為此問題為爭論的中心，所以在此問題的爭論中所涉及的範圍也特別廣汎，而參加爭論的意見也特別龐雜。若想將這些意見完滿無漏的一一敘述出來，也是件難能的事。所以我們還不能不着重幾個比較更中心些的問題來談。

在此問題中首先可以提起的，即是辯證法能否應用于自然科學以及怎樣應用于自然科學的問題。

被稱為機械論者的乞米里雅捷夫認為：理論的自然科學，不需要有一種總的理論與方法基礎的論斷。因此也不能先拿辯證的唯物論為研究自然科學的哲學基礎。“科學的本身就是哲學，”這是他們共同的口號。所以他們說：“我們研究自然界與社會中的具體事實與現象，應當研究到此種程度，就是使辯證過程從其物象本身中自己暴露出來。”不以唯物的辯證法為工具來研究自然科學，而是從每一個具體的自然事實中發現和取得辯證法，檢驗辯證法，估定辯證法，這是所謂機械論者的共同立場。乞米里雅捷夫在反對德

波林時，曾這樣說過：“德波林在自然科學中所運用的辯證法，並不和馬克思，昂格斯，列寧所運用的一樣，……在自然科學上他充分的表現是黑格爾派的預述自然規律，而不是真從自然界發生出來的真實規律。若想得到真從自然界取來的辯證規律，必需慎重的研究每一個具體現象，要使辯證法由研究每一個事象的結果而自己暴露出來。我們的反對者（係指德波林派）却認為在自然科學方面要先選定一個流傳百世的總的論據。”（見自然界辯證法）。另外還說：“我們的目的是在自然界探尋證證法，借助于現有的科學證明辨證法為真理，並發展和加富辯證法。並不是以辯證法一般的規律證明專門科學為真理。”“辯證法，辯證法的規律，最主要的是結論，而不是科學研究的論據。”上面的引證已很顯然的公佈出乞米里雅捷夫派的觀點：辯證法不能成爲理論自然科學的研究基礎，他只是研究每個具體事實所得的結論。辯證法自身應當在自然科學中去追求，探尋；其是否成爲真理，應以現代自然科學之每一個具體事實，每一個例證中去證明。

佔在與機械論者正相反對的德波林派是怎樣的意見呢？

他們認為：現在自然科學的發展已達到深刻的恐慌與轉變的時期，其恐慌的根本內容即是在理論的自然科學上

發生了哲學問題。亦即是說現代自然科學的前進已經與陳腐的思攷形式(形式邏輯)，機械論的方法不能相容。(註)爲了戰勝此種矛盾，必需提出新的邏輯，新的方法。只有將辯證的唯物論與現代自然科學聯結起來，以辯證哲學作爲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基礎，才能夠解釋出現代科學上所發現的新的運動形式，新的關係形態，新的規律。才能夠抵抗住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攻擊，才能夠將現代自然科學從神祕主義，唯神主義等打擊中拯救出來。所以德波林說：“現代自

(註) 例如：因爲科學上有新的物質形態之發明，科學家中就有些否定物質存在，認唯物論破產的唯心論派別發生。

因爲科學的前進衝破了原來的電子說，於是又形成新的唯心論的科學派別，否定原子與電子的真實存在，認電子與原子僅只是個空的概念。

因爲有機生活的複雜現象，不能以簡單的物理化學過程，簡單的原子分析所能解釋，於是自然科學上又發生了活力論的唯心學說。

這一切現象都證明自然科學發展之每一個步驟，都脫不開哲學基礎。都需要一定的哲學思想的解釋。所以許多大科學家都聲言：沒有哲學他們是不能往前進的。然而，自然科學的前進，反而引起了反動的唯心派別的產生。這一個矛盾正表示着新的科學發展與陳腐的思攷形式(形式邏輯)間之破裂。

然科學的恐慌，就是自然科學之方法論基礎的恐慌。”“現代自然科學所引起的諸困難，以及因此困難所引起的反動的唯心論與神祕的宗教思想等派別，只有辯證的唯物論能夠與以科學的解決。唯物的辯證法是現代科學之最正確的推理方式。現代自然科學的進展與其推理方法間的破裂，是可以由此消滅而戰勝的。”“我們的基本任務是在於以辯證法的觀點征服自然科學。”

依據德波林的觀點看來：現在絕不是如機械論所說的單純的以自然科學來證明辯證法為真理，而是以唯物的辯證法為武器來戰勝由自然科學進步所發生的難題。所以加列夫(Carov)在解釋辯證法為研究工具時，詳細的說道：“辯證規律這是在自然界，歷史上與人類的思想中之一般的運動規律與形式的表現。辯證規律是過去認識宇宙之整個的歷史的結論。他本身不能答覆個個專門知識的具體問題，他只能是最一般的運動形式之抽象的表述。他只指示道路與方法，幫助我們研究具體的實際。而我們一切認識的真理性，最後係由我們的實際行動來證明。由此看來，辯證法的規律既不是各專門科學知識的消極產物，也不是由此能產生積極知識的既成圖案與公式。他給我們以開拓新知識的方法，因為他指示給我們以總的研究運動與某些物體間之聯繫的道路。方法既為具體研究之武器，那末他就不僅是供

我們以科學的研究某些材料的方法，並可在此研究過程中鍛鍊他自己。使他更領受運動之新的，複雜的交互依屬關係，膺受構成概念之新的工具。認辯證法為集聚和儲蓄現代專門科學的一隻箱籠，而不能與各種科學以任何影響，固然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即認辯證法為包羅萬象的規律，由此即可以純粹邏輯地製造出自然界之各部份的規律，也是同樣不合乎馬克思主義。”

從加列夫這一大段中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辯證法是過去一切科學知識的總合，是人類思攷之一般的形式與規律之表現，他既不是一個不能與科學知識有影響的空的知識收藏所，然他也不能由純粹的邏輯詳細製造各部份的規律。他只可以作為一種方法，一個路燈；認識了辯證法之基本規律之後，即可幫助我們研究各現象間之總的聯繫，整理融化各科的專門知識，並確定各科知識的正確性。最後，解答目前自然科學上所發生的，形式邏輯所不能解決的難題。

× × × ×

馬克思主義——辯證的唯物論，是一個整個兒的宇宙觀。他是研究一切科學知識的方法論的基礎。不僅是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創造了不可磨滅的偉蹟，在自然科學上也已經開拓了自己的領域，收穫了鮮豔的果實。誠然，理論自然科學的基礎是建築于經驗科學之歷史材料之上，是歷史的

結論。在歷史上所肯定了結論，也只有有在相當期間的歷史過程中方能與以否定。機械論者既承認唯物的辯證法為幾世紀來所形成的思想形式之最高形態，為長期歷史中所被確證的歷史結論；然而又想根據現代科學發展階段中之某一部份的事實與現象為基礎，視現代科學之某一發見為最後真理，而重新估量或審定唯物的辯證法，甚而想決定辯證法是否成為真理，我們不能不認為機械論者之此種企圖是一種不正當，不合理的企圖。在現代科學發展階段中之某一部份的創造或發明並不足以審定或否定在歷史上久被確證的有力武器——辯證法，恰好相反，現代科學上之某些創造應當膺受正確的哲學基礎（唯物的辯證法）的審定與批評。

辯證法為歷史的結論，然而，當其被確證為歷史結論之日，同時也就不僅限于為歷史的結論了。由歷史的結論轉變為歷史研究的起點，更進一步的來指導新的科學的研究。所以唯物的辯證法不僅是一切科學知識的產物，而且是促進和研究一切科學知識的工具和武器。機械論者不敢拿辯證法為研究自然科學的武器，只在喊從自然現象中取得辯證法；罵應用辯證法為預述自然規律，為毀滅自然科學，這表示他們不了解辯證法的實際意義，不了解理論與具體事實間的聯繫。什麼叫作利用辯證法呢？這就是說：“我們在研究新的現象時要用已經發現的運動與發展的規律。”所以，

利用辯證法並不會與研究具體事實相違背，反之，這正是以辯證法為武器幫助我們去研究與了解事實。乞米里雅捷夫主張不應用辯證法，只從自然科學中取得辯證法，“使辯證法從自然科學中自己暴露出來”，這表示他們為了研究具體事實而丟開理論，丟開理論思想，完全流於匍匐的經驗論的尾巴主義之流了。無論他們在口頭上怎樣喊，從自然科學中取得辯證法，然而在客觀上他們是否定辯證法，否定辯證法的積極意義。向着新的領域胆怯，對於自己的理論思想懷疑。

x x x x

現在我們講到辯證法的本身。昂格斯認為辯證法之基本規律有三。數量變與質量變（由數量到質量，由質量到數量的運動規律）即此基本規律之最主要者。他們對於此問題的爭論點在那裏呢？

機械論者共同的立場，就是否定質量的變化，認為一切新的現象都是已定質量之某種數量的團聚。乞米里雅捷夫說道：“機械運動的物體也佔有其本來的質量。質量是久已存在的，無論在機械運動的過程中，或有機運動的過程中，或平衡狀態之交替中，都是不變化的，不向另外的質量轉變的。質量無生也無滅。質言之，機械的運動乃運動之最抽象的形態。然這決不是說：機械的運動與機械論的科學就丟開

了辯證法，說辯證法不能在此中應用。此種領域（即不能應用辯證法的領域）在自然界是不會有的。前章我們已分析過機械運動的矛盾了。無疑義的，在機械運動中我們可以取得許多的辯證規律。正因為此種運動是運動之最抽象的形態，所以質量的因素此處要減輕到最低限度，以至于脫離開質量只包含些純粹機械性質的數學的數量的過程。然若想完全與質量絕緣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絕對不能思攷那絕對沒有質量的物體。純粹數量其本身就是些在原則上與其他不同的質量。”

乞米里雅捷夫這一大段話的含意是什麼呢？他是說：機械的運動是脫不開質量的，因為數量的本身就是質量。不過此種質量是從最古就有的，不變的。因為此種質量本來就不變，所以我們的研究就必然的脫離開質量，而只看其某種數量上的團聚。此種本來的質量在空間的運動與轉移，就是辯證法的規律。辯證法的規律既為純粹數量轉變的規律，所以其應得的結論就是：“一切物質都是由同樣的微小分子所組成。物質之化學因子之每個質量上的區別，都是由于這些微小分子當其結聚為因子時在空間集團上的不同的數量。”“物質只是由數量來決定，質量是從古如斯的。”所以斯結巴諾夫說：一切物質都是由同樣的微小分子，亦即陽電核與陰電子所組成。物質在我們感官上所認識到的就是陽電核與

陰電子。”亞克謝爾羅德 (Axeriod) 在她的文集中，也發表有此同樣的意見。

德波林派的觀點怎樣呢？

他們認為在物質的運動中形成主要的作用者，不僅是數量的轉移，並且有質量的突變。質量的意義也不亞於數量。簡單的承認原已存在之質量在空間轉移的機械運動，不能即說是辯證法的規律。因為以這樣的觀點去研究物質，結果是只注意其不同數量的團聚，撇開了其質量的特性，仍歸結到純粹數量的立場去。所以加列夫說：“……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證，即在機械運動本身我們亦可看到：不僅是原質因子之各種數量上的團聚，而且此種運動與轉移的形態還帶有質量的變化。”“所以，問題的實質併不在乎機械運動的物體是否佔有某種質量，……根本的分歧是在於說明：物體在空間的轉移並未能表現運動的一切形態。物質的運動不僅限于物體的轉移，並且還有物體之質量的變動，之總的變動。”物質的運動既不僅是純粹數量的轉移，並且因數量的不同，會引起質量的變化，創造新的質量；所以，德波林繼續反對斯結巴諾夫道：“認物質係由許多相同的小單位質量因子所組成的觀點，是偏面的理論。”另外還說：“電子構成物質原子的發現（電子說），固然是科學上的一大成功，然而只有那限於機械論與經驗論的人們才不了解：完密的判斷仍

需要”補充，“仍需要不斷性的矛盾。物質之純粹原子的表現，是將物質分析為無數之點，由此質點經過結合即組成爲機械的原質，……物質是不斷的也是間斷的。”“辯證法之最大成功，之成爲思攷之最高形式，即在於”綜合“了不斷性與間斷性，質量與數量，擴大與加深，物質與能力等等。”

× × × ×

列甯在論辯證法時亦曾經說過：“發展之基本概念有二：1,增多或減少之循環式的發展；2,矛盾之統一的發展（將統一的一體分裂爲互相排斥與互相聯繫的二者）。……後一種發展形式，給我們以認識一切物質自我運動的鎖鑰，使我們了解“突變”，“漸變的間斷性”，“向反面的轉變”，“舊的破滅與新的成立”等等。”

每一種新的現象，不祇是表示其已定質量之數量上的增多或減少，重要的還在於佔有特殊性質之新的質量的創立。沒有數量的變動（不斷性的漸變），不會有質量的轉變（漸變性的間斷——突變）。沒有質量的突變（間斷），不能維持不斷性的數量的漸變。數量與質量的統一，即間斷性與不斷性，漸變與突變之矛盾的統一，乃是一切物質運動之實質。

丟開了質量的變化，只看到數量轉移的機械論者，是抹殺了辯證法的革命內容，將辯證法曲解爲十八世紀的庸俗

的進化主義。機械的形而上學的肯定物質係絕對由同樣的微小分子(陽電核與陰電子)所組成，這更是以現代科學之某一結論代替辯證的歷史觀，以物理學的定義代替了物質之哲學的定義。

大科學家湯姆生已經在說明有“各種形態之電子的存在。”並且根據現代的觀點看來，“電子不是物質構成之最小形態。”已發生了電子之精細結構問題，這證明科學之發展，其本身已不能與機械論之形而上學的觀點相容。

× × × ×

現在我們更繼續的研究下去。

與質量問題有密切聯繫的問題，即是昂格斯的所謂『旁系形態』。亦即是高級形態與其構成因子——低級形態之關係問題。高級形態的運動是否可以單純的以低級形態之運動規律來解釋呢？

機械論者都認為：物質之高級形態，係由一定條件下之低級形態之互動而產生。而此高級形態物質運動之規律，即可以單純的從分析其組成因子——低級形態研究出。亞克謝爾羅德說：“在原則上否定物理化學過程有完全解釋有機體生活之可能，即不能算為唯物論者與辯證論者。”乞米里雅捷夫雖然也承認：物質之高級形態係培植新質量之低級形態之運動的複雜化的結果，然仍不敢稱新質量與舊質量

間之原則上的區別。所以，機械論者都堅決的說：高級形態的運動，即可以完全由低級形態之運動規律解釋；甚至於說：理論的社會現象不僅可以由質量的——社會學的分析獲得，並可以由數量的——物理化學與生物學式的分析獲得。所以斯結巴諾夫說：“現代科學的認識某種生命現象，就是在於認識現代現象之相對的簡單的化學與物理過程。現代生理學對於生命諸現象的闡明，就在於根本的理解其化學體與機體（物理）。”（見歷史的唯物論與現代自然科學）。

他們既然認科學的任務係單純的將高級形態分析為組成因子的低級形態，以物理化學的分析解釋生命現象，甚至解釋社會現象，所以他們對於所謂“旁系形態”也不得不樹立起反對或懷疑的旗幟。所以乞米里雅捷夫說：“此種組成分子的互動，雖能使此統一的一體表現些新的形態，然既為統一之組成份子，則其對於一體之關係如何能成為”旁系“的呢？”

他們攻擊德波林派，認德波林的所謂“戰勝機械論”，所謂“旁系形態”，乃是以一種超自然的生活力來解釋有機現象的活力論。

德波林派的意見究竟怎樣的呢？

加列夫說：“物質之高級形態乃是在歷史上由低級形態所創立的綜合。而此種綜合即構成高級形態與低級形態間

之質量的區別。”“……在物理與化學的過程中，我們不僅看到同樣的質點在空間的運動，並且還可以看到因許多質點之互動與交互貫通而產生的綜合。此種綜合造成新的質量。物理體積之互動，之錯雜，之綜合，創造化學過程；化學體的綜合創造有機過程；有機的互動與綜合創造社會，社會過程。每一個新的階梯，都是新的質量體系。所以，機械的或數學的運動，未能解釋出賦有新質量特性的高級形態。雖然此高級形態永遠與此數學的運動不可分離。所以此高級形態并非是本已存在的，而是歷史過程之結果。隨着社會學與生物學，化學與物理之後，仍需加以歷史方法。”

所以，由他們看來，辯證的唯物論者不能僅限於精細的深刻的分析，除去此種退化的方法之外，仍需加以進化的方法——綜合。低級形態既係經過綜合而組成高級形態，則此高級形態中必賦有與低級形態迥異之新的特性，因之，低級形態對於其綜合之高級形態即成爲旁系的。

例如：社會係由單個個體而組成，而此單個個人則係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之下的一體。社會一體的組成份子——各個有機體——的生活規律，不能拿來解釋社會生活的運動，不能成爲社會運動的基礎，剛剛相反，整個社會運動的規律，却是在規定其社會一體中之各個人的心理，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在約束其生理。德波林派所解釋的“旁系形態”，

其根本意義即如此。

此種解釋是否如乞米里雅捷夫所說，含有活力論的色彩呢？現在我們來看他與活力論的區別。

唯心論的活力論者認為：生活的現象係由某種特殊的超自然的生活力來決定；非此種生活力的存在，則不能有有機體的生活現象。所以，他們在原則上否定有機體係由無機自然界之發展的結果。辯證唯物論的立場如何呢？他們承認，有機體的生活現象，係由低級之無機的自然物之發展之複雜化而來。並且在原則上不否認有人工的創造有機體的可能。但是當此物質的複雜運動，創造了高級形態，創造了新的物質之後，則此高級形態或新質量之運動與發展，即不能單純的由物理化學過程，由分析低級形態所能解釋。此種運動之解釋必然的是用一種綜合式的研究，應當視為歷史發展之綜合的結果。

我們知道：社會的發展與運動，是不能在有機體的生理運動規律中觀察出的。而有機體各形態之轉變的現象，是否可以由物理的規律來解釋呢？根據現代科學的觀點看來，對於此問題也不得不是個矛盾的答覆：是也否。一方面在最近的動物學已發現了一種試驗形態學的趨向，在解釋有機形態運動之依屬物理過程，所以我們不能說形態構成過程完全不能由物理解釋。另一方面現在每個科學家都不敢說：單

純的以此一種原因即可解釋清一切形態的轉變，說一切形態為簡單的物理因子影響之結果。

所以，單純的形態學與生理學都未能完滿的解答動物學中的一切問題。為了解釋每一個具體現象，除去物理化學的分析之外，尤需精細的攷察構成新綜合，構成新運動形態的歷史。

運動的形態愈複雜愈具體，則其中質量的作用亦愈大。而高級形態與低級形態間之差別亦愈深。其兩者間的關係亦愈遠。因之，高級形態之運動亦愈不能由單純的低級分子的運動規律來解釋。

機械論者因為不了解辯證法的基本規律尤其不了解質量變化，所以，他們才否認低級形態對於新質量綜合（高級形態）的旁系關係。認為否定機械論便是活力論，此兩者之間沒有第三路可走。

× × × ×

根據上面的敘述現在我們將機械論者與辯證論者關於自然科學與辯證法問題的爭論點簡單的結束起來：

1, 機械論者否定馬克思主義——唯物的辯證法為研究自然科學的工具。否認自然科學需要哲學的基礎。認為科學的自身就是哲學。

2, 辯證論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是整個兒的字

宙觀，因之亦應當成爲理論自然科學的基礎。目前自然科學的恐慌，一方面標明自然科學發生了哲學問題，另一方面更證明着唯物的辯證法的正確。

3, 機械論者認爲一切運動的形態不外是同樣的質點在空間的轉移。一切運動僅只是某種數量的團聚。

4, 辯證論者認爲：實際的運動絕不僅限于同樣的質點在空間的轉移。所謂辯證的運動乃是一般的運動，總的運動，不僅數量的增遞，還有質量的變異。

5, 機械論者認定：自然界的質量永遠是固定的，科學的任務卽在於簡單解析質量爲最小單位。

6, 辯證論者認爲：“質量是永遠固定的”，這是馬黑主義 (Machism) 的論據，半點也不合乎馬克思主義；單純的分子分析乃是淺薄的進化論的論據。

7, 機械論者否認，當新的質量構成之後，其構成高級形態之基礎的低級形態爲旁系形態。認此種解說爲活力論。

8, 辯證論者認爲：“旁系形態”說絕沒有活力論的影子。因爲他還是以物質運動來解釋現象，並非以超自然的生活力來解釋有機體。

9, 機械論者認爲：社會現象在理論上不僅是以社會學(質量的)的分析可以達到，並可由物理化學生物

學(數量的)的分析獲得。

10,辯證論者認為:以數量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現象
乃是資產階級之社會學的基礎。

四

現在我們來講第二個問題。關於客觀真理是否存在問題,抽象概念對於實質間的關係問題,雖然是唯物論者與實證論,經驗論的主觀唯心論者在歷史上久已爭論過的問題,但是當現在新哲學問題發生爭論時,又重新提了出來,並且兩方面對此問題有了不同的答案。被稱為機械論者的薩拉賓諾夫(Sarabianov)以及亞克謝爾羅德,他們對此問題給了個否定的答案。例如薩拉賓諾夫在他的文集中曾說:“我們首先要講的就是:一般是沒有任何客觀真理存在着的。……只需要確信:一切真理都是主觀的。”“那些認為有客觀真理存在的人也許說:那些與客觀實際適應的,應當稱為客觀的真理,而那些不與客觀實際適應的呢,主觀的真理。……但是很容易證明他們的隻足是落在唯心論的立場上了。”

亞克謝爾羅德在她“擁護辯證的唯物論”一書中,也曾寫道:“加列夫及其德波林派的同志們,他們的觀點是與我恰相對立的,他們說:”由我們的思致所構成的一般的概念,

就是該物質本身的一般的反映。”一切這些高明的論據，其根本的立場就是神體存在論之論證的基礎。因為神體存在論之論據的基礎，不外是認為有神的概念存在，所以真實的實際（即神）是與這些概念適應着的。“爲了更明顯的認清他們的觀點起見，我們現在且引證以前在評判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時，亞克謝爾羅德的說話，她說：“由唯物論的觀點看來，由物質運動之各種形式的活動所引起的感覺，是與產生此感覺之客觀過程不相類似的。因此，對於自然之唯物的解釋，是與象徵論緊相聯繫，而且成一種不可分離的形式。”

薩拉賓諾夫與亞克謝爾羅德都認為，由客體活動所引起的感覺，是不與外部客體之真實實際相適應的。由物質活動所造成的人類的抽象概念，也是絕對不與客體之實際相類似或相附和的。因爲人類的感覺與概念，非外物活動之直接結果，其形成係經過人類主體之活動與思攷。因之在人類思攷中所構成的一切概念與思想，絕非客觀的而是主觀的。因之真理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感官之所得既與真實的實際不相適應，所以我們對於外物只能夠是以一種象徵的比擬的解釋。而那些認為有客觀真理存在的人，都是唯心論者。

同薩拉賓諾夫和亞克謝爾羅德等對立的德波林派，是

與上述的觀點正相反對的。

德波林說道：“唯物論者承認客觀的實際是我們的感覺的源泉，感覺是此種真實實際的寫真。感覺是我們認識外界之唯一的方式，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已經完全認識了外界，這只是說除感覺之外，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認識外界的。客觀的實際永遠不能夠完全認識，因此，永遠也不能說有絕對的真理。……我們的認識就是客觀世界的反映，一般的概念就是物質本身之一般的表現。另外還說：“如果我們是以象徵，比擬等方法來認識外界，但是此種象徵，比擬却只能指示給我們說我們外界有某種東西存在，不能表現出物體的本身來，因此，以此種方法是不能夠實際的認識世界的。……”

總之，德波林認為客觀的真理是存在的，雖然我們不能說抽象的概念就是物質的實體，但是抽象的概念乃是物質本身的反映。因為人類的感官即認識實際，認識客觀世界的工具。雖然此種認識是受限制的，但是隨科學的發展，我們對物質實質之認識亦逐漸接近。而所謂象徵主義的唯物論，實際上是向不可知論讓步。

× × × ×

客觀真理存在與否，抽象概念與物質本體之關係，這是哲學認識論中的基本問題。因此，馬克思昂格斯列寧對於此

問題都有詳盡的敘述。昂格斯在“自然界的辨證法”一書中，曾攻擊過赫克爾的不可知論的經驗論。不可知論的經驗論者認為只有那在人類的感官中可以度量的為真實的，而一般的抽象概念如時間，空間，物質，運動果實等都是不真實的。因為這一些都不能由感官直接接觸。昂格斯嘲笑赫克爾，因為赫克爾想看到時間，捉住空間。昂格斯說：“物質不外是各種東西的總合，此種概念就是此種總合之抽象化”，“物質與運動只是語辭上的一種簡體，在此簡體中我們結合了各形各色由感官所授受之物體之一般的特性。”

馬克思與昂格思在“神聖的家族”中，也認為梨，梅等不是虛構的而是實際的，果實這個概念不是梨梅之實質，而是梨梅之抽象體。果實不能成為梨梅之實質，外我而存在，但果實可以成為梨梅橘等之綜合體，外我而存在。馬克思與昂格斯在“神聖的家族”中，反對將一般的抽象概念，變為絕對的東西，駁斥了那些將真理與實際以及物體之實質割開的唯心論，而認為一般的概念是實際的各種形色的物體之抽象體，是物體之真實綜合之縮影。因此一般的概念即是物體之一般的特性之反映。所謂物體之特性是什麼呢？當然就是物體之實質。

現在我們再看一看列甯關於象徵主義的意見。他說：“唯物論絕對不能同象徵主義協調，因為象徵主義不信任人

類的感官，不信任人類機體所反映過來的感覺。無疑義的，發現永遠不能完全就認為適合其原型，但是發現是一回事，而象徵的比擬又是一回事。講到發現，必然的，不可免的要預定了某種要反照出來的客觀實質。而比擬，象徵等概念之實質，却完全是不可知論的因子。”列甯與昂格斯都很瞭然：發現絕對不能就認為是其原型。但他們都認定：我們的思攷（自然界的產物）與自然的本身，有原則上的適應。而象徵主義則根本限制了此種原則上的適應，而且根本懷疑了此種適應。因此，象徵主義確是向不可知論讓步，完全走向康德主義與經驗批評論去了。

是的，關於此點也正是列甯與樸列哈諾夫所曾經起過小的爭論的問題。在哲學的唯物論上，列甯之所以比樸列哈諾夫更前進更徹底者，就在於列甯更發展了真正馬克思與昂格斯的觀點。由唯物的承認外部的存在，更進而承認此外部世界之可知。列甯說：“如果感覺不是物資形態之實質，而只是那不與其實質有任何類似之比擬與象徵，那末根本唯物論的論斷就有些破綻，而外物之是否存在也在疑問中了。因為比擬與象徵對於那外界本來沒有的東西也可以發生的，每個人都可以遇到此種虛擬象徵的例證的。”關於此點，昂格斯在“費爾巴赫”中也已經講過。當昂格斯敘述了哲學上的兩個派別（唯心論與唯物論）之根本區別，在乎決定物

質與精神孰先孰後的問題之後，他還繼續說道：“但是思攷與存在這兩者間的關係，還可以發生另外的問題，即我們的思想與我們的周圍有怎樣的關係？我們的思攷能否認識真實的外界？我們對於實際的概念與意象，能否是實際的正確反映？”昂格斯認為此種認識論的問題——我們對於實際的概念是否正確反映實際的問題，乃思攷與存在之關係問題之別面。重要的基本問題之一，即孰先孰後；問題之另一方面，即是我們能否正確反映實際。而昂格斯對於此問題之結論，却是個肯定的答案，即是說我們可以正確的反映世界。實際即可為我們證明。

昂格斯在他另外的信札中，也曾談到：“物資的概念是與他的實際相互并行的，他們永遠是彼此接近，但永遠不得相遇。正是因為他們兩者間有此種區別，所以概念不是直接的實際，而實際也不是直接概念的本身。因為概念是佔有自然之實質的概念，……因此，縱使概念不直接與產生他的真實的實際適應，但是他也絕不是虛構的。難道因為概念與實際要經過某種步驟才能夠適應，你就說思攷的一切結果都是虛構的嗎？……”

總之，物質的概念是不能夠直接與產生他的物體之總合相適應，他是經過着人類的思攷而創造的，也即是說他是我們感官所接受的各種物體之一般特性的簡體。此種抽象

的簡體，在哲學上就是運動時間空間等概念，在經濟學上就是價格利潤率等概念，在自然科學上就是形態，哺乳，兩棲等概念，在社會發展史上就是階級，國家，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等等。

主觀的唯心論者，認為人類的概念是純粹由人的主體造成，與真實的實質沒有任何關係，因之一切真理都是主觀的。客觀的絕對論者認為人能夠認識外界，而人類的概念也就是絕對的實際，因之一切真理都是絕對的。前者是佔在唯心論的立場上而走向否認外我的存在。後者是佔在形而上學的基礎上，認定宇宙是一個凝結的，固定的，永久不變的死東西。

辯證的唯物論者，認為外界是存在的，人類的感官即認識此外界之工具。抽象的一般的概念，是由感官所接受的各種物體之一般特性之縮體，因此，概念亦即是此綜合體之反映。一般的概念雖不能成為個自的物體外我而存在，但可以成為各種物體之綜合體外我而存在。因之，真理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宇宙是一種動的過程，人類的感官是受着某種的限制。因之客體的實質永遠不能夠“根本”的認識。他只能夠一步步的趨近實際。這即是說人類認識的發展是無窮的。而所謂絕對的真理，永久的體系（對自然與社會），自然是與辯證的思攷相矛盾的了。

五

機械論者因為在前面兩個主要的問題上，墮入了非辯證唯物論的陷坑之中，所以在“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偶然與必然”等問題上，也犯了一貫的錯誤。

亞克謝爾羅德因為在認識論上置下了一個原則上完全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所以，在解釋主體與客體之統一時，也嚴格的劃出了兩個老死不相往來的東西：1，客體——我們認識的起點，2，意象——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在偶然與必然的問題上，亞克謝爾羅德則認為：偶然與必然的區別，只在於對一般規律的關係，即適應於一般規律者為必然，不適應於一般規律因而又不能為科學所解釋者為偶然。

在第一個問題上（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她將昂格斯所講的主體與客體的統一，簡單的變為空的意象。並將此空的意象同客體嚴格的對立起來。我們記得，當康德解釋現象時，也曾經警告我們不要將認識的起點與意象混淆。他也認為一切現象都是兩個因子的互動：一方面就是使我領受印象的“自在之物”，另一方面就是構成此印象的“悟性”，亞克謝爾羅德除去用了些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之外，在實質上究竟與康德有什麼區別呢？

實際上昂格斯所講的主體與客體之統一其意義究竟在那裏呢？

我們知道這一問題是與認識論不可分離的。在認識論的問題上昂格斯認為：思致與存在是互相適應的，概念與實際是逐漸接近而永不得遇的（即永不得完全認識外界）。所以他們之間是存着一個辯證的矛盾。然，人類的頭腦乃是自然的產物，主體與客體兩者都不是超自然以外的東西（主客的關係有時還會移動，如我（主）你（客）有時會變成你（主）我（客）。）所以他們之間並沒有隔着一條不可調協的鴻溝。他們構成整個兒的統一，統一的發展即表現矛盾的對立。在歷史的過程中，他們間的矛盾不斷的發生，不斷的解決，不斷的再建築於更高的基礎之上。客體與主體的統一，只有在此認識論的基礎上去了解，不然就容易跌入康德唯心論的泥坑中去了。

在第二個問題（偶然與必然）上，亞克謝爾羅德也是犯了同樣的錯誤。她機械的劃分了兩個嶄然不同的世界：一方面就是那順應一般規律，可以科學解釋的可知世界（必然），另一方面就是那不順適一般規律，不能為科學所解釋的不可知世界（偶然）。因此她將具有客觀性的“偶然”，完全視為主觀性的東西。偶然不能以科學解釋，因此在偶然所統治的區域之內，科學要完全失掉作用！她此種機械的唯心的解釋，

完全與昂格斯的辯證認識相背謬。

昂格斯從來不承認“偶然”與“必然”為絕對的範疇，更不認為偶然與必然是兩個互相排斥的互相對立的極端。具體的必然是脫不開偶然，而必然正是具體的表現在偶然之上。他們兩者之間組成辯證的統一。所以昂格斯說：具體的必然是由許多偶然所組成。

奧國皇太子之被刺，以帝國主義發展史的眼光看來，是偶然，是歷史的偶然。然而在這個偶然的事件上却正反映了帝國主義矛盾的必然；歷史的偶然就是歷史必然之具體的一個表現。從另一方面看來，皇太子之被刺乃是大戰爆發（歷史必然）的一個導火線。因此，歷史的偶然現在又變成了決定具體歷史必然的一個因子，而具體的必然却建築在錯誤的歷史偶然的因子之上了。所以昂格斯說：具體的必然係由許多偶然所組成。

偶然與必然間的聯繫與統一，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得到辯證的了解。

爲了節省篇幅起見，關於這兩個問題的爭論，現在我不再一一的詳細介紹了。此外，關於五年來哲學問題的整個敘述，也要作一個簡單的結論，而即此終止。

× × × ×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關於哲學問題的爭論，到現在已經

過兩次了。引起這兩次鬥爭的歷史背景，前後看來，雖有根本的不同（第一次是在1905年革命失敗後之反動時期，第二次是在無產階級已奪得政權之後），然而，其實際的意義却是前後一樣的。

整理和理解一九〇五年革命的豐富教訓，建立科學的無產階級哲學方法，是第一次哲學爭論之基本任務。記取世界革命的經驗，理解無產階級專政後之新的問題，乃第二次哲學爭論的歷史使命。

在自然科學上也是一樣的，如果說第一次爭論是因為自然科學的革命，提出了許多問題，使自然科學本身遭到了理論的饑荒所致；那末第二次爭論的發生，亦正是因為自然科學又有長足的進步，更加深了理論自然科學的危機而使然。所以，兩次哲學鬥爭的任務，同樣的都是在解決因自然科學前進而引起的難題，都是在怎樣用辯證的唯物論來抓住自然科學來指導自然科學的問題。

如果現在二十世紀的初年，辯證唯物論的任務還只是在於指明：新原子的發現並不與唯物論相矛盾，反之此種發現更證明着唯物論的正確；可是到現在我們的任務卻在於：更發展辯證唯物論對於宇宙解釋之總的內容。如果說廿世紀的最初十年中理論自然科學的中心問題是物質之一般的形態，而目前主要的問題却是：運動之各種形態與物質狀態

間之相互依屬關係問題，物質構成之間斷性與不斷性問題，以及因果性問題等等。

在第一次爭論時，列甯曾以深刻的辯證唯物論的觀點，駁斥了唯心論傾向的波格達諾夫 (Bogdanov)，在“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中更揭穿了自然科學中的唯心論——馬黑主義之內奧。繼承馬克思與昂格斯所給與的基本原則，而益加豐富的奠定了辯證唯物論在各科知識中運用的基礎。所以，列甯在一九二三年時又曾指示給自然科學家，要以辯證唯物論的觀點解答自然科學上的一切問題。

由此看來，五年來的哲學論戰，乃是在社會發展的途程中，新的演變和自然科學新的進步的必然之果，乃是發展馬克思主義并奠定其新的權威之關鍵。所以，辯證的唯物論者站在馬克思昂格斯列甯所創立的基礎之上，毫無留情的掃清一切因新的環境而必然產生的新的荆棘，而向着新的領域發展，前進，乃此次爭論的主要意義之所在。

本社出版社會科學名著

史的唯物論概說

波哈特原譯 汪馥泉譯

實價每冊四角

本書是通俗資本論的著者波哈特氏從純正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立場，說明史的唯物論的良著。先講解精神的史觀，次指摘經濟狀態說的謬誤，然後敘述社會的變革的概念，及史的唯物論如何說明社會的變革等，本書簡而綜其要，賅而約其博。是一部最好的入門書。

社會主義社會學

藍維斯原著

汪馥泉譯

本書從社會主義的立場，敘述社會學的起源及發達，與關於現在的位置的一般的概念。敘述簡賅平明，採用為中等學校社會學教本，最為適宜。坊間有兩種與本書名相同的著作，然而與本書都是不同的。

中國農業經濟研究

俄國馬扎亞爾著

陳代青 彭章慎 合譯

中國來源為農業國，農民問題是今日最重要的問題。雖然這本「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是著名的中國土地問題的物觀的研究的一個有力的嘗試，而其中內容的豐富實在驚人。要站在三民主義的立場，來研究中國農業經濟，這是一本很好的參考書，全書約四十萬字，分三大卷，很快的就要與讀者諸君相見了。

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與經濟政策

F. Varga 著 李一氓譯

純粹從唯物的觀點來觀察世界經濟的變遷，而按年作為有系統的報告的瓦加氏的世界經濟與經濟政策，其一九二八年的已由譯者譯出。現在譯者又譯出其一九二九年的，歸本社出版。此為上卷，時間由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六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內容除一般的總論，及特殊的各大資本主義國之分述，另有「一九二八年經濟之回顧」，論及楊格計劃的詳細解剖。為研究世界經濟及留心國際情勢者所必讀之書。譯本仍以英譯本為據，并由日譯本加以補充。末附「一九二八年世界經濟與經濟政策」之勘誤表，尤為已購「一九二八年世界經濟與經濟政策」者所宜購閱。

婦女與兒童

陶康父譯

這本書是論婦女問題與兒童問題的書。關於婦女問題的中文書，雖算已有幾種出版；但能根據物觀的立場，對這問題與以敘述并解答者，實難看到。本書中却有二篇長文，根據物觀立場以說明婦女問題的；尤以「赤戀」的著者柯倫泰女士的論社會主義與未來的家族制度一文為更具卓見，能使我們想到社會主義中的婦女生活及家族制度究要變成怎樣。至於兒童問題，在中國更不曾有人提起。本書對於兒童的地位，（是家庭所有，還是社會所有？）教育，養護，勞動等等的問題，却都是要提綱挈領的說明，并暗示解決兒童問題的路徑所在。末附蘇俄的婦女與兒童之地位改變及生活待遇種種實際情形，是供我們留心是項問題者的參考。

黑格爾哲學的歷史意義

樸列哈諾夫著 魏芝譯

——黑格爾的六十週年祭——

六十年以前，在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死去了一個人，這個人毫無疑義的在思想史上要佔一個首要位置。在法國人所稱爲“道德的與政治科學”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這門學問中，沒有一個不受黑格爾天才底絕大影響。辯證法，邏輯，歷史，法律，美學，哲學史，宗教史，——都因受了黑格兒的推動而換了新面目。

黑格爾的哲學滋育了並鑄成了希特魯斯 (Strauss) 鮑愛爾 (Bruno Bauer) 費爾巴赫 (Feuerbach) 費奢爾 (Fischer) 韓斯 (Hans) 拉塞爾 (Lassalle) 及馬克思與昂格斯諸人的思想。當黑格爾生時他已享了廣佈世界的榮譽。他死後，在三

十年代與四十年代之間，他的哲學更風靡了一時。以後反動便來了，人們看黑格爾正如萊新 (Lessing) 時代曼德爾森 (Mendel son) 看斯賓挪莎一樣，就是把他看成個‘死狗’ (馬克思語)。知識界對黑格爾哲學的興趣完全消滅了。學術界對黑格爾興趣的削弱着實可驚：一直到目前，沒有一個哲學史的專家曾指出或願意指出黑格爾哲學對各門學問的影響。他們對黑格爾爲什麼這樣呢？下面要討論一下。現在我要指出的一點是，在不久的將來，對黑格爾哲學的興趣必然有個新的活躍，特別是對於他底歷史哲學。工人運動長足的進步使一般所謂知識階級對於指導工人運動的學說發生了興趣，並使這些人注意此種學說的歷史根源。

他們既有興趣於此，必然會馬上找到黑格爾，這時的黑格爾由他們看來已經由“復辟的哲學家”變成最進步思想的鼻祖了。

因此我們又可以預言，知識階級對黑格爾的興趣雖可再度活躍，但是六十年以前(德國人對他的那樣深的同情將永遠不會再來。反之，資產階級的學者正在熱心的對黑格爾的哲學加以“批評的審查”(critic revision) 且許多博士先生們正在準備同這長眠教授的“極端性”及其“邏輯的任意”爭鬥。

當然在批評的審查中，越發曝露了資本制度擁護者的

底理論之不能立足。俗語說得好“還向真理根上掘”較爲有益。無偏見的人假若對黑格爾哲學重新發生了興趣，便應該根據黑格爾的著作做獨立的研究。這當然不十分容易，但是這是收獲異常豐富的知識工作。真正追求知識的人在黑格爾那裏可以學得很多東西。

在這篇文章裏我想把這位偉大的德國思想家底哲學與歷史的見解加以評價。普通諸點已被昂格斯在其論文中指出。論文名“費爾巴赫及德國古典哲學之終結”(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這篇論文曾在“新時代”(Neue Zeit)上面發表過，後來以單行的小冊子出版。但是我們以爲他的歷史與哲學的見解還有詳細研求的必要。

黑格爾對社會科學的意義在乎他用發展過程(Process der Werdens)的觀點去觀察社會現象，用發生與消滅的觀點去觀察事物。很多人都覺得這算不得什麼功績，因爲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觀察社會現象。但是第一，一直到現下還有許多自命爲進化論者的人們不懂得這個觀點，第二在黑格爾的時候，一般從事於社會科學研究者離這觀點還要更遠。看看當時的社會主義者與經濟學家便可知道。當時的社會主義者把資產制度看作十分有害的東西，同時把他看作人類誤入歧途的偶然產物。經濟學家拚命的歌頌這種怪制度，但

是也找不到相當的頌辭，在他們看來，這也不過是真理的偶然發現所結出的果實。止於真理與錯誤的抽象對立了，兩種人都不能前進一步，雖然社會主義者底學說中已萌芽着一些較為正確的眼光。

黑格爾把這真理與錯誤之抽象的對立看作一件愚蠢的事，謬誤的思攷往往做出此等蠢事。謝夷Seyes說研究經濟學史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亞丹斯密以前的經濟學家通通宣傳一種錯誤的學說。黑格爾說哲學不過是時代的智慧的表现。

每一時代的出色的哲學在其時代中都是真理的，因此黑格爾不以陳舊無用而拋棄任何以前哲學系統。反之，他說：“最後的哲學是一切前代哲學底結果，因此應該包含一切哲學的原則。”（見黑氏百科全書第十三節）。在此種哲學史眼光的根基上橫陳着一個純粹唯心主義的思想，“精神工作（即哲學思想底工作）的指導者是一個統一的活的精神，其能思想的本質歸結到自覺之達到，一旦自覺達到，馬上便會超越已經達到的階段，走向前方。”（見黑氏百科全書第十三節）

但是最徹底的唯物論者不否認每種哲學體系祇是當代理智的體現（自然，他只能是也常只是反映該時代的某些方面。但這不會變更事之本質）。以研究經濟學史而論，則我們的觀點，很顯明的，總接近黑格爾比較對謝夷更接近些。謝

夷的觀點是真理與謬誤之抽象的對立，他認為重商或重農學派不是別的，祇是人類腦筋中偶然的錯誤。可是我們現在知道，這兩種學派都是時代的必然產物。

“假使幣制論者和重商學派分析世界商業，以民族勞動支流為財富或貨幣的唯一來源，那麼，我們便應當知道，那時民族生產的最大部分尚在封建生產形式之下，牠是直接生產者生存的來源。大部分生產品未變為商品，未變為貨幣，即是未成為社會生活中之物質流通品；因此這種生產品尚不是抽象勞動的結晶，事實上他決未成為資產階級的財富。這些被否認的預言家適應資產階級生產預備期，遂堅持交換價值之美善的形態，以通貨（指貨幣——譯者）形態與一切特殊商品對立。（見馬克思經濟學批評德文本一八五九年版一三八——一三九頁。）馬克思闡釋重農學派與重商學派的爭論，是那種勞動組成剩餘價值（同上三三五）。我們說這個問題對於資產階級是很富於時代性”的問題，（資產階級那時正準備要擁有一切），這難道不是這麼一回事嗎？

但黑格爾認為，不但哲學是時代的自然和必然的產物；宗教，法律亦是如此。還要指出的，黑氏認為哲學，宗教，法律，藝術以及技術相與間都有密切的關係：“國家制度之一定形式祇有在一定宗教之下才能存在，某種哲學與某種藝術亦祇有在某種國家制度之下才能成立。”（見歷史哲學一

八四八年版六六頁)。此理極明，誰不知道國民生活的各方面和各種表現，相互間都有極密切的連繫呢？現在每個小學生都能了解此點。但黑格爾對於國民生活之各方面和各種表現的相互連繫，並不像一般“受過教育”的人和學校生徒那樣了解法。在一般人看來這種聯繫祇是國民生活之各方面和各種表現的單純互動。然而這種互動，第一，牠本身尙待說明，第二（而且是主要的）互動的總根源尙沒有着落。所以互動說是空中的樓閣，正如下面的現象：法律影響宗教，宗教又影響法律；他倆又影響哲學與藝術，而後兩者復自相影響而又影響宗教，法律。這種循環的現象是人人所知道的哲理。這樣解說某一時代的事物，或許新令我們滿意的。但是根本問題還未解決，就是哲學，宗教，藝術，法律諸科學之歷史發展，是什麼決定的呢？

以互動來答覆，無論如何是說不出什麼；或者以某種偶然原因（國民生活中之相互關係），但其中仍無共同點；再不然，求之於人之主觀邏輯，此方說非希特之哲學體系是來源於康德，由菲氏而謝林，由謝林而黑格爾。藝術學派也可用如此邏輯去說明。這自然不無部分的真理，可是等於沒有解釋。大家知道由某一哲學體系或第一藝術學派轉到另一體系或另一派時，有的祇要數年，但有的竟經數世紀之久。這種分別從何而來的呢？邏輯的觀念就不能解釋了。互動說或

偶然原因論都是會不能爲力的。但“有教育”的人們都毫不動色！他們不深思生活各種關係中的根源，對於那些尙值推敲的“現象”，正是唯一值得用一番科學的思維的地方。他們却停止思索了。黑格爾與此是天壤之別。他說過：“以相互影響的觀點分析物之實質，如爲人所滿意的時候，在瞭解意義上說這真是可憐極了；這不過是抓住了枯燥的事實；究竟根源何在，却沒有找出。相互說的缺點，就在互動是互等的意義，他本身還要研究的，就是說還有最高的第三者存在，他本身不是直接的動力。”（見百科全書一五六頁）。這就是說，在我們論及國民生活的各方面時，我們應該——不以指出其交互關係爲滿足——要找出一個新的，更高的解釋，亦即是要說明這各種現象之所以存在以及其互動的了然性，究竟由什麼來決定。

這新的更高的解釋從何處去找尋呢？

黑氏之答案是在國民精神的特性中去找。他的觀點是非常合乎邏輯的。一切的歷史他以為祇是“大精神的闡發與實現”。大精神的進展須經過一些階段的。每個階段各異並各有其特殊原則。特殊的國民精神在歷史上就是這每階段中的原則。在精神特性中，就某借地表現人民覺悟與意志及其真實性；宗教，政治制度，道德，法律，習慣以及科學，藝術，與技術等都是精神特性的標誌。這些局部的特性祇有

以精神的普遍特性來說明；反之，這普遍特性亦唯有從人民特殊歷史事實中才可以找出。（見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七九頁。）

由此可見黑格爾對世界史的觀點完全是孕育於純唯心論的胎裏。這如黑氏所說的一樣，每個人，甚至未進過研究班的人都是看得出的。同樣對黑氏歷史哲學因其極端唯心論而輕視地加以“批評”的也易於限制。常有一些本身不適宜於任何徹底思想的人——常有一些不滿意於唯物論者，而又不滿意於唯心論者的人，他且自以便超於極端性為十分滿足，但實際上祇是糵雜唯心論和唯物論於一鍋的雜燴。黑格爾哲學之所以有會上價值的，就在她沒有一點折衷主義的分子。如果黑氏哲學之唯心的基礎使他感覺太甚；如果她把偉人的天才思想運動過於密切，那末這種情形正使我們要特別注意黑氏哲學；正因為這種情形使黑氏哲學成為無上的教訓。唯心論的缺點在黑氏哲學中就有最好的證明。可是同時牠正教我們徹底思想，誰要酷愛牠的正統學說，他一定從折衷主義中跳將出來。

我們現在知道世界史決不是“世界精神之闡發與實現”就是這樣，我們也不能滿意下面流行的論斷：某種人民的政治制度影響於其法律，而法律又影響於其立憲制度。我們應當同意於黑格爾，認法律，政治構造都有一共同的來源。這

共同來源唯有現代的唯物史觀會告訴我們的，我現在所要指出的，祇是折衷論的先生們非常地難瞭解牠（唯物史觀），只如他們難於明瞭黑氏唯心觀一樣！

黑格爾每當評價任何偉大人民的時候，他發現各方面的知識與偉大的理解；不僅如此，並且下了光榮而深刻的批評，附帶地對某人民歷史之各方面，也有價值的說明。他引汲我們，並使你忘記了與唯心論者一塊，使你承認他那法則：歷史是不停留的。（die Geschichte nimmt, wie Sie ist.）承認他嚴守他的規則：“堅持歷史的，經驗的地位”。爲什麼黑格爾要歷史的，經驗的地位呢？爲的是要決定某人民精神的屬性。我們已經知道某個民族的精神就是總精神發展中之一階級；總精神的屬性決不是從研究全世界的歷史得出的；總精神是原來存在的各方都很完整的一個觀念。從這裡可以得一個結論，就是當歷史同總精神的觀念及總精神發展的規律沒有衝突的時候“他是不變的”（as it is）。黑格爾站的是歷史經驗的立場。但是有時歷史並不和總精神發展的規律衝突，只簡單的走出了原定發展的範圍，黑格爾卻沒有談過這個問題，他沒有注意到。這種對歷史的觀點好像可以把黑格爾從自相矛盾中救出，實際上却不然。黑格爾並沒有擺脫了自相矛盾。下面是個十分顯明的例子。黑格爾用下面的話談過印度人的宗教觀念。

“愛，天，一言以蔽之，一切精神的存在物在印度人的想像中是沒有的，所有他們能想像的東西都以感覺的形態而出現，於是印度人就永遠跳不出感覺的範圍。因此，他們宗教崇拜的對象不是人工製造的奇怪形像便是自然物。每一個飛鳥，每一個猿猴都可作神祇。印度人不能用理智的眼光去觀察任何平常的事物，因為這樣觀察需要很複雜的反應。”（見黑氏歷史哲學一九二，一九三節）

黑格爾根據這些敘述而想着印度人只會從其天然環境中來取得崇拜的對象，因此他結論說印度民族的精神是總精神發展中一個較低的階段。古代的波斯人崇拜三光即“日月，及五星”以為是“阿而木斯達Ormsda的聖像”黑格爾就以為波斯人比印度人高一等。但是我們再來看一看同是這一位黑格爾先生怎樣談到古代埃及人的對動物的崇拜。

“埃及人的偶像大部份都是動物崇拜。我們近代人是不會崇拜動物的。我們習於以天作神，但不會崇敬動物。但是崇拜日月星辰的民族並不見得比崇拜動物的高一等。反之，埃及人在動物世界中深思了內在的神祕物”。

同樣的都是動物崇拜，但是在黑格兒眼中却發生兩種完全不同的意義，看他對印度人及埃及人的論調而知。為什麼這樣子。難道印度人崇拜動物的調門當真和埃及人不同麼？不然。不過因為埃及人的民族精神是直接過渡到希臘的

民族精神的，在黑格兒的分類中佔有較高的位置，因此黑格兒不情願把他貶黜到低級民族精神裏去，像對印度一樣。同樣的黑格兒對於印度的等級(Cast)及埃及的等級也執持着完全不同的待遇。據黑格兒的意見印度的等級是“由天然的差別劃定的”，因此印度的個人比支那人還要小視自己，支那的一切人在專制帝王前面保持一種無形的平等。說到埃及的等級呢，他們“都不是固定的而是產生于互相鬭爭，互相接觸中。時常有等級瓦解而又重新樹立”。但是就在這裏黑格兒也不能說在印度的等級中沒有相互鬥爭相互接觸。在這裏，同在動物崇拜的問題中一樣，黑格兒很可笑的亂用了他的邏輯，在社會生活中完全相同的兩個現象，但是黑格兒做了完全不同的結論。不甯唯是。在我們的眼光下，唯心論最致命的地方却另有所在，當黑格兒說到歷史運動的重心從一個民族轉到另一個民族的時候，或是當某個民族的內部狀況發生變化的時候，才是他最露破綻的地方。這時必然要談到過渡或變化的理由，這時黑格兒先生真像十足的唯心論者，只從這個精神的性質中去找答案。他老先生曾自己問過自己，究竟為什麼古代的波斯滅亡了而中國同印度却繼續存在。下面是他答案的楔子。

“首先應當掃除一個謬見，以為繼續可存在證明一種什麼優良點，不可摧毀的山岳不見得勝過容易凋零的玫瑰”。

這個楔子無論如何不是個答案。再看他下面的議論。

“在波斯一開頭就有了和天然相對立的自由精神的原則，因此使這個存在物萎謝了而走向死滅。在波斯王國中實行著一種和自然分立的原則，因此他比屈服於自然下面的民族要高一等。（指印度與支那——譯者）這裏表明了進化的必然性。精神既然發覺了自己便應當自己執行。支那人實際上不過是些死人，印度人則是些自殺的人，自限於婆羅門的教義中在渾渾沌沌中把自己活活葬送。這裏面沒有任何變化，沒有任何進步，因為想要往前運動只有在精神得到獨立性時。在波斯的星辰中已開始了精神的思索，這時精神與自然是融和的。……因此在波斯一切事物還是自由的，就是說所有民族都不受壓迫，各保有自己的財富，自己的制度，自己的宗教。這一點上波斯同希臘比起來算是個弱點。”

在這冗長的議論中只有最末幾行談到了波斯王國的內部組織，談到了在衝突中不如希臘的地方，只有最末幾行可以算是解釋波斯滅亡史的企圖。但是這種解釋的企圖同黑格兒的唯心史觀絕少相似。波斯內部組織的弱點似乎很難同波斯人的星辰發生聯繫。黑格兒當對於唯心論很忠實的時候，便失掉了解釋事實的能力。唯心論者隨時隨地都遭受這種包圍。隨手再找來個例子譬如談希臘內部分解這個問題吧。據黑格兒說希臘是個美與“優美道德習慣”的世界。希

臘人是卓絕的忠於祖國的，能幹的而且自信的人。但是他們却“不費思索”的完成了他們的偉業。

祖國對於希臘人是萬分必要的，沒有祖國，希臘人不能生活。只有到後來的哲人派（Sophist）才談到原則，才有了主觀的思索，才有了道德的自覺，才有了每人應當不違背自己信念的學說。從此時起，上面所謂“優美的道德習慣”就開始解體了，“內心世界的自解脫”招來了希臘的衰亡。這所謂內心世界的一面便是思維。在這裏我們遇到了一個有趣的歷史現象，就是思想力成了腐化的原則。可以注意的是這種觀點已較日光直射的啓明派為深刻。啓明派說一切民族的思想的進展都毫無疑問的直接的導向進步。但是還有問題沒有鬧清楚究竟這“內心世界的自解脫”又從何而來。黑格兒的唯心哲學答道：“精神只能很暫時的停留在優美道德習慣的觀點上。”但是這又稱不得個答案，而只是把這問題翻譯成爲黑格兒唯心論的哲學用語而已。黑格兒自己也覺到這一點了，於是急急忙忙的加上了一句說話腐化的原則首先出現於外部的政治發展上，如希臘各國的交互戰爭，及各城中的黨派鬥爭上。在這裏我們已經找到了一個具體的歷史的立足地。黨派的鬥爭據黑格兒自己說是希臘經濟發展的結果，換句話說政黨的鬥爭不過是希臘各城經濟矛盾的表現。如果我們記得皮路朋尼思（Pelopenesian war）戰爭，根

據撒西底的斯 Thucydides 的歷史敘述，這戰爭不過是普遍全希臘的階級戰爭而已。從這裏不難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希臘分解的原因應向經濟史中去找。這樣子黑格兒所說的簡直是唯物的歷史觀，雖然他把希臘的階級戰爭只當作分解原則的現象。用黑格兒的名詞來說可以說唯物論是唯心論的真髓。這種出人意表的事情在黑格兒的歷史哲學中觸目皆是。最大的唯心論者好像是生來專為唯物論打掃場子的。說到中世紀的城市的時候，他放棄了對唯心論的忠實，把這歷史看作一方面是市民反教會反貴族的鬭爭，一方面是市民中不同層級的鬥爭，“殷富的市民與平民的鬥爭”。黑格兒也曾談過宗教改革，他一開始只雲天霧地的談他的總精神，但是談到後來突然跳出唯心論者圈子對新教的傳播作出下面的結論。

在奧大利在巴瓦利在波希米宗教改革得到很大的的進步，雖然說是真理一入人心有力難以拔出，但是到了最後，宗教改革還是在鎗劍與狡猾的下面失敗了。斯拉夫民族是個農業民族，農業造成了主人與奴屬。在農業中自然有最大的作用，一切人為的努力及主觀的活動在這項事業中都沒有好大作用。因此斯拉夫人很慢而且很難走到主觀的自覺及總的覺悟，因此他們不能夠參與這個解放運動。

在這些話中黑格兒很乾脆的告訴我們想尋找某個民族

的宗教觀點的來源及其一切解放運動的原因，必需向這個民族的經濟活動中去找。這還不夠。黑格兒又用他的唯心論的觀點去解釋國家說：“國家是道德觀念及道德精神的實現；這精神自己發覺了自己的最清楚最實在的意志，這意志能思想自己知道自己並且能夠執行他所知道的他所想的”。這樣說來黑格兒所謂國家並不是別的，不過是經濟發展的產物而已。

黑格兒說：“真正的國家真正的政府只有什麼時候才可樹立起來呢？只有當有不同的階級存在的時候，只有當財富與貧困都已十分顯著的時候，只有當大多的人用平常的方法已經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的時候”。（見黑氏法律哲學第二五七節）

據黑格兒說婚姻的歷史起源也與人類的經濟史有密切的聯繫。

一切國家的真正起源及最初基礎同婚姻制度的成立一樣是起於農業的。因為農業建立了私有財產，從野蠻人的不穩定的生活引到私有權的穩定，保證了個人需要的滿足，同時用婚姻制度限制了兩性的愛，把性的關係變成了長期的結合。簡單的需要的滿足變成了家庭的負擔及家庭財產之之據有。（見歷史哲學導言第一〇六節）

這種例子我們可引得很多，但是篇幅有限所以我們再

只說一個問題就是黑格兒所謂“世界史的地理基礎”這一問題。

究竟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的歷史發展有何種意義，在黑格兒前在黑格兒後都有不少人談到這個問題。但是不論是在前或是在後所有的研究者都犯了一個同樣的錯誤，就是他們只是注意到了自然環境對於人類心理的影響或是對於生理的影響，完全忘記了他們對於社會生產力之狀態的影響及透過生產力狀態而對人與人間的社會關係及其一切思想結構的影響。除了特殊的不談，一般的說來黑格兒是跳過了這個大錯誤。據黑格兒的意見，地理環境有三種不同的類別：（一）無水的貧瘠的高原及其附帶的廣大的原野及平原，（二）被大河穿過的低原，（三）沿海地，和海洋有直接的關係。

在第一種，牧畜佔優勢；在第二種，農業；在第三種商業及手工業。根據這種根本的差異，在這些地方居住的人口也產生了不同的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在貧瘠的高原居住的人如蒙古人，過的是族長制度的游牧生活。嚴格的說來他們是沒有歷史的。不過時常聚積較大的人羣，如風暴一樣侵入文明國家，在去後遺留下空虛與破毀而已。文化生活開始於土地肥沃的河谷裏。（如中國，印度，巴比倫與埃及便是這樣的河谷，於是在這些國家中興起了偉大的帝國，形成了龐大的

國家。這是因為這裏有農業，這是個人生存的根本，一年四季的節氣有規律的更替，產生了正確的職業；這裏出現了土地私有制，及其有關係的法律關係”。但是住在低谷的農業人民也以其太遲緩太固着於本地太閉塞見稱，他不善於利用自然環境中的一切以幫助他們的交通及關係。在沿海各國中的人民便沒有這個缺點。海不隔人而聯人。所以濱海各國的文化及人類覺悟之發展達到了發展的最高階段。找例子不必跑遠路，拉到古代希臘便夠了。

讀者大概知道一八八九年出版的梅奇尼攷夫的書的吧（梅奇尼攷夫 L. Mechnikoff 是十九世紀後半期一個天才的俄國地理學者曾在法國作了多年的地理教員後來死在法國。樸列哈諾夫所指的書最初即以法文而出版書名偉大的歷史河流——譯者）

梅奇尼攷夫當然是傾向唯心論的。但是他這本書却大體上是站在唯物論的觀點上。但是這位唯物論者（地理學上的）在解釋地理環境的歷史意義的時候却完完全全和唯心論者黑格兒的觀點相同。

黑格兒用地理環境的影響去解釋原始社會中不平的原因。黑氏曾指出在梭倫以前的阿提加（希臘之一部包括雅典等城市——譯者）他的閥閱的不同（他所謂閥閱是指着住在山地上，平原上或海濱上的較富較貧的人們）便根據於地域

的差異。當然，不成問題的，地域之不同及執業之不同必然對原始社會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可惜近代的研究者對於這一點都不曾注過意。

黑格兒並沒有很用心去研究政治經濟學上的問題，但是他那異人的天才，在這裏和在別處一樣，幫助他去抓住了現象的最根本最實在的方面。黑格兒比一切現代的經濟學者連李嘉圖也在內，都要更清楚的了解在一個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社會中，一方面是財富的增加，另一方面必然伴着貧乏的增加。他在歷史哲學一書中特別是在法律哲學中都很切實的談到了這個問題。用他的話來講，就是這種歷史的辯證，降低了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程度，以致他們不能照常的去滿足自己的要求，同時又把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必然在國民社會中產生一個現象就是缺乏財富（雖然一方面財富過剩）就是說沒有十足地去清除過多的貧困及人口中的賤民(das Pobels)。

因此這個國民社會（這裏黑格兒指的是英國）必然不得已而走出自己的本來範圍而去尋找新市場，於是轉眼光於世界貿易及殖民政策。在黑格兒的同時代人中只有傅立葉有這樣清淅的眼光，這樣透澈的了解了資產階級經濟關係的辯證法。

讀者或者已經注意到，無產階級在黑格兒眼中只一種

賤民或下流人 (Pöbel) 沒有能力能夠享受國民社會中的精神特權。黑格兒沒有注意到現代的無產階級和古代的無產階級(譬如羅馬的)有了很大的差別。他不曉得在近代社會中放在工人身上的壓迫時常引起這個階級反抗行動，他不知道在現代社會中無產階級在智力關係方面已經追過了資產階級。但是這些東西連烏託邦社會主義者也不知道，他們眼中的無產階級也不過是命運悽慘很直得憐憫的下流人而已。並不會自動做什麼事情。只有科學的會社主義才會了解近代無產階級的偉大的歷史意義。

總結以上，唯心論者的黑格兒除了用唯心論的觀點之外不會用別的觀點來看歷史。他用盡了一切天才的力量，用盡了一切辯證法的大法力想為唯心史觀多多少少添一些科學味兒。但是他的企圖失敗了。他自己好像也不滿意他的收穫，他於是不得不從唯心論底雲霧瀰漫的極峯上跳到經濟關係的具體地面上。當每次黑格兒乞靈於經濟的時候經濟總要把從他唯心論的泥途中拔出。經濟的發展成為決定歷史發展整個行程的路標。

於是科學更進一步的趨向便由此決定了。黑格兒死後，哲學過渡到唯物論的完成不只是十八世紀原始的玄學的唯物論的簡單的反映。在我們所研究的歷史解釋的問題中唯物論就不得不乞靈於經濟，假若不如此，則不但為不能比

黑格兒的歷史哲學進步，反而開了倒車了。

唯物論對自然的了解還不是唯物對歷史的了解。前世紀的唯物論者(指十八世紀的——譯者)用唯心論者的眼睛而且是最幼稚的唯心論的眼睛去看歷史。當他們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的時候，他們總是打算着用思想史去解釋去說明全部歷史。他們從安那克撒哥拉 (Anaxagorus 希臘哲學家——譯者) 的名言“理性支配世界”一語中引申出來說人類理智支配歷史。人類歷史中不幸的幾頁，據他們說是理智發生錯誤的結果。如果某國的人民還很耐心的忍受專制政體，這不過因為他們還不了解自由的好處。如果某國人民迷信，這是因為他被那按照自己利益。而虛構個宗教的祭師欺騙了。如果人類還受戰爭的苦，這是因為他沒有能夠明白戰爭的損失及害處。夠了！前世紀初葉那出色的思想家維可 (Vico) 已經說過：“觀念的行程決定於事物的行程。”但是唯物論者却想得相反：社會事物的行程決定於觀念的行程；至於觀念的本身則決定於……什麼形式邏輯的法則及知識的積蓄。

黑格兒的絕對唯心論比這些幼稚的唯物論者走得要遠得多了。當黑格兒重複安那克撒哥拉的話說理性支配世界的時候，在他口中的意思絕對不是人類思想支配世界。自然就是理性的體系，但並不是說自然就有意識。“太陽系的運

動依照着不變的規律而進行；這規律就是太陽系的理性。但是不問太陽或是依此規律環繞太陽而運行的行星都覺不到這規律。”（歷史哲學第十五，十六節）

人是有意識的，他可以樹立一個自己行動的固定目標。但是並不能因此而說人要怎樣，歷史便會怎樣進行。但是每一個人活動的結果往往有個不變的方面，而這不變的方面往往造成了歷史的最切要的性質，就是總精神的實現。

“在世界史中，從人類行動中往往引出他們所不要追求的東西。他們所以如此行動，是因為他們的利益要求他們如此，但是結果却得到新東西；雖然這是他們行動的結果，但是却不是他們意識中，他們計劃中的東西。”（歷史哲學卅五節）國家，民族及個人追求其私人的利益，追求其特殊目的。

在這方面說來，他們毫無疑問的都是自覺的，思想的行動者。但是他們都自覺的去追求其私人目的（他們也常常有某種一般的對於善及正義的追求）却不自覺的實現了總精神的目的。

西撒追求在羅馬的獨裁，這是他個人的目的；但是獨裁却是當時歷史的必需；因此當西撒實現了其私人的目的時，又替總精神賣了氣力。因此，每個歷史上的行動者，不論是個人或是一個整個民族不過是精神底盲目的工具而已。精神要驅使這些脚色爲自己而工作，他把工作的一小部份以

私人目的的形式而分配給他們，他用情慾的鞭子去鞭策他們，沒有情慾什麼歷史上的大事都不會完成的。

這裏對於人並不是一個不自覺的神祕主義。人們的行動總是不斷的反映在其自己的頭腦中，但是這種反映並不能決定歷史運動。事物的行程並不決定於觀念的行程而決定於別的不依賴於人的意思，超乎人類自覺範圍東西。

人類自隨心願的偶然性不得不讓位於規律性，就是說要讓位於必然性。這就是絕對唯心論比起法國啓明派原始的唯心論高明的地方。絕對唯心論同原始唯心論比起來正如一神教同拜物教比起來一樣。拜物教在自然中並找不到什麼規律性，他們以為事物的行程每一分鐘都會因鬼怪的干涉而破壞。一神教則以為自然的法規是由上帝來創造的，但是他又承認（至少當他已發展到較高的階級而和神蹟絕緣時）這些事物的行程只由這些一次創造出來的規律來決定。完全同樣，絕對唯心論者，他們在人類心願以外去找歷史運動的解釋，想對歷史現象作個規律的解釋，但是想完成這個解釋必須肅清一切精神底假設，因為這種假設在歷史現象的說明中完全不中用。

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者對歷史行程的觀點是說人類理智支配歷史，他們的結論必然是：從今以後我們可用開明的理智及哲學使一切事物井井然有次有序。但是，別緻的

很，絕對唯心論者黑格兒却把哲學的作用看得有限得很可憐得很。

在歷史哲學的序言中說：“至於說到世界應當怎樣這個問題，則哲學總是後出的。只有當實際已經完成其形成的過程而有了固定的外形時，世界思想的哲學才會出現。”

“當哲學在實際的灰色粉底上用灰色的顏料開始描畫時，他已經消逝了，他的青春已經不能再歸，這一點我們應當認識。敏尼而瓦的貓頭鷹只有到黃昏以後才可飛出來”。

在這裏黑格爾又跑得太遠了。當然我們完全同意說，哲學不能使死去而且腐敗了的社會制度復活，但是我們要問問黑先生當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從舊的中蛻化出來時我們可以不可以把這新社會的一般特點指出呢？哲學應在現象的發展過程中去觀察現象。但是發展過程是有兩方面的生長與死滅。在時間上這兩個方面是可以分開的。但是在自然中特別是在歷史中，發展的過程在每時每刻都是個兩重的過程：消滅了舊的，同時在舊的廢墟上又產生了新的。哲學只認識是什麼樣，而不認識根據某某的意見應當怎樣。究竟在每時每刻是什麼樣呢？只是舊底死亡新底孕育。如果哲學只認識舊的，則知識必然是片面的，不能完成其認識現實的任務。但是黑格兒對有認識能力的理性的全能是相信的，這又和黑氏的信念矛盾了。

最新的唯物論是不含這許多偏激性的。這唯物論根據其本世紀的現狀及過去能夠論定將要發生什麼。但是不要忘記了，發生這個觀念和應當如何的觀念是完全異趣的。對於我們將要發生什麼是死亡了的過去之必然結果。如果我們知道將要發生的是這而不是那，這是因為社會發展的客觀過程，這發展引我們去認識將要發生的東西。總而言之我們不要把我們的思想同圍繞着我們的生活對立起來。

但是黑格兒所批駁的人對於這個問題完全不是這樣看法。他們以為思想可以隨心所欲的去變更生活發展的自然行程。因此他們就不必要研究，不要注意這行程了。他們對於應當如何的觀念並不根據於實際周遭之研究而組成，反之是根據於正義或常態的社會制度底論斷。其實呢這些論斷說的還都是現存的周圍的實際（往往是他的反面）。如果根據這些論斷則等於承認現存的實際而不加以批評而不加以研究。這等於觀察一個物體而不直眼去看他却從一個凸光鏡子中去看他的影子。如此，錯誤及失望是免不了的。這些人越是忘記了他們應當如何的觀念是從其周圍實際中產生出來，他們越是迷信，可以用這些觀念為武器而隨心所欲的與實際周旋，同時，他們所追求的和他們所達到的兩個地方的距離越是遼遠了。隔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和法國啓明派所夢想的理性的國度中間的是多麼長的距離啊！

這些忽略了實際的人物們其本身仍是擺脫不掉實際規律的束縛，他們只是不懂得這些規律或是不會利用這些規律以完成其自己的目的而已。因此他們的目的便永遠不能達到。啓明派的觀點不多不少只不過自由與必然底抽象對立而已。

驟然看來好像是如果承認了必然支配歷史，則人的自由活動不是沒位置了麼。這個大大的錯誤已經被德國的唯心哲學糾正過了。色林 Schelling 已經說過如果正確的觀察一下則自由就是必然，而必然也就是自由。黑格兒更徹底的把這自由與必然中間的矛盾解決了。她說，只有我們認識了自然底及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的時候，只有屈服在他們底下只有依靠在他們身上，我們才可以自由。不論在哲學的領域內或社會科學的領域內這都是個偉大的發明。但是只有近代的辯證唯物論才能充分的應用這個發明。

× × × ×

唯物論對歷史的解釋或說明是運用辯證的思想方法的。在黑格兒以前本來就有辯證法。但是黑格兒用起辯證法來是一切前代人所趕不上的。在天才的唯心論者的手中辯證法成了認識一切現實的最有力的武器。黑格兒說：“辯證法是一切科學研究的神髓，他是能夠幫助科學的內容去獲得永遠聯繫及必然的唯一的原則。他擺脫了一切抽象的定

義及世俗的觀念，而抓着了具體。事情的真相不是一個東西完了便算完了，而是應當毀滅，並且依據其原有的內在的本性而變到相反的方面”。（見黑氏百科全書第八十一節）在黑格兒忠實於辯證法的時候，無論如何他是個較高級的進步的思想家。“我們說一切事物都逃不出辯證法的羅網；辯證法是籠罩萬有的偉大的力量，他可以摧毀一切。”因此黑格兒那話說得很對，他說對辯證法的清楚的了解及正式的學得是萬分重要的事情。辯證的方法是德國唯心論傳給其繼承者現代唯物論的最重要的科學的武器。

但是唯物論不能以唯心的形式而應用辯證法。要用他首先就要揭去他神祕主義的面幕。

一切唯物論者中最偉大的是卡爾馬克思。他的天才絲毫不見遜於黑格兒，他是這位大哲學家的真正繼承者，只有他才有全權來說他的方法是和黑格兒的方法完全對立的。“對於黑格兒，他的邏輯的過程（他名之曰觀念）變成了獨立的主觀，是一切實際的主宰。對於我則剛好相反：觀念物不過是在人類腦筋中泡製過的物質物而已。”（資本論序言）

因為馬克思所以唯物哲學才能成為完整的調協的澈底的宇宙觀。我們知道前一世紀（十八世紀——譯者）的唯物論者在歷史領域內還是些十分幼稚的唯心論者。馬克思把唯心論從他最後的避難所中趕出去。正如黑格兒一樣，他把人

類歷史看成一個有規律的過程，並不依賴人類的自願；正如黑格兒一樣他在發生與消滅的過程中去觀察現象；正如黑格兒一樣，他不以歷史現象玄學的無結果的說明自滿，最後也正如黑格兒一樣，他在努力去尋找社會生活中一切動力及互動力的總的唯一的根源。但是他並沒有在絕對精神中找到這個根源，却在經濟發展中找到了。同樣的經濟發展，黑格兒也時常向他乞靈，當唯心論在他那樣有力而巧妙的手中也變成了不中用的兵器時。但是那在黑格兒手中不過是偶然的天才的謎語，到了馬克思就變成了嚴格的科學的研究了。

近代辯證唯物論談到人類不自覺的製造歷史這個真理時要比唯心論高明多了。據他的觀點歷史行程最後不決定於人類意志而決定於物質生產物的發展。唯物論也曉得貓頭鷹什麼時候可以開始飛翔，但是這個鳥兒的飛起，正如別的事物一樣並沒有什麼奇怪。唯心論者所找到的自由與必然的關係，近代唯物論把他應用到歷史中去。當歷史發展的動力在人類背後活動而未出現於人類意識中時，人類總是不自覺的在製造也應該製造全部歷史。我們既然曉得了這動力，我們既然研究了行動的規律，則人們便可以用自己的手去操運這動力及規律以達到其自己的目的。馬克思最大的功績在乎他發現了這個動力，並且對於這動力的行動作

了很精細的科學的研究。據一般俗人的意見近代辯證唯物論把人都變成了機器，但是實際上他是在歷史上第一次發現了到自由與自覺活動之領域去的道路。但是想達到這個領域只有根本改變了現在的社會活動才有可能。這些俗人們覺悟到了或是預覺到了這一點。因此唯物的歷史解釋簡直使這些俗人們不舒服不好過；因此沒有一個俗人能夠也不願意全部了解或接受馬克思的理論。黑格兒把無產階級看作暴民。但是對於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是個偉大的力量是未來的擔負者。只有一個無產階級能夠接受馬克思的學說（不講例外），我們也可以看到馬克思的理論已經一天天的深入於無產階級心中。

各國的庸俗學者都在喧嚷，說什麼在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除了資本論以外沒有什麼了不得作品。第一，這不正確，第二，這即令正確也不能證明什麼？當某和思想一天天取得了更多的廣大的信徒的時候，當他在一個整個的社會階級面前展開了一幅新的寬泛的遠景的時候，難道我們可以說這思想停頓了麼？

黑格兒談起雅典人，簡直發了狂；雅典人前面排演過了索非克里斯 Sophocles 與愛希拉司 Aeschylus 的悲劇，在雅典人前比利克利斯 Pericles 賣弄過他的妙舌，從雅典人中闖“走出些人物可為百代的古典榜樣”。我們不難曉得黑格

兒狂熱的原因。這裏我們首先應當指出雅典人是個奴隸所有者民族。比利克利斯的面孔並不是向着奴隸，許多偉大的藝術創作都不是爲奴隸而設。在我們這個時代科學的面孔已轉向勞動者，我們可用發狂的熱情去看待現代的工人階級；最深刻的思想家已轉向工人階級，最天才的演說家已向工人階級弄舌了。只有現代，科學與工人才最後結得了緊密的不可撕破的結合——這結合正是世界史中最偉大最有收穫的時代之開端。

有時有人說辯證法的觀點同進化論的觀點差不好多。當然這兩個方法是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但是我們要知道在我們面前存在着一個十分深刻十分重要的發展，他是頗不利於進化論的學說的。近代進化論者在他們的學說還羶雜了不少的保守主義的糞糠。他們總是想證明，不論在自然中或在歷史中是沒有躍進的。另一方面辯證法深切的知道，不論在自然中，在人類思想中和在歷史中，躍進都是必然的。同時，在任何時候，變化都是依照着一個不斷的過程而進行，這一點辯證法並不否認。他只在努力說明在許多條件之下，循循漸進不得不引到躍進。

據黑格兒說，烏託邦也有值得同情的歷史意義，因爲他發覺了現代社會所含有的矛盾。辯證法唯物論對於烏託邦也給以同樣的估價。但是幾個改革家的烏託邦計劃並不能

決定正在生長着的工人運動，到是生產法則與交換法則決定了這運動。因此現在的烏託邦社會主義者已經和前幾世紀的空想家相反；他們現在的活動已經不是改革家的活動，不過是冀圖停止歷史車輪的運轉而已。

在我們這個時代有個最特別的現象就是向烏託邦追求的不是那些空想的改革家到是他們的敵人。這些空想家現存的醜惡的實際之辯護者時常想騙自己騙別人說什麼現存的實際本身是包括很多優點的，因此我們的任務不過是把他的醜惡及污濁的地方排除了便算了事。說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不得不把黑格兒關於宗教改革的一段議論引來看看，他說“宗教改革是教會腐化的結果”。但是腐化並不是個偶然的現象，他不簡單是當道與權門濫用職權的結果。在這裏有人就說，根本是很好的，事物的本身是完美的，只壞在情慾及個人利益，總而言之，人們的偶然意志往往要利用財物以滿足自己的個人的欲求；因此我們把“偶然”排除了便沒有什麼事了。……這種觀點太姑息事物了，推開了罪惡的責任。當然偶然濫用些小事物，這是局部問題沒有什麼。但是，現在完全是兩會事。現在我們說的是在大的總的物體—教會中犯了大的總的罪惡。”（歷史哲學第四九七，四九八節）很清楚的，有些人，當我們說到要根本改變某事某物的本身的時候專門喜歡援引些偶然的局部的罪惡以粉飾，黑格兒

對這些人的同情是很少的。黑格兒哲學中一貫的勇敢的澈底的精神對於這些人簡直是一種可怕的怪物。

也會有個時候，在維新者的營壘中跳起來一些人來反對黑格兒。他們對當時的普魯士實際的腐儒的見解使他反對這位大哲。這些黑格兒的反對派大大的錯了：他們沒有能夠在這反動的桃子中找到維新的核。但是無論如何這些厭惡黑格兒的人們，他們的動機是善良的，因此我們對他還應當表示尊敬。在我們這個時候大家都已承認了黑格兒是個資產階級的代表學者，因為大家都明白了或是很本能的覺到了黑格兒哲學中的革新精神了。因此大家對黑格兒的功績都不願意談到了。大家都喜歡把康德與黑格兒對立起來。差不多所有教授講師都以傳揚康德的哲學系統為莫大職責。我們也願意以康德的所有還給康德，我們也不去批駁康德的功績。但是資產階級學者所崇拜的並不是康德哲學的優點，而是他的弱點是他的批評主義，這實在太令我們齒冷。康德哲學系統中所包含的二元論正是現在資產階級的社會思想家所最顛倒的地方。二元論在道德問題中正是個最方便的傢伙。在二元論的助力之下可以建造一個最完備的理想。他可以令你遠行不歸，大胆的遊心於“較好的世界”中，但是他並不令你思索究竟怎樣把這理想體化而成為實際。怎樣好呢？譬如在理想中你可以全部消滅現存的階級，

你可以掃除了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剝削，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却去作階級國家的辯護人。據這些人想，理想好像是不會實現而成爲實際，黑格兒以此爲對人類理性的莫大誣蔑。“一切合理的都是實際的，一切實際的都是合理的。”他這句話曾引起了很大的誤會，不但是德國，在外國也一樣，特別是俄國。誤會的原因是因爲他們沒有能夠很清楚的懂得，黑格兒所謂理性與實際是什麼意義。但是無論如何，即加以字面的平常的庸俗的解釋也好，這句話的前一半“一切合理的都是實際的”依然會有很觸目的革新的內容。把這話應用到歷史上，依然變更不了他的意義，他必然是一種堅不可搖的信念，認爲一切合理的不能停留“在非人間”而應轉變到實際。如果沒有這種前途光明的信念則一切改革者的思想都會失去了實際的意義。據黑格兒，歷史不過是世界精神（即理性）在某時某代的表現或實現。用這種觀點怎樣解釋社會形式的不斷更替呢？只有這樣才可解釋，說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渾沌會變理性，惡會變作善”，理性也會變到相反的方向，變成渾沌，這種理性也不是什麼值得尊敬的事情。當西撒攫取國家政權的時候，他破壞了羅馬的憲法。表面上看來這種毀壞當然是一種犯罪的行動。西撒的反對黨也可以自己把自己看法權的保障者，因爲他自己佔在合法的地位上說話。但是他們所擁護的法律其實“只是一種形式的法

律，失去了活的精神被神祇所擯棄”。因此為破壞此法律而生的犯罪，不過是形式的犯罪；因此想替西撒破壞羅馬憲法作辯護也是十分容易的事情。

關於蘇格拉底，(他是被判為統治道德的敵人) 黑格兒有下面的話：“蘇格拉底是個英雄，因為他自覺的認識並且自覺的說出了一個較高的原則。最高的原則有絕對的法權，一切世界史中的英雄都待着這種意見，穿過這些英雄才走出來新世界。新的原則和現存的原則是矛盾的，因此新原則好像是個破壞者。因為這些原故，所以許多英雄才用暴力去破壞法律。他們的個體會滅亡的，但是他們的原則，(也許有時會變變外形)是會繼續活動而掘倒現存的原則的”。這裏已經說得相當的清楚了。更要清楚了，假若我們注意到，黑格兒承認出現於全世界的歷史舞台者不僅是英雄們而且有很多民族，他們才真是新的世界歷史原則的擔負者。在這個時候，歷史的活動場所被這些民族的十分寬泛的權利所佔領了。“這些民族正是世界精神發展到某一個階段的擔負者，他們有絕對的權利。別的民族的權利却被剝奪了。但是這些民族的日子過去了。他們已經不能那樣的去參加世界史”。

我們知道在現在這個時候，新的世界歷史原則的擔負者已經不是某一個別的民族，而是一個固定的社會階級。我

們還可以依照黑格兒的精神說一句，一切別的社會階級對這個階級的關係，假若他們參預世界史，他們一定會給他幫助的。

向着偉大的歷史鵠的，在一切前面都不屈不撓的，永進不息的追求——這是偉大的德國唯心哲學給我們的啓示

康德·狄茨根·馬赫 與歷史的唯物論

德國墨林著 葦森譯

在研究歷史唯物論之史的發展時，是脫不開某種不快之感的。當前世紀的九十年代，服膺歷史唯物論的人們曾努力用歷史的著述以確證其在實際上的正確，同時反對牠的人們亦曾用經院哲學的濫調斷章取義的妄加攻擊。但到二十世紀初，情形便不同了。許多歷史唯物論的反對者，卻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採用馬克思之科學的研究方法，因而便必然要拿馬克思來招搖撞騙了，而牠的繼承者們亦爲了歷史唯物論而極其奮發的研究其哲學上的囁語。

於此我們完全沒有干係到修正派，修正派的疑難與動搖而在這一點上則落得相當的無罪。例如伯恩斯坦在他反對歷史唯物論的“前提”所作的辯難，沒有絲毫意義，并根本

不值得談起。現在在馬克思主義中表現有許多幼稚的力量，他們不去用鐮刀開闢荒蕪的田野，而寧願將鐮刀置在鋼板上，將鐮刀錯成鋸齒。俄國同志中間特別盛行的“狄茨根主義”和“馬赫主義”即是這種鋸齒，這種浪費。在其他鄰近的國家，在工人階級有那可欽慕的優勢的國家，那裏亦可找得到質量上和數量上很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崇拜狄茨根，崇拜馬赫更連結起康德之光榮的回憶，要求給我們對於歷史的唯物論以必要的“補充”，好像此種補充是必要的。

如果在這一問題上只是作於關於學理的遊戲，那便完全是在這上頭枉費可惜的光陰和力氣。但是要說明關於上面所述的思想中之大的實際的損失，因為，此種學理的遊戲，恰恰即是我們留給反對者作口實的最珍貴的部份。所以馬克思和昂格思所完成的歷史的唯物論是否還需要一般的補充，是否有待康德，狄茨根，馬赫對他所作的“補充”。對於這些問題提出加以研究，並不是無益的。

首先要說明幾句，關於那極力將歷史的唯物論同自然科學的唯物論遠相分離的企圖，更要指出那關於創造他們彼此間矛盾的企圖。歷史唯物論的產生即與此種企圖不能

并存;如果是用得意的話來講,它(歷史唯物論)已經是自然科學的唯物論的“補充了”,同黑格爾分離之後的費爾巴赫即是那種自然科學的唯物論之代表。

費爾巴赫一般的否認一切哲學,他曾說:“我的哲學就是沒有任何哲學”。自然界離開一切哲學而獨立存在,自然即是基礎,人即在此基礎上生長,而人類的本身亦即自然界之產物,除掉自然界和人之外,並沒有任何東西存在。馬克思和昂格思對此曾是完全同意的;他們的歷史的唯物論主要的並不是在說:“人不是生存在自然界,而是生存在社會之中。”而他們是說:“人不只是生存在自然界,並且還生存在社會之中;人不只是自然界的產物,並且還是社會的產物”,因此他們爲了理解人即社會的產物,而創立了歷史的唯物論。他們之創立歷史的唯物論,乃是因爲牠能夠用爲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的鎖鑰。

歷史的唯物論即是從所有先前的唯物論果敢的前進一步;因此馬克思和昂格思對於所有先前的唯物論的立場,曾是處於批評者的地位。然而,正是因爲如此,他們便不會同先前的唯物論絕緣。縱使那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受到最狹隘的批評時期,——估量標希涅爾,莫萊邵特和佛格特的財富時期,——根據他們的觀點值得責難的還不只他們所指出的那樣多,他們所指出的只不過是其曾時爾採用的那種奇

異形式而已。昂格思之斥責標希涅爾及其同流，只是因為他們將唯物論庸俗化和粗率化了，而馬克思則說：“不承認歷史過程之抽象的自然科學的唯物論之缺點，從其領袖之抽象的意識形態的意像中即已表露出來，也只有他們來決定越出自己的特質之範圍”。很顯然的，馬克思此地所擯斥的并不是自然科學的唯物論，而只是那種唯物論之一定的歷史形態。縱使是莫萊邵特及其同流的唯物論之“特質”他亦曾承認的。他只是指出在此種特質之外，他們却陷於抽象的和意識形態的意像之中了，當然，要說明的是，這種批評乃現存的唯物論的派別之最柔和的批評。

此種唯物論即是法國的唯物論之合盤的再現，是十八世紀反對專制的封建的宗教壓迫之革命的戰爭所曾經用過的。馬克思以及昂格思對於此種唯物論從來是具有極大的同情的，雖使他們曾很明顯的了解了那種在歷史上受當時自然科學的狀況所規定的界限。不過這種界限，這種限制，當標希涅爾，莫萊邵特和佛格特登台的時候，即已經消失大半了。然而，這些人們曾完全是沒有勇氣的，反之，比起他們法國的前輩來其不堅決簡直是不可比擬。在他們著作中所反映出來的，并不是大革命的朝氣，而是小反動之後的可憎的頭痛而沒有出路。固然他們曾經對上帝的名義搬出過憎惡面孔，但是在地上所遇到的那種上帝的奇異代表的面前，

却表示莫大的謙恭敬慕。標希涅爾曾是富利德里希·沃利基之恍惚的崇拜者,赫克爾是尊崇俾斯麥的,而佛格特所意識到的巴拿帕特,縱使是狡猾的,亦是“負有使命的人”而要取法於他的。

在“歷史過程”的範圍內,此種無意義的盲目的彷徨,不僅激起馬克思和昂格思的厭惡,並且還惹得費爾巴赫和阿爾伯特一般人的厭惡。過去費爾巴赫亦曾準備接受莫萊邵特的唯物論。但到後來他又不承認他了,而郎黑曾認為莫萊邵特的唯物論對於自然科學是有益的,但依據哲學的觀點看來,則認為他是淺薄了。他們兩派都不曾找到的那條道路,而馬克思和昂格思於十年前即已找到了。固然馬克思和昂格思亦會同一切哲學決裂,然而却將哲學的歷史之果——歷史發展的意思——移植於唯物論之中了。他們這種思想,首先不是用之於自然界,而是用之於歷史,這在主觀上的解釋,是因為他們兩者並不是博物學家,而是歷史學家;而客觀上的解釋是:為使唯物論不致變為比唯心論更要悽慘的破產起見,必須給以新的支柱。

但同時這即是說明,人類社會的發展係遵循另一規律,與自然發展所循的規律不同。正是因為如此,唯物論曾很堅決的攻擊那:多少對於自然界的規律有相當認識,便認為可以用來對於一切社會問題希望完全無缺的說明,而對於社

會問題並沒有堅定的任何真實的基礎的見解。馬克思和昂格思在歷史的唯物論中曾尋找過並且已經找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至於歷史唯物論的本身，我們此地暫不去詳細解釋。他開始曾是一種科學上的假定，當然，此種假定所需要的並不是“補充”，而是依據歷史的材料給以實際的證明。這種工作，馬克思和昂格思已經開始了，這種工作的繼續，乃是有志在他們這種精神下作工夫的人們之第一個最重要的任務。這即是判定歷史之唯物的認識的確實與否之唯一無二的法門。此種唯物的認識之最懇摯的糾正，最精當的批評，如果他們不是深進到最科學的“成份”，是不能夠證明他的確實性和錯誤性的。

然而，企圖用完全與此不同的觀點，特別是那依附於自然科學範圍的觀點，來“補充”此種理論，會直然走到原先的混亂。當然，自然史和人類社會史，彼此間是在極密切的連繫着。當然，自然科學正和社會科學一樣，亦具有同樣的意義和同樣的重要。但是，正因為歷史發展規律同自然界發展規律之根本差異，在彼此研究中所採用的方法，亦完全不同。

關於這一點必須注意：即自然史與人類社會史間的界限，從來是非常明顯的和確定的。如果歷史的唯物論並不破壞自然科學的唯物論之規律的法則，那末他便能夠且應該

同樣堅持自己規律的法則,堅持那從他整個說明了人類社會發展之規律而產生出來的規律的法則。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即在實際上已被證明他的說明之不正確性時,他才能夠廢除此種法則。

然而,我們來看,他是怎樣的被康德,狄茨根和馬赫所“補充”的。

二

關於康德我們只能限於簡單的幾句話,因為他的時髦性似乎是已在終結了;雖說昂格思曾給以駁斥,稱康德的整個認識論為“哲學的不可思議”,然而我們還應該提及他。固然,康德曾經說過,我們所看到的東西,並不是那種東西的真實形態,而是那種東西由我們的感官所表現出來的形態。然而,他在現象界所研究的,完全不只是一些眼見的現象,而是實際經驗之全部世界,昂格思正想用以反駁他的,亦即康德自己所曾敘述的那些論據,即是,混合土質的證明是在於去咀嚼混合土質。

然而,強認為補充歷史唯物論的康德的認識論,完全是哲學的流產,而昂格思即已窺破他那不全然附着實際的“強辭奪理”了。康德曾希望自己的認識論並不觸害那教義哲

學，而憎望用自己的論據以證明上帝的存在，——這在康德時代是非常可尊崇的任務，但在現在更完全不需要和無差別的了，——他同樣希望阻礙住走向無神論，唯物論，自由思想的不信任之途徑，關於此種企求的本身竟已取得了“國家先知先覺”的聖名。他之企圖廢除知識，乃是爲了要破除信念。當時這種主張已并不特別壯觀，現在則更少鮮豔了。

康德的“物之自體”，由現象的被岸所統治，人的感覺和智慧所窺察不到的“物之自體”，對於任何人都不像對於康德的信徒們那樣嚴重的程度；其嚴重正如石頭一般，雖說這不像石頭那樣笨重。康德的信徒們將“物之自體”竟比作舊的幻想，同豪報鄒列爾白宮的傳說相比擬，而用此種傳說始得從萬劫不復的艱境中拯救出來。新康德派的賢達之士則只是解釋其爲整個認識之總合，以及認識之無窮的任務。這并非驚異謎語的申述，而是無限平衡的說明，這種平衡便是預定認識向前進步的中止。康德是否曾了解到“物之自體”便是此種含意，我們還相當懷疑，縱使有如此或更要聰明些，康德認識論的界說是絲毫說不上新的歷史唯物論的，就連他自己也不會摸到什麼是歷史唯物論。關於這點在昂格思“反杜靈”一書中很可找到說明。

此外，對於歷史唯物論之必要的“補充”尙不只是康德的認識論。並且還有他的倫理觀，對於此點我們同樣的要略

涉數言。康德的倫理觀完全適合於小資產階級環境的條件，而康德自己亦即在這種環境中長成的；資本主義的大生產所造成的倫理的衝突，日以百計，康德這種倫理觀對於倫理衝突，完全是不適用的，更不能幫助這種衝突的解決。康德的先天範疇說乃是摩西十誡之復蘇。他關於人類的自然始而積極作惡的理論——在那原始的神話的觸犯上的變遷——所有這些久已被康德繼承者中之最天才的邵盆高爾證明了。

還有這種立場：“人類的行爲，（在你是如此，在其他入同樣是如此），對於你從來不僅只是一種手段，而同時永遠是目的。”此種立場對於康德並不是別的，乃是那種非道德的非常事實之道德的假面具，即資本主義爲了剝削者的目的而需要自由的勞動者。他們描述封建的生產方法之滅亡，特別認爲是工人的解放，而沒有從中看到：封建的剝削方法變爲資本主義的剝削方法這一轉變，這是資產階級文明所特具的特點之一，是一種欺騙，一切欺騙都是一樣的，是都其很誠意的或藝術的創造，其所稱爲欺騙者，因爲他有意的掩蓋了實際中之最蠻悍的事實。例如法國革命，雖以自由，平等，博愛相標榜，而却剝奪了工人階級的選舉權，即是康德所許可於勞動階級的，也只是居住權，而不是國家享平等權利的公民。對資本主義剝削方法之辯護的意義這一點，乃

是康德百年來所解釋的倫理之基本立場。當德國的大學教授們還不曾從懶散的朦昧中拯救出來，還不曾宣布其社會主義的道德基礎時，這樣的立場實質上在德國的自由主義的作品中，他還起有極大的作用。

所以這種榮耀是屬於那光榮的發現者的，他“很深刻的將康德超越的唯心論發揮盡致”：他將一切後學從那溺人的澗井中振拔出來。

三

談到狄茨根，他從來對於“恢復到康德”，就如同對於“反動的濫言”的關係是一樣的。因此，歷史的唯物論有待於康德之“補充”的說法，狄茨根是堅決而乾脆的否認的。

對於狄茨根的關係，亦正為對於康德的關係一樣，我們首先要剷除他那不正確性，這些不正確性是由馬克思主義方面所指出的，雖說不是由昂格思所指出，而是由一些極少名望的人所指出。在我著的黨史中，我同時曾敘述到：狄茨根曾獨立的發展了唯物史觀。狄茨根同志對此曾有所辯難。他認為他的父親（老狄茨根——譯者）與“共產黨宣言”相結識，只是在一八五二年，而當時他的認識論和他的宇宙觀即已粗具規模了。當他看到了馬克思所給的社會關係的說

明，同他關於思維之特殊學說相吻合時，他便更加興奮起來。這種訂正完全是正確的；這些話在我著的黨史中，我敘述“唯物史觀”時，同時亦曾注意到“唯物的辯證法”了。狄茨根的意見，亦同樣是無條件的正確的，狄茨根的認識論和宇宙觀的雛形，在他同馬克思和昂格思結識以前，即已具備了。狄茨根的“自然一元論”，實際上其本身即帶有費爾巴赫影響的遺跡，關於費爾巴赫，狄茨根總說是第一個啓發他的智力的人。他的“自然的一元論”，同費爾巴赫在一切散文和小品中所解釋的，根本上并無差異：

“真實，你只能有一次。要毫無怨言的順從這個。一切真實的都只有一次。精神生存一次，自然生存一次。生活只是因為生活，其他是不能夠有的。二度存在只是無中生有的幻想；無形的存在，唯一的存在——即是世界的能力，精神和實質。”

假使我們再引一段狄茨根論思維的過程，即論自然的過程，他已完全是歸結到費爾巴赫以下的立場：

“那末，我們——構成自然界的一部份——談到關於自然，而實質上自然的本身即供出他自己，因此，他，（即如其本身所現示的）即是真理。客觀永遠是人類的真理，人類的客觀，因為，自然如同人類的自然一樣，亦是經過人類的自然來表現的。而除開要求主觀性的聲

色，嗅味，哀樂的那種真理或客觀，只有去乞憐於虛無的佛教或無稽的“物之自體”才有可能。他如，在關於感覺之客觀性和真實性的問題上，我並不是從物理的或自然的物體相對立的“我”出發，而是從自身以外的“我”出發，在同自身相對立的有“你”，而對於其他“我”的關係，即同是“你”一樣，都是由感官所得到客觀的，獨立的實質。這雖是感覺的，經驗的“我”，按真正的生活，生活的真理，他是適合於思維的真理，對於我是真理的“我”，“我”如果不願落到一個最粗俗的詭辯家，在一切的問題上，我便應該由“我”出發。如果我懷疑到感覺的真理，那末我便應該同樣懷疑到我的存在的真理和真理的本身。如果沒有感覺，亦便沒有“我”，因為沒有“我”，“我”亦便同樣不是“你”，而“你”只是對於感覺存在。“我”是思維的真理，而“你”乃是感覺的真理。這在人對人的關係上是正確的，人對自然的關係上亦同樣正確。對於自然界他不只是“我”，並且還是“你”。當我們看到——完成目力所及的宇宙之總合過程時，霍布大亦說出大概如下的話。認識即是全宇宙綜合的過程。”

狄茨根談到關於思維的過程，如同談到關於自然的過程一樣，都是用費爾巴赫那種併行的立場，此外，費爾巴

赫又如霍布士之證明他的說明一樣，同樣并不曾搜集有任何新的證明。整個的唯物論都是用自然的過程來估計思維的過程，然而，馬克思或佛希特所論列的，當然要有極大的差異。即如後者之極無意義的推斷，認為思想對於腦筋的關係，如同胆汁對於肝臟，或能力對於腎臟的關係一樣，已久經標希涅爾給以恰當的駁斥了。

狄茨根之特別比費爾巴赫進步的是他的唯物的辯證法。狄茨根曾是個自然界的辯證論者。他從來曉得依據他一般的相互依附的觀點觀察自然界的現象，他的著述之主要魔力亦在於此。但是，他外馬克思和昂格思而獨立發明的辯證法，還完全沒有達到他比馬克思和昂格思的辯證法有何卓越之點，而能夠“補充”他的程度。昂格思說：“為要求得歷史之辯證的認識，同時以及歷史之唯物的認識，必須同數學和自然科學相結識。”如果他在這一點上，對於他自己同樣對於馬克思都毫無特別的心願，（按其特有的字義），他們只是利用空閒的時間，偶爾或部份的有涉獵自然科學的可能，——一切都盡於“駁杜林”一書之中，而關於這類問題，在“駁杜林”一書中，昂格思所涉及的計算起來比從狄茨根全集中的要多過許多。固然，馬克思主義之最幼稚的代表中之一，於幾十年前曾認定：狄茨根在物理學之基本的觀點上已超過昂格思很遠，因而曾補充道：“昂格思在物理學上或許

因為狄茨根所確定的一般的觀點，而得到更詳盡的認識，狄茨根并不曾以他的為滿足。”然而此種判斷有些提起了那老自然哲學家斯蒂芬思根據某些學者研究對象比研究絕對為多所指明的否定的註釋。在我們尊崇辯證法的情形之下，沒有辯證法的真實的認識，在我們看來，總比沒有真實的認識之辯證法，要有更多的價值。

在狄茨根關於郎黑“唯物論的歷史”的判斷中，特別用批評的方式所說明的那些認識是不充分的。固然，狄茨根很慈悲的”承認郎黑帶社會主義派別的民主主義的色彩，同樣還承認該種著作之許多次等的可觀和功績，但是他對郎黑的哲學觀點，則稱之為“在形而上學的網羅中，時而可以看到的極可憐的反抗”，并斥之為“典型的混亂真理”，如同毫無諂媚性質之“無意義的字句之堆集”。講到形而上學網羅中的“反抗”，這種註釋是正確的，但是“可憐的”這個字的採用，則只是因為郎黑在自然科學研究的領域內取得了非常普遍的認識，而此種認識曾惹起了他對於羣衆的懷疑，對於狄茨根所以完全不同者，簡單的是因為他并曾取得那樣廣汎的自然科學的認識。如果郎黑到狄茨根這種批評時還活着，那末他亦便同樣的重複，依據另外的理由說道：“非常近視的人們想像到，狄茨根的眼鏡幫助他看得更加清楚，而且，實際上帶起眼鏡來，比沒有眼鏡是要看得清楚一些。

但是那些沒有銳利眼光窺察將來的人們，經過狄茨根的眼鏡觀察一切物象將更加模糊不清。”

狄茨根是無疑義的要超過郎黑的，他曾是歷史唯物論的信號，并曾了解了歷史的唯物論。但他在不同的場合下曾表示：只有自然科學才得稱為科學，且據此只有對於自己的“自然的一元論”增加了意義，并且還會說：唯物史觀他整個的是借助於馬克思。實際上耶富亨·狄茨根（老狄茨根——譯者）這種思想完全是正確的，約西孚·狄茨根同歷史的唯物論結識之後，並沒有增加特別的意義。他并不會曉得將他運用於自己特殊的哲學範圍之中。

固然，狄茨根曾有一次在其“論邏輯的信札”中說過：“不能不指明，百年來，這一問題累世相傳已完全顯明了。大名鼎鼎的比伐霍爾，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卡爾捷茲，斯賓諾茲，萊伯尼茲，康德，黑格爾都是此種研究的途徑中之諸階段。不能夠否認進步的。但是精神和形骸，尤其是經濟的發展間之連繫有非常之有力的曲解。人們并不會找到精神與肉體間的橋樑，整個的時期，直至我們現在，哲學的發展都會認為是純粹精神的行為，這種精神的行為係表現於一二十個著名人物的智力之上。”然而，狄茨根此種闡釋完全是些廢話。

如果我們僅限於“論邏輯的信札”一書，那末我們便看

到：他是在企圖用笛卡兒和斯賓拿撒的大名來贊助神體實體論的論據，——而康德却曾證明這種論據之沒有根據了。這一論據很顯然的要歸結到以下的推論：當我們想象上帝時，我們所想的上帝便是個十分完全無缺的總體。但因此他首先必須存在，因為不存在的實質必然不是完全無缺的。因而，上帝應該是存在的，因為不然他便不是完全無缺的實質了。狄茨根認為笛卡兒所引用的論據“太陽般的明顯”，假設這種論據不足以證明關於“超感覺的神像的存在，那末，在一切情形下，他便證明全部世界的實質之絕對真理。”如果我們不能道破費爾巴赫那“上帝存在之玄妙的論據”而去了解這種意思：人類思想的實質即是其真理的，神靈的，最高的實質，則此種離奇的觀念完全無法了解的。

狄茨根同樣在“論邏輯的信札”的其他地方竟直然稱自己為斯賓拿撒主義者：“唯心論者和唯物論者之間的爭論繼續有千年之久的問題，即是宇宙的精神抑是精神的宇宙問題。我們的回答完全是確定的和明顯的：他們彼此間有不可割裂的聯繫，他們的綜合構成一種物體和一切物體的物體。精神和自然即是一個實體的兩種屬性。”在第三個地方狄茨根則標揚那希臘哲人波羅搭皋爾的英勇，但是，這絲毫無礙於狄茨根後來以責難瑣碎為名而拒絕研究詭辯家們的真理，其中最著名的即是波羅搭皋爾。他用一般所採用的方法

上來非難他們,并攻擊希勞特和黑格爾。在第四個地方狄茨根却說黑爾濼,洛歐和士搭里,即是 *Kreuzzitunga* 中的天使,他之所以用讚美的口吻來評論他們,乃是因為他們同費爾巴赫和馬克思共同“將他置在腳底下去”,都曾帶有“黑格爾派的色彩”。而同時,黑爾濼曾是個封建的小說家,如果封建的小說家曾有關於黑格爾的表現,那對於黑格爾亦便完全是敵對的關係;固然,士搭里似乎對黑格爾派曾有過某種程度的羨慕,但只是抱了用哲學的觀點以紛飾封建剝削方法之目的而已;而洛歐亦同樣是黑格爾哲學之熱烈崇拜者,而將同德意志大學有關係的“黑格爾派”出賣於維持風紀的法庭和偵察的監督。

當“論邏輯的信札”刊佈以前,馬克思即已去世了。而這些信札是在確定他的見解,即在狄茨根的哲學中“參雜着一些污點”。此外,馬克思在狄茨根全集第一卷出書時即斥責以“大部份均是重複”;這種批評對於狄茨根以後的著述當更要恰當,狄茨根以後的著述的本身即只是其第一本著作的重複。這種重複的本身即是可厭的,而所有這些却是證明狄茨根探討真理的認識之繼續不斷的努力,這種努力無條件的證明他的光榮,雖說在他對自然科學和歷史之極其狹隘的認識之下,他勢必在那同一的觀點下翻來復去的重複。大足以完全證明馬克思論狄茨根全集第一卷之帶有贊揚的

口吻，而是因為他本身實帶有“許多卓越之點，是工人之獨立的產物，（狄茨根係工人出身——譯者）而且是極可驚訝的產物”。我們所要作的鬥爭，並不是反對狄茨根，而是反對“狄茨根主義”，反對那企圖來“補充”歷史唯物論的狄茨根主義，而實際上其所能作到的只不過是將歷史的唯物論引入歧途而已。人們為要了解馬克思而須先結識狄茨根，本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要求，如果他們不去作反的推論，也可說是完全正確的。凡是從馬克思出發去研究狄茨根，便永遠會尊崇後者為卓越的和有利的，為探討真理而不停鬥爭的一人，雖說有探討哲理的一切浪費和缺點，而因此却表現出他的天才，雖說不是自發的，而在一切情形下却表現再生產的力量。

我們還要重複的說：我們的問題並不在於狄茨根，而在於狄茨根主義，狄茨根主義的本身同狄茨根并沒絲毫關係。譬如在性情直爽的狄茨根拒絕那妥協急進主義和修正主義於一個最高的統一的狄茨根主義的企圖，如同拒絕那“毫無意義的廢話”一樣。“狄茨根主義”這種動業直到現在還不曾完成。但是他在這一點上，如果只能夠相信“Vossische Zeitung”。則還要完成更大的動業，而將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和解。實質上此種妥協更是德意志統治之最怯懦的菲里斯機關報在“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所頌揚的文章，“Sozia-

listische Mouatshefte”即是拖延無產階級勝利到最遠的將來之狄茨根主義的主要助手，使今後所有資本主義的剝削者能夠很安穩的憩息於正義者的庇護之下。

我們知道這個人，如果他活到現在，當狄茨根主義這樣的公佈之後，他一定罵他為鬼話。這個人便是約西孚·狄茨根。

四

馬赫同狄茨根一樣是認識論的一元論的代表，而努力消除介乎物理的和心理的之間的一切二元論的。他們中間的區別乃在於：馬赫并不想作個哲學家，他和達爾文一樣，是個極其著名的博物學家，他十分謙遜，或者可以說是十分自信他可以成為一定科學範圍內的主人。

在這一點上馬赫完全是與馬克思相附合的，馬克思曾完全拖開了哲學，且認為人類之精神的進展只是於歷史和自然的知識的範圍之實際工作中去觀察。但是，這正好比，除了達爾文之外，曾有達爾文主義者存在，將其自然科學的方法運用於歷史範圍，在歷史範圍內引起驚人的騷動，——除了馬赫之外，亦同樣有試究同樣志願和求得同樣結果的“馬赫主義者”存在。

我們此處只須借舉這些鈍才中之一，——標特藻里德先生便夠了。標特藻里德所寫的關於“根據實證主義的觀點觀察宇宙問題”一書以及他的書的開端，即曾粉飾了馬赫的名字。標特藻里德先生解釋哲學之批評的歷史，從法列士到康德，即是用歷史的方法所描寫的那“深奧的渺盲史”，而此種歷史的方法亦即昂格思在其“反杜靈”一書中所曾精巧的敘述到的：“問題是在認識了真理之單個的天才的個人還是不夠的；這些人之出現於現在並不是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所必然發生的事件，並不是什麼不可避免的事件，而是簡單的僥倖的偶然之結果。這些人同樣亦可降生於五百年前，而從五百年的渺盲，痛苦和鬥爭中拯救出人類。”其差別點乃在於：標特藻里德認定歷史的不幸事件要比僥倖的事件為多，此外，他為了便於自己的計算而用五百年的五倍代替了五百年。

譬如，大約生於紀元前四八〇年的希臘哲學家普羅塔皋爾，即已抓住了真理的要害，然而，在當時“歷史的偶然還起有驚人的作用，而幾千年來又將人類重新投置於暗無天日的窘困之中了。從普羅塔皋爾到我們現在所曾達到的還不過二十行字，且關於他，我們所知道的同樣非常之少；然而，動蕩着的情感便可得出像標特藻里德所敘述的他的生活的那種慘事：

聽到光榮的普羅塔皋爾過去同精幹的蘇格拉底的著述所作的爭論,總該喜悅罷?然而,歷史的前進所喜歡的是那種嚴整的著作。普羅塔皋爾學說之燦爛的光輝,即如我們現今尼刺森學說之光輝一樣,曾幾乎被擯棄於無影無蹤了。他們兩者都曾有過特殊的間接影響,他們只是充實了自己的反對者而給予更加堅定的思想。然而,因為切合時勢的蘇格拉底哲學思想的發展曾引入歧途,這一歧途直到二千多年以後才納入正軌,在此軌道中經過了一些時候才跑出一個沒有同志和繼承者的孤獨的普羅塔皋爾。直至休謨(1711—1776年),才重新發現在表現中關於實體之推理的哲學思想之主要缺點。歷史的偶然是起有如何驚人的作用啊!一切切合時勢的個人,他曉得正確的了解和慎重的發揮普羅塔皋爾之萊亮基主義的基本觀念,才得將歐洲的人類從經院學派的中世紀之精神的滅亡中拯救出來。普羅塔皋爾或者是不會充分的了解自己的思想的偉大意義,或者他這種思想對於我們更較切合,他并不曾有過充分的精神紀律,充分的聯繫和思維的結論,以便繼承者對於自己思想的剖析,而引向勝利之路。他如生在那高度的社會的狀況——如同恩巴敏濃德和標利克里一般人曾經尋找過他的社會——之下,他的成功是有保

障的，那末我們便難于再有任何其他的選擇了。如果他哲學的天才不會同這種不堅定的個人相聯繫着，西方的思維歷史，同時以及整個的世界史就許可以是完全另外的一種，減少很多的黑暗和殘酷。

標特藻里德更加充分的擴展這種精神，所有關於這些普羅塔皋爾亦同樣能夠同伊素斯的最高倫理相溶，且因此從“教會教條”的壓榨下而保全人類。然而，從上面之簡短的引文中很足以述明那承認足以“補充”歷史唯物論的“馬赫主義”之歷史方法。固然可以說，如果將標特藻里德書中所蘊藏着的歷史的鈍事，抽引出去，那種漂亮的著述，在科學的意義上實應置於高位。但是這證明什麼？難道不能同樣來說明關於標希涅爾，莫業邵特和赫克爾的著述嗎？他們過去或現在還都是突出的博物學家，特別是那種相俾的和庸俗化的唯物論之著名的創造——標希涅爾“力與物質”一書寫得格外文化天才。像標特藻里德文集這種書是要拉回你們到六十年以前去，至少他們的“馬赫主義”亦同樣是用作那極可憎的應酬話的，而當時標希涅爾及其同流即被這種應酬話所迷惑。

馬赫自己對於此種“馬赫主義”完全是無辜的，他任何時候都不曾存過需要“補充”歷史唯物論的念頭，可以說關於補充歷史唯物論的事他一點也不曉得。然而，應該從馬克

思主義者此種“補充”加以限制，因為此種“補充”歸根結底是要走到這樣的混亂的，此種混亂是要引起整個歷史上受過教育的讀者們在讀到標特藻里德的書時的驚訝。歷史的唯物論是一種狹隘的理論，是一種為認識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之預言的理論，此種理論的法則係建基於歷史發展的本身，且此種理論亦很少同自然科學的方法相混合的可能，即猶之乎他本身并不能表明任何自然科學的宿願一樣。

只能夠根據他的結果去認識他。如果他是不適合的，那用以努力鞏固他的一切“補充”，也是不能從失敗中將他拯救出來的，但是，如果正如我們所想像的他是正確的，而這些“補充”却足以阻礙他的勝利。

(譯自一九一〇年七月廿八日“新時代”雜誌)

現代文藝叢書十種

——魯迅編——

十	裸	裝	鐵	浮	被	叛	火	潰	貧
月	之	甲	之	士	解				農
雅	年	列	流	德	放	亂	馬	滅	組
各	畢	車	流	與	的	孚	華	法	合
武	力	伊	綏	城	堂	爾	拉	兌	班
萊	涅	凡	拉	盧	吉	瑪	特	耶	菲
夫	克	諾	斐	那	訶	諾	珂	耶	洛
著	著	夫	摩	卡	德	夫	夫	夫	夫
魯	蓬	著	維	爾	魯	著	著	著	著
迅	子	侍	克	斯	迅	成	侍	魯	魯
譯	譯	柘	著	基	譯	文	柘	迅	迅
		譯	著	著		英	譯	譯	譯
			曹	柔		譯			
			靜	石					
			華	譯					
			譯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 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

嚴 靈 峯

—— 應新思潮雜誌之徵 ——

解 題

不幸得很！同時又是對不起得很！我們竟從開口閉口“馬克思主義”的新思潮雜誌上，找出一個想不到的疑題；這疑題便是新思潮社諸君，“誠懇地希望全國的青年學生之踴躍的投稿”的：“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我們將相信雖然這樣的一個題目，會有許多青年朋友，在未看清題目之前便把文章做好的。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我們知道，形式邏輯中有這一個最通用的公式：“是——是和否

——否”。在這一點上，便充分的證明了，新思潮社的根本精神沒有理解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因為他們不會在具體的研究問題當中提出這樣的公式：“是——否和否——是”。假使拋棄“辯證法”觀點的人來談馬克思主義，不消說會把馬克思主義壓縮在“機械唯物論”的圍欄內，使它消失一切革命內容！

自然，被列甯斥為“不懂辯證法”的布哈林之門徒們在中國問題中不但過去，或現在我們所討論的這個題目，陷於機械唯物論觀點，即在將來，我們此地尚可預言，必定還有許多像新思潮一類的作家，將機械的舉出許多“孤立”而“個別”的事實，來證明他們理論的正確和責難我們。因為他們的聰明處就在只知機械的應用經驗；經驗論者又像螞蟻一樣，他們只知搜集材料，隨後貯存起來，加以消耗便算滿足；他們不懂得先將所搜集的材料加以人工造作然後再來消耗，因此，始終是“食古不化”！這便是機械唯物論的特徵，我們發覺了中國思想界中曾有這樣一個掛“馬克思主義”旗幟而其實是機械論本質的哲學體系之後，我們要探求這個體系思想上的病源便覺容易多了。關於這一點，我們應明確地向讀者諸君指出的。

現在再談到“題目”。

爲什麼新思潮雜誌那樣的提出問題，乃非馬克思主義，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 3

非辯證法的提出呢？

假使大家不是“機械”地了解問題，那便很容易懂得馬克思主義的A, B, C。馬克思在經濟學批評序言中說：“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社會之經濟的結構”。這就是說，社會之經濟結構如何，要看社會內部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如何而定。但是社會愈發展，則其所存留在社會內部的各種生產關係也愈駁雜。這是歷史上的事實。自然，更沒有“單純”的資本主義經濟或“單純”的封建制度經濟。

列甯說：

“現在俄國有各別的社會經濟層次的諸成分……

1, 家長制的經濟；即大部分自給的農民經濟；

2, 小規模的商品生產（這裏大部分屬於出賣麵包的農民）；

3, 私人經濟的資本主義；

4, 國家資本主義；

5, 社會主義。

這樣龐大和這樣雜色的俄國，所有這些社會經濟層次的各別形式在境內是交相錯綜的。這正是特別的情形。

若問到底那一種的成分佔優勢呢？很顯然的事體，在小農佔優勢的國境內，也不能不是小資產階級的要

素佔優勢；多數和大多數的農夫就是小規模的商品生產者。”（列寧全集第十五卷 P. 264.）

蘇聯在十月革命後，尚有五種經濟成份的存在，這便證明蘇聯境內生產的關係不只一種或兩種。我們能否說：“蘇聯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假使這樣的提出問題，乃是以資產階級的庸俗的形式邏輯來嘲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因為俄國除了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之外還有自給的家長制經濟等等。俄國可以說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因為在國際範圍內是資本主義經濟佔統治的地位，並且境內還有資本主義成分和其他非社會主義的經濟；俄國可以說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因為無產階級業已取得政權，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佔領導的地位。

中國生產關係的複雜當不亞於俄國；這當然，經濟的結構也不會像新思潮諸君所想的那樣簡單，以為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便是封建制度經濟，我們從其機械的系統中看來，也許新思潮諸君在新思潮雜誌第五，第六期上會有這樣的論文出現，即論文的結論是：中國是封建制度的經濟；或近似於這種結論的。

但是，我們是否因為新思潮社之無馬克思主義常識的提出問題，我們就不做關於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文章呢？不！决不！不過這個問題太重要了，因此，我們不得不換一個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 5

題目，以免馬克思主義無辜遭人糟踐！我們在下面就開始討論中國經濟問題。

我們要研究中國經濟的結構，必須先了解一般社會經濟發展的情形。

馬克思在經濟學批評序言中，曾說：

“在一般說來，可以從亞洲的，上古的，封建的，及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為社會經濟進步的各時代”。

這就是說，各種不同的社會形式必須適應於各種生產方式。

生產方式對於社會形式關係具體的表現怎樣呢？

馬克思又說：

“社會關係都是與生產力有密切聯結的。人類獲得新生產力時，即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而由生產方式，和謀生方式的改變，同時他們所有的社會關係也要改變的。用手推的磨子產生了封建主的社會；用蒸汽的磨子就產生了工業資本家的社會。”（哲學之貧困）

因此，生產方式的改變主要的就是技術的改變。“由於新武器——銃礮——的發明，那軍隊內都的組織隨着全部

改變并且各軍隊間之彼此相互關係也同樣起了變化的。”

(馬克思著，工資勞動與資本)

所以，我們要劃分社會發展的各階段，必須從事於研究歷史的各時代所採用的勞動工具如何？馬克思說：

“骨骼構造的遺骸，對於研究滅跡的動物的組織，有重大的意義；勞動工具的遺型，對於研究社會經濟的組織，有同樣的重大意義。”（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編，第十章。）

我們先從一般的生產方式來研究中國經濟的結構吧。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顯然地受着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的影響；但是，中國雖然在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然始終不只一種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的。中國——尤其是在中國的農村中——還有許多資本主義前期關係的遺跡，與其他形形色色異常複雜的封建殘餘，這是很明顯的。技術程度與經濟形式的駁雜，實比革命前的俄國更為利害，新式技術最近的設備與洪荒時代的生產工具同時并存——有製造龐大汽船的造船塢，製電泡的工廠，以最高程度機械化的玻璃工廠，與那千百萬從前時期遺傳下來的木織機同時并用；有飛機，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 7

汽船，汽車，亦有馬車，人力車，相笨的單輪車；有用木頭造成的犁鋤，與古代的水車，亦有最新式的深耕法，有些地方灌溉還用電機的。

由上面生產技術的複雜自然反映社會內部有各種各式的生產關係和社會經濟層次。我們可說，從資本主義前期的原始家長制經濟，中世紀奴隸關係的殘餘，到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又從各種非常複雜形式的手工業，到標本形式的手工工廠，再到新式工業與最後階段的財政資本。

這裏的複雜狀況，簡直令人目迷五色，我們又怎麼能夠提出這樣的問題說：“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呢？

但是，我們此地也不妨依照列甯的方法，把現在中國各別的社會經濟層次的諸成分分別列舉於下：

- 1, 原始家長制的自給經濟（爲自己生產的牧畜和農耕）等
- 2, 小規模的單純商品生產（農民的穀物商品的生產，農業副業的商品生產，手工業的商品生產等）；
- 3, 私人經濟的資本主義（包括外國的，本國的，和中外資本家合資經營以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爲基礎的工商業資本）；
- 4, 國家資本主義（由國家經營的礦山，鐵道和其他交通

機關。

若問中國現在到底是那一種成分佔優勢呢？我們也可以毫不遲疑的答覆；小資產階級的要素佔優勢；多數和大多數的農夫就是小規模的商品生產者。

那末，我們答覆了一切問題嗎？沒有的，我們必需進一步來研究在中國境內現時，到底是那一種的社會經濟成分居“領導”的地位；然後我們纔能了解中國社會經濟上中心的問題。

可是，在我們尚未確定，那一種經濟成分佔統治地位之前，有許多重要和已經爭論的問題必須提前解決的。

三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俄國的民粹派，以缺乏國內市場的論據，認定俄國資本主義的衰落；不料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的機械論者，也以帝國主義只是取得中國商品市場，保持封建勢力的論據，來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此間相去歷史的篇幅雖不到一世紀，然我們的時代乃帝國主義的時代，竟有馬克思主義的不肖門徒的反動思想與前世紀的民粹派後先輝映呢！

a.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上的根據。

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便已說道：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 9

“資產階級既激急的改良了生產工具，又不斷的開拓了交通機關，於是把所有的一切，甚至於野蠻的人民都推入於文明的道路上了。那價廉物美的射擊力，就是中國的城壁也被打破了；就是極端排外頑固的野蠻人也只得降服了。世界各國爲要免得滅亡的運命，也只得採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牠將所謂文明輸入他們的社會，就是要把自己也變成了資本家。換句話說，資產階級將按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了全世界”。(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這段的見解，可以概括如下如下幾點：

第一，歐洲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需要國外市場，造成了國際交換關係。

第二，資本主義先進國的商品輸入野蠻民族的國家將封建的城壁打破，并征服了封建勢力。

第三，落後的民族要圖自己的生存，不得不採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使落後國家資本主義生產照先進國的模型發展。

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新修正派，怎樣地修改了這個意見呢？他說：

“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極力扶持封建勢力，壓制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李立三)

很顯然地，列甯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也和馬克思一樣，

不從各國家分離的發展來看，而是站在整個世界立場上來考察。他說：

“這樣看來，找尋國外市場之必要……是很明顯地表現着資本主義之前進的歷史任務，牠破壞了舊時經濟制度之獨立與閉塞（同時也就破壞了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牠把世界上的全體國家聯結成爲整個的經濟單位。（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列甯這裏更明顯地指出，資本主義之前進的歷史任務，不但要破壞舊時獨立和閉塞的經濟制度，並且同時還要破壞了在這種經濟制度基礎上的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換句話說，同時還要破壞舊時的社會制度。

這樣便證明認帝國主義在殖民地扶植封建勢力乃是無稽之談和對馬克思主義的荒謬修正！

實際上，自從世界歷史發展到新階段——帝國主義時代，恰恰相反，不但不保持封建勢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列甯說：

“帝國主義是經濟發展到這樣階段的資本主義，即在這個階段中，壟斷與財政資本已獲得統治地位，資本輸出有極重大的意義；國際托拉斯已開始瓜分世界，資本主義列強對於全地球的幅圓已分割完竣”。（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新階段）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11

我們在這裏只限於指出重要而關於本題的三點：

第一，依列甯的意見，帝國主義時代，全世界國家都捲入資本主義的漩渦。

第二，財政資本已獲得統治的地位。這就是說，統治今日世界的已非單純的工業資本主義。

第三，資本的輸出已成爲非常重要的事實。

這裏的論據應用到中國來的，便可得到如下的結論，就是，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使中國經濟加入於國際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的經濟統治權必定操之有財政資本的帝國主義列強之手；帝國主義在中國但不輸入商品，並且還要輸入資本。列甯還說：

“以前殖民地是商品貿易，但是，尙無資本生產，現在帝國主義已經變更，而益以輸出資本；資本主義的生產，於是便極迅速地移植於殖民地了。”（民族問題）

這裏也正是指出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徵，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在與殖民地只是進行商品貿易的時期，在殖民地尙沒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因資本的輸出而引起殖民地極迅速地發生資本主義生產，這是說，殖民地在與帝國主義發生更密切的關係，更不能排脫資本主義生產的過程。

在中國歷史上也是這樣，起初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

前。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在中國只是起了破壞中國農村經濟的作用，反使中國經濟趨於停滯狀況，自從建築鐵路和資本主義生產技術搬到中國來——尤其是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入直到現在都是促進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過這種發展，不是趨向民族工業完全獨立的道路發展而是走向殖民地化的道路發展。就是，中國發展經濟的真正領導權不是操之本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之手，而是操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手裏。民族資產階級只是處於或多或少買辦的地位而依靠於強力的外國財政資本家。而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祇是相對地阻礙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而是絕對地要在他們領導之下。使中國向着更殖民地化的方面推動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前進。而成爲宗主國經濟不可分離的部分。不然，近代帝國主義之把“輸出商品”變爲“輸出資本”的話便失其意義。這就是從數量轉變到質量之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經濟中的作用。所以在殖民地國家內，外國資本的企業常比本國資本的企業爲多。然而，不管企業的主人是誰，其在這個領土內的鐵路，工廠，礦山等等之加多，無產階級勢力的發展已成爲不可否認的事實。——尤其是“經濟不平衡的發展爲資本主義世界絕對的公律”。(列寧)使殖民地在曲綫的道路上得以達到發展。

修正派的意見怎樣呢？恰恰和馬克思列寧相反。他說：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13

“因為這些資本輸到中國來，差不多完全爲着榨取原料(建設初步製造原料的工廠)或者用在擴大交通，(現在美國的投資就是這樣)藉以便利商品與原料的運輸，加緊對中國的束縛。”(李立三)

看吧!“建設初步製造的原料工廠”，這都不是工廠，都不是資本主義，不是剝奪工人的剩餘價值，而是“原料”！不是“工廠”！因為這是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不是中國資本家開辦的，因此，這樣的工廠爲的“榨取原料”？！

列甯的帝國主義的理論經過了修正派的譸譯便成爲不可思議的庸俗理論了。列甯說：“而資本輸出且可造成了許多後進國也踏進國際資本主義的領域中去；在後進國中，最重要的鐵道都已敷設或正在敷設之中；工業發展的根本諸條件都已經確立而存在了。”(帝國主義)呵！這是“便於商品與原料的運輸”呀！“現在美國的投資就是這樣”！中國可以便不便呢？縱使中國人不能享美國人所擴大的交通機關，然畢竟“交通”在中國地域內“擴大”了。列甯繼續又說：“資本輸出影響輸入資本的國家資本主義之發展很大，且能促使其非常發展。所以，資本輸出底國家的發展雖被阻於某種限度，但仍能使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擴大與尖銳化。”(同書)他又說：“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的根本經濟基礎之一”。列甯這意見不適用於有特殊情形半殖地的中國麼？恰恰中

國又是“後進國”，而“輸入資本的國家”！

由上面研究結果，我們可說，殖民地國家在帝國主義的資本與技術推動之下，資本主義的生產可向前發展，但是，要在帝國主義經濟支配之下，而更趨於殖民地化。

b.事實上又怎樣呢？

中國社會長時期是沉澱在半封建制度和商業資本長期侵蝕的進化過程之中。這因為在中國歷史上不曾起過技術的革命，因此，商業資本雖然發達，然始終不能轉變為工業資本，祇是在農村中不斷地削弱封建制度的基礎。到了中國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接觸之後，外國的商品便不斷地深入中國農村更加速了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破產的過程，而引動了農村階級的分化。然而在廉價商品輸入的初期，也只是一般輕工業的商品罷了。這時期內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的作用，不但不能夠發展中國經濟，並且用他的廉價的商品破壞了中國人民的關係，使民衆中間發生了異常的變化。自從鐵道建築以後，中國資本主義纔開始發展。固然，鐵道的建設最初還是為帝國主義運輸商品，然而，因為建設鐵道的工程不得不輸入種種進步技術，繼而開採鑛山籌設工廠等等，都是帝國主義輸進新式技術之後纔有可能的。有了新技術的幫助，和中國的廉價勞動與豐富的自然富源，不管原始積累的薄弱總能多多少少地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萌芽發葉。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15

在一八九五年英國人在上海的紡織工廠達七萬二千錠和七百架紡績機；在一八九六年工廠的設立就到了九萬六千錠和九百八十架紡績機，基金已達五百萬元。一八九七年成立上海工廠有四萬五千錠和四百四十六架紡績機，基金一百五十萬元；一八九九年成立了“東洋”工廠，有五萬二千錠。在這個時期內有五個英國工廠，共有三十萬錠，紡績機三千架。近代工業的開始最先是在上海。上海成爲資本主義發展的中心。

我們現在試舉一些數目字來證明，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否受帝國主義扶植封建勢力的障礙而不能發展呢？

1. 中國大工業機器進口的增長

年代	機器價額
1913	4,600,000兩
1920	22,300,000兩

以上是各種工業機器的。

年代	機器價額
1913	112,000兩
1916	200,000兩
1920	1,000,000兩
1921	2,000,000兩

以上是屬於農村的機器，1921年特別是從美國來的特

多。

年代	機器價額
1918	646,000兩
1919	1,640,301兩
1920	2,376,122兩
1921	5,163,781兩

上面是各種各式的發動機。

年代	機器價額
1913	930,000兩
1914	2,000,000兩
1916	1,600,000兩
1919	3,700,000兩
1920	7,000,000兩
1921	26,000,000兩

以上是紡績機器，其進口之突飛猛進更是令人驚詫！

我們就上面各種機器的輸入年年不斷地以倍數增加，便是證明中國社會之如何迅速地採取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因為生產技術是測驗社會經濟結構的最好方法。

我們現在再舉一個重要的統計，便可證明上列各表所指示的機器進口每年增加是與大工業的發展相符合而正確的。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17

中國輕工業的發展

工業部門	企 業 數 目	
	1915年	1922年(中國的)1922年
製蛋工廠	9	50 32
餅乾及罐頭工廠	8	35 33
皮革工業	17	46 39
製紙工業	11	17 14
製糖工業	6	26 15
火柴工廠	53	89 75
製煙工廠	15	79 21
水泥磚瓦工廠	7	64 32
絲織工廠	17	1913, 361

由上表看來，無論在那一部門都是長足進步的趨勢。

至於紡績工業的發達更是急劇

年份	工廠數目	紡錠數目	織機數目
1891	2	65,000	
1912	17	565,252	
1918	—	642,000	
1916	43	272,941	5,964
1918	49	1,366,000	6,197
1921	63	2,838,000	12,000

1926	118	3,414,062	25,934
------	-----	-----------	--------

從這裏我們不但可以看到紡績工廠不斷的增加，同時自1921——1926五年之間幾乎工廠的數目增加一倍；我們同樣可以推論在這五年之間，其他輕工業部門在此同一的條件之下一定會有同一程度發展的。至於家庭工業年來不斷的衰落已是表現新式資本主義企業佔優越的地位。

至於重工業方面情形又怎樣呢？

煤的採掘有22,700,000噸，比1905年的俄國15,000,000噸要高得多；而比1913年的俄國29,000,000稍差一點。

五金工業的出產量，沒有充分統計材料，不過造船業比戰前的俄國要發達得多。中國五十三個造船廠中，有幾個可以建造整個很大的海船與汽船等等，毫不讓於歐洲的造船業。軍械工業亦佔很大的意義。中國許多兵工廠，完全製造手鎗，步鎗，機關鎗，野炮與過山炮，無煙火藥，甚至製造毒氣。

中國經濟變動還有個顯著的象徵，就是電氣廠的數目於1913年為十二個，到1925年增加到四百個。每年平均增加 $33\frac{1}{3}$ 。有兩個製電泡工廠不僅供給大部分國內需要，並且做出口品。

農村方面在全國各地都可看見農業之日益發展而成爲專門化，地域分工日見顯著。而以種茶，植棉，養蠶等等爲尤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¹⁹

甚。漢口，南京，上海，以及沿運河一帶和其他各地均有很好的設備的精製蛋糕，蛋餅等公司（且常有採用最新式康弗爾機器的）。機械磨米企業常有最完善的英國機器。各種各式的榨油廠，沿海一帶之罐頭工廠等等。都表現農村經濟漸漸走進資本主義生產範圍。我們雖然缺乏詳密統計。但據上面農業機器入口之逐年增加，便不能否認農村生產方式日趨變化的過程。如滿州一帶在日本帝國主義影響之下農村生產方法之資本主義化，更為一般人所公認。

我們在此地，并不着重於說明在目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如何登峯造極，如何順利無阻，或與歐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相媲美；而主要的在於證明，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或更確切些指出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雖然，中國受帝國主義的束縛日益堅固；雖然在有封建殘餘的條件之下；雖然，歷年不斷地國內戰爭的破壞。然而，中國社會經濟資本主義化的過程，還是有蒸蒸日上之勢。資產階級在社會上政治作用之擴大等等都是反映中國社會內部資本主義成分的增高。

四

若以為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不能發展或沒有發展，這只

是新修正派迂腐之談；但認爲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中沒有任何障礙，這也是誤謬見解。我們記得，當蒲列哈諾夫還是革命的時代曾說過這樣的話：“輕氣球是向上飛騰的而不是向地下降的；這是事實，但這有什麼意義呢？這是不是說輕氣球是不受吸引力定律的影響麼？反之，只有它的作用纔能說明輕氣球的浮動。”（昂格斯著，德法農民問題序言）中國社會內部經濟的發展，一樣也要受歷史發展一般定律的支配，這自然是毫無疑議的了。縱然，有任何的民族特殊情形，但終不能改變根本法則。許多反動思想從‘五四’到現在，從國家主義到第三黨的理論都是以中國國情來抹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今日修正派諸君已經向我們提出嚴重質問道：“那麼中國資產階級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三大矛盾，——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束縛，和工農革命勢力，資產階級却未將他克服，資產階級可以暢利的發展資本主義，中國完全有成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能麼？”（李氏原意）我們的回答很簡單：“運動乃一切之母”；“矛盾是向前進的”！

我們這裏還可以反問道：“資本主義是否永不沒落的制度？是否永無阻礙發展的纔算資本主義制度”？

我們現在應轉到幾個特殊的問題來說。中國有否封建殘餘的勢力呢？我們堅決地答覆：“有的”！有的不但中國，即資本主義極發達的國家帝國主義的英國和日本尚有落後中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21

國所無的“皇帝”呢！封建勢力對於資本主義發展之帶抵抗性和阻礙力亦如城會市行會制度的小手工業對進步產業一樣；而且是必然的；這就是矛盾的表現，這個矛盾是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發展與以解決；而不是由於保持封建制度來把這種矛盾壓制在一定範圍之內可以解決得了的；這矛盾由於生產力的發展而愈趨緊張直至解決為止。其實在中國社會內部，像歐州中世紀那樣的封建領主經濟早就不存在了。純粹的封建經濟是怎樣呢？恩格斯說：

“中世紀社會：細碎的小生產，生產機關適於個人使用，因此是原始的，細小的，效能有限的；但是因此往往為生產者自己所佔有。生產是為供給生產者自己或其封建領主之直接消費。消費以外的剩餘生產品才拿去出賣，才拿去交換；商品生產尚在初生狀態。”（從空想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

據恩格斯的意見，封建制度只是建立在自給經濟的基礎上面，中國目前不論在城市或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絕對的證明此種制度之不能立脚。不要說一般小生產經濟大部分是為市場的需要或供給國際市場而生產；任何一個政治上的統治者他都不願直接消費其統治下的被剝削者的自然生產物，而是要坐美國式的鋼甲汽車，睡着德國式的銅床。棉花，煙草，桑，豆，粟，絲繭，茶葉等等重要的農產品，大部分

都是供國際市場的需要而表現一種國際分工的形態與外國進行交換；所以自然品佃租也不是像封建時代專供領主自己消費；而是由於商業化的地主，富農，高利貸者，或地主化的商業家，富農，高利貸者所集聚，運到城市去供給工業部門或出口。尤其是，在中國貧困農民佔優勢的情形之下，這種自然品佃租有可能保持相當的時期，因為“自然品佃租以最窮困的農民經濟中為最發達。”但“租戶要利用一切最小可能性以繳納貨幣租金，俾可減低耕種別人土地的價值。”（列寧全集第三卷）這因為自然品佃租貴於貨幣地租，特別在佃農佔優勢的中國；一般貧困的農民往往因缺乏擔保品與信用，借貨幣的困難，或不能等待生產品出賣後交付地租，或地主本身就要農民直接交納生產品以應城市工業和國際市場需要。於是自然品的地租便可在交換經濟發展的社會中立足因為像中國這種自然品地租與自給的封建領主經濟下的自然品地租在形式上即數量上雖然沒有什麼分別；但在質量上業已截然不同；因為此種自然品地租僅是表現地域的分區——即農村與城市之間的自然分工；并不阻礙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反而，促進發展過程。一切都依賴於時間和空間的條件：“一個同一現象會因各有機體全部構造各不相同的緣故；會因它們各個器官各有差別的緣故；會因那些器官所依以作用的諸條件各各相異的緣故，會因其種種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23

的緣故，遵從一個完全相異的法則；舉例說，馬克思否認，人口法則在無論什麼時候和無論什麼地方都是相同的那件事。”（資本論，第一卷二版序）這個論據恰好給我們可以用在中國的自然品佃租上面的。最·主·要·的·區·別·，·就·在·前·者·的·產·品·是·專·以·滿·足·領·主·和·農·民·自·己·的·需·要·為·出·發·點·，·後·者·是·以·滿·足·市·場·的·需·要·，·準·備·交·換·為·出·發·點·。·這·種·自·然·品·佃·租·在·中國·正·是·表·現·特·殊·情·形·。

至於徭役制度在長期為商業資本侵蝕，自然經濟崩潰的中國其殘留的程度自應是微弱的；因為“自然經濟與中農愈趨崩壞，則徭役制度將愈為資本主義所推倒。”（列寧）其實推倒中國徭役制度的還不只中國內部長期的商業資本，此外還有是以打破中國城壁的帝國主義廉價商品的。

那末，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又怎樣呢？

馬克思說：“由重利盤剝與商業構成的貨幣資本，因鄉村封建制度與城市行會制度的阻礙，不能變成工業資本”。（資本論第一卷二十五章。）這·就·證·明·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不·是·屬·於·封·建·制·度·的·本·身·而·是·與·封·建·制·度·相·對·立·的·。·同·時·商·業·和·商·業·資·本·的·發·達·到·處·使·生·產·向·交·換·價·值·一·方·面·發·展·，·使·生·產·範·圍·廣·大·，·使·生·產·種·類·加·多·，·使·生·產·普·遍·化·，·並·且·使·貨·幣·成·為·世·界·的·貨·幣·。·因·此·，·商·業·無·論·在·何·處·對·於·以·生·產·使·用·價·值·為·主·要·任·務·的·種·種·形·態·的·原·來·諸·生·產·組·織·，·多·少

發生一種使之解體作用。商業對於舊生產方法所加以解體作用究竟達到何種程度，這首先是以這種生產方法的堅固程度及其內部結構如何為轉移。”(同上) 那末，商業資本不但與封建制度相對立而且使之解體。固然，“商業資本的發達，就其自身講，尚不足以為一種生產方法過渡到別種生產方法的媒介與說明。”(同上) 然而，這也只是說明商業資本的“自身”作用；是說“商業資本的獨立及其優勢的發達，就是指資本自身還沒有支配生產。”的時代商業資本而言；即指“在資本主義社會初期(即在中古時代的西歐)是商業支配工業。”的時代商業資本而言；但是，在“近世社會中是工業支配商業。”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商業資本由他從前的獨立的生存，降至一般投資中特殊的一種，而利潤的平均化使商業資本的利潤降至一般平均點；商業資本的作用從此僅為生產資本的經理者”。因為，“在古代世界中，商業的作用及商業資本的發展固是奴隸經濟自身的結果。……反之，在近代世界中，商業資本的發達歸結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毫無疑議的，在今日世界，尤其是帝國主義時代，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已是錦上添花，商業資本不能獨立發達只是受工業支配。這就是說，商業資本愈是隸屬於工業，則和一般經濟發展，就不是成為“反比例”而恰成為“正比例”了。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28

中國農村的商業資本，不能不與城市的買辦發生關係，城市買辦，不能與世界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家發生關係，即不能不依賴於近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因此，我們不能把中國的農村與城市和世界分立起來看，以為農村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不普遍，就得出，商業資本尙可在中國獨立發展的錯誤結論。殊不知帝國主義世界鎖鍊一圓的中國，不能和百年前閉關自守時代的中國同日而語的！古諺說：“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商業資本，也是這樣的。

高利貸資本更是爲資本主義發展前期原始積累的必需要素之一。而原始積累又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出發點”。但是高利貸在農村的發展可否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一定是停滯呢？恰恰相反，“在資本主義生產就靠貨幣經濟和大工業的媒介，結果了他（農民）的運命。……這樣農民便一步步地降低到破產的地步了。賦稅，荒年，遺產的分割，這樣的行程，就會把個個農民都驅入於重利借貸者的虎口中去。負債一天天地成爲普遍的現象了”。（恩格斯著德法農民問題）這是說什麼？資本主義的發展不但不能削弱農村中高利貸的勢力，反而，“把個個農民驅入於重利貸者的虎口”。修正派先生們，千萬不要錯怪恩格斯寫了這段話不能爲他們留面子，應當怪歷史不應這樣的發展使他們機械式的理論破產無遺。恩格斯不過指出這歷史發展的事實罷了。

最後，歷來在國際帝國主義直接間接指揮之下的內戰是否障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呢？是的，任何戰爭，革命，都是破壞生產力；可是，任何戰爭，革命始終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這種生產力發展之結果的戰爭，革命，對於生產力的破壞只限於暫時的，並不是以消滅社會生產力，並且經過這戰爭和革命之後，生產力更在新的更擴大的基礎上面發展起來。馬克思說：“暴力自身是一種經濟的勢力。”！

矛盾呀！你盡管發展罷！看你自己解決自己！我們將要用主觀的力量幫助你來解決！

五

賜我們在這裏不作經院派式的討論問題，來咬文嚼字；說：“優勢”呀！“領導”呀！“相持”呀！“穩定”呀！“失敗”呀！“暫時失敗”呀！“勝利”呀！“最後勝利”呀！等等字義來作詳密地研究，因為我們這裏探究社會問題，不是學作名辭學家。我們現在只確定某種經濟在中國社會上在質量上佔優勢為“領導”作用；而在數量上佔優勢，縱然數量比其他各成分經濟為多，而不能在社會再生產行程中起左右一切經濟的作用的不能算為“領導”作用。

帝國主義時代的人類，假使對於一切政治經濟問題不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27

從國際的眼光去考察只是證明他的生活是孤立，是野蠻的種族。因為我們現在要用一枝縫衣針都要和外國發生關係的。帝國主義世界是整個的經濟系統，各個獨立的國家由於自然的和社會的分工所發生的交換關係的發展使整個世界生產打成一片。在世界經濟領域內，國民經濟乃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一切個人企業又是國民經濟的一部分；企業中各部門又是企業中的一部分。彼此都是結成不可分離的聯繫。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密切自亦不待言的；尤其是在近日海關改爲金本位更證明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連結之發展。因此，更因此中國是個農業國，所以，牠和國際交換關係的發展，只是進一步證明牠對於工業國工業品需要之增加，中國農村不得不經過各市鎮和上海發生交換，各市鎮不得不經過於上海和國際發生交換。鄉村不能不與城市分工，亦如中國不得不與國際分工一樣。在今日資本主義最新階段的時代，工業國不能不是農業國的領導者，農業國的城市又不能不是農村的領導者。換句話說，就是農村不得不依賴於城市，中國不得不依賴於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小生產不得不依賴大生產。這樣由帝國主義經濟統治下的中國一面不斷地使農村階級分化農產品轉成商品的過程日益擴大。另一面，家庭工業經過各大商店占買人的供給原料，并爲之代售整批製造品。使在“實際上等於僱傭工人，在自己家裏爲資本

家做工，這種占買商業資本，已變成爲工業資本了。”(列寧)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早就是失去領主和采邑賜地形式的封建關係，只管有貨幣的人便可成爲新的地主。於是商業家，高利貸者，富農多半是兼作鄉村地主的。列寧指俄國“高利貸者，商人與富農是農村經濟中的三位一體。”而中國農村資產階級常常是這“三位一體”中兼作土地所有人。同時還直接間接與帝國主義的買辦和城市工商業部門結成不解之緣。

托洛斯基說：

“中國資產階級在中國基本的農村經濟中與封建形式的剝削發生了有機的和不可分離的聯繫，他們在上層與世界財政資本也是有機的不可分離。中國資產階級同樣不能解除農村中的封建形式和國際帝國主義的關係。”(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 P. 212)

因爲中國“大中地主(按中國的規模)與城市資本、外國資本主義在內)是有最密切的關係的。中國沒有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主階級。農村中的一般最廣泛的而極慘酷的剝削者就是富農和高利貸者，即城市銀行資本的經紀人；所以中國的土地革命是反封建的，同時亦是反資產階級的。”(同書P.28)。

這因爲中國過去農業經濟生產技術的落後，不能發展

土地上巨大生產的組織；長期的商業資本之侵蝕農村，破壞了自然經濟，削弱了封建制度的基礎，土地商品化過程之不斷地擴大，高利貸——尤其是外國財政資本家買辦帶入農村中的重利盤剝；不但使農民破產日益加劇，即封建式的地主亦擺脫不了破產的厄運。於是新式商業家，高利貸的地主便起而代之。另一方面關稅不獨立，使從鄉村所剝削的農民血汗大部分流入帝國主義之手。因為“保護關稅制度是使製造者從事製造，剝奪獨立勞動者的產業，使國民生產工具生活資料變成資本并強制縮短中世紀生產方法到近世生產方法的過程之方法。”（馬克思）外債之高築，國家支付外債利息逐年之增加，一切正稅的收入多半也歸入帝國主義的荷包。使中國農村的富有階級如高利貸者，富農，新舊地主，和城市買辦，商業家，在轉變為工業資本家之“蛻化”過程，一面必須多多少少藉助於外國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家；另一方面還要加緊採取封建形式的剝削方法（如創設釐金企圖抵補不自主的關稅以挽救自己，巧立名目設立種種苛捐雜稅等等）以促進原始積累最後的成就。同時中國重工業，銀行，礦山，鐵道等等都是直接間接操之帝國主義手裏；更令拖泥帶土的中國資產階級的因自己的幼稚和脆弱，不得不屈服於帝國主義的經濟威力之前；不能以“自由競爭”的方法來擺脫自己危亡的運命，祇有採取“依賴”帝國主義的

道路以圖苟存。所以無論中國任何一派的資產階級都要或多或少帶帝國主義經濟經紀人的性質，在政治上不得不勾結帝國主義以自重使自己真正成爲政治上的代理人。這由於世界強力的資本主義經濟領導中國，由中國重要的工商業城市領導農村，反映到政治上，帝國主義統治中國城市，經過代理人——中國的資產階級統治農村。然而，修正派還是大夢方酣，在那裏大聲疾呼：

“中世紀的封建關係在中國國內經濟中和其上層政治建築中都佔統治的地位。”？！（共產國際綱領草案）

托洛斯基說：

“這是根本錯誤。什麼叫做統治？按照受支配的人民數量而定嗎？抑或按照在中國經濟上起統治與領導作用而定呢？建築在包羅全國的商業與銀行資本基礎上的國內工業，非常迅速的發展？重要農民區域之完全依賴市場；對外貿易之偉大與日益增長；中國農村之各方面隸屬於城市；——所有這些都顯出資本主義關係在中國無條件的佔優勢和直接的統治地位。封建與半封建關係，無疑的是強有力的，其發生的原因，一部份是由於封建時代所遺留的，一部份乃由於生產力發展的停滯，農村人口過剩，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影響而新形成的。然而這并非“封建”的（更正確的農奴及一般資本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31

主義以前的)關係的統治，而是資本主義的關係的統治。正因為這種資本主義經濟佔主要地位，我們才能夠真正的說到中國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領導的遠景，否則，豈不是首尾不相顧嗎？

“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力量，都遠過於其在全國人口數量中所佔的地位，因為經濟上無產階級統治了資本主義的一切經濟系統的中心和主腦，而且因為政治上經濟上無產階級代表資本主義下廣大勞動羣衆的真正利益。因此，無產階級雖於其全民中佔少數時（或者自正覺的和革命的無產階級先鋒隊佔全民中之少數時），能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從半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羣衆中吸收許多同盟者到自己的方面來，這些小資產階級於先時是不會贊成無產階級的統治的，而只有在以後繼續的經驗中，才使他相信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正確性及自然性。”（列寧全集十四卷P. 158. 一九一九年寫的）

中國無產階級在生產中的作用，早已極大了。在最近幾年，此種作用必然繼續增大，即在政治上的作用，據長年事變的證明可算是極偉大的”。（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第二集P. 69——71）

喂！封建勢力統治，資本主義不能發展，無產階級又可領導革命！無產階級的勢力從那裏來的呢？從天下降呢？蘇聯派來的呢？或是僱傭來的呢？！

六

a. 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或發展可能性并且以爲帝國主義維持中國封建勢力；這是一種馬克思主義新修正派的最反動思想的論據。這樣必然推論到中國無產階級力量不能發展，或如陳公博一流人否認中國有資產階級存在，即存在亦是極少極少；和前時代封建勢力可以復活。且必然會把農民的革命作用看做高過於無產階級的水平綫，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而幻想代以其他政權來履行中國革命的歷史使命，和忽略國際的階級關係。關於資本主義在中國可否發展問題，我們在上面業已詳細答覆，我們這裏只說一句牠是歷史進化必然的階段。馬克思說過：“對的，社會要隨於自身發展天然法則的足跡……牠却不能把那個天然的局面飛跳過去，也不能夠由指令的結果把牠除去；不過，牠却可以縮短和減少分娩的痛苦罷了”。（資本論一卷序言）至於發展到若何程度，或在何種速度進行，則要看整個國際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來決定。至封建勢力的復活或復辟，則我們可堅決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33

地加以否認！因為在國際範圍內，不管從數量上，或質量上，都是資本主義關係佔優勢和統治地位；封建勢力只是成爲過去歷史的殘骸；決不能重新在中國恢復舊觀的，即目前中國封建的殘餘勢力的抵抗，正是表現一種“迴光反照”的作用。人們若反問我們說：“爲什麼說蘇聯新興資產階級有復辟（即走“特爾米圖”的道路）的可能呢？難道蘇聯社會的進化特別“要開倒車嗎？”我們肯定的回答：“假使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不急速到來，整個世界還是資本主義統治着是有可能的！”因為蘇聯不能離開國際市場的關係而孤立存在。所以，縱然境內有社會主義經濟，但比起整個世界經濟看來是受資本主義勢力包圍之中。

b. 中國毫無疑義的是資本主義關係佔領導的地位。我們在中國範圍內以質量的關係便可決定的；譬如列甯說俄國小生產佔優勢，然而在境內却是社會主義成份的經濟居領導地位。中國小生產一樣佔優勢，然而在境內都是資本主義成份佔領導地位。舉個實例說：中國很僻遠的農村中都要購買洋油，火柴，等等日常生活工業品，假使這種工業品在城市發生恐慌馬上便引動到農村去的；然而，農村的農產品或米穀發生恐慌，城市一時還可得到國際市場的接濟避免危險。這便證明鄉村再生產行程不但靠城市的再生產行程，并且依賴於國際市場交換的順利進行。反之，我們可看到年來

中國邊境不斷的災荒，不但不足以影響到倫敦，巴黎，紐約，即上海亦不至受重大的影響；而一九二五年，“五卅”，上海，香港大罷工，不但影響到全國如大難將至，而且影響到英國，日本等等國家。一旦世界大戰暴發或美孚，亞細亞煤油公司倒閉，我們以為不但上海，漢口，廣東，天津，要發生問題，即極偏僻的農村都要起騷動的。所以中國農村的農業經濟的再生產行程要依賴城市工業的資本主義經濟再生產行程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c. 中國資本主義在發展中，各種矛盾和障礙是有的，並且是必然的！正是有矛盾有障礙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纔能發展。這是宇宙間一切辯證法的進化過程。

末了，我們要說一句：

“人能委棄真理，然而，真理永遠不會消滅的！”

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於上海。

上文業已付排，而經過一星期忽然得讀新思潮雜誌No. 5. 本擬把上文整個改作，將“應徵”的形式變為“批評”的形式，但事實上已是不可能的了。惟是上文也有不少地方預先指出“新思潮派”的錯誤觀點——尤其是指出他們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佔支配的地位。所以即不改作亦無傷大體。現在因出版時間匆促，只得關於中國經濟領導權問題，對於“新思潮派”的錯誤和矛盾的理論加以簡單的指摘。至於詳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35

細問題以後再當另文論及。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日——作者附識。

王學文君說：“……或在說，中國資本經濟已經在中國經濟佔得支配的地位，這種見解，我們不能不說他是盲目，不認識中國經濟現狀是什麼。”（新思潮No 5. P. 19）

他在另一地方又說：“……這封建的，半封建的經濟，是在中國經濟佔支配的地位。”（全上 P. 17）

這位作者已經肯定的結論是：支配中國經濟生活的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封建和半封建的！

潘東周君說：“因為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所以這些半封建關係在農業經濟中的優勢，實際就佔領了整個中國經濟中的優勢。……就整個中國經濟關係來說，城市的資本主義確已佔領了領導的地位，整個經濟發展的趨勢確已走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但是，在全國經濟生活的比重上，半封建關係仍然站着比較的優勢。……什麼叫做城市經濟領導着農村呢：就是農村經濟的發展，他將要隨着城市經濟發展的方向而前進。城市既是走向資本主義的發展，則農村經濟一定也是走向資本主義，但是就他發展的方向說，絕不是就他本身的性質。……但無論如何，在中國的全國國民經濟中，封建的關係仍然站着極強度的優勢。……說到中國的資本主義，我們不能不記住帝國主義是佔着絕對的優勢

……築鐵路也好，開大港也好，建築新式的工業也好，但若保持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銀行，外債，航業，工廠，礦山及一切政治與經濟的特權，則中國無論如何，不能跳出其牠的經濟發展的方向——走上殖民地，在這樣一個過程中，中國民衆將要長受帝國主義的剝奪，長受現在這些封建關係的束縛。”(同上 P. P. 17—20)

這樣混亂錯雜的思想，簡直是表現對於經濟問題沒有一點研究和了解！

我們現在祇得把上面所引證的話歸納如下各點來說；即據“新思潮派”的意見：

- 1, 中國經濟佔支配地位的是封建的和半封建的經濟。
- 2, 帝國主義在中國是佔絕對優勢。
- 3, 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加緊了封建的束縛，加緊破壞中國國民經濟。

我們在這裏仍是照上文的假定關於“優勢”與“領導”當作數量與質量的優越而言，那麼，所謂“支配”者不得不是“領導”的作用。然而，潘東周君所理解的那種“領導”，簡直是我們聞所未聞的新鮮解釋！固然，“名無固宜”，我們可把“領導”，改爲“支配”，“統治”，“優越”，亦無不可；我們把“馬”叫做“鹿”，“哈叭狗”，把史大林稱做“濫用權力”，或無論什麼菜都要用胡椒的廚子等等亦無不可；但要社會上一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37

般生活習慣所公認；并且還要加以正確的說明。潘君的解釋也可以說不能使人承認的謊謬絕倫的解釋！因此我們先就“領導”一名詞的意義來說。

據東周君的意見，“領導”是指經濟發展的方向而言，不是就他本身的性質；那就是說永遠沒有鄉村領導城市的事實。因為社會發展始終是向前進的。如果，潘君的意見是正確的，那末我們不能不得出一個結論說，蘇聯是佔現在整個世界經濟的“領導”的地位；因為，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始終要向社會主義方向走的，這豈不是太滑稽嗎？假使問題是這樣的簡單，我們老早便不須提出在經濟生活中城市對農村的“領導”作用的問題了；我們可說，共產主義的經濟領導一切，因為社會總是走向共產主義方向去的！我們為什麼多作此學院派的推敲字義之無謂的一舉呢？

事實上，經濟上的領導作用，本來就是質量的問題，就是說那一種經濟成分在整個國民經濟生活中佔支配的地位即有左右全社會再生產的可能。在古代世界，交換經濟初期，一般單純交換的商業都會是在農村支配和領導之下的。因為這時代的主要的是農業生產，農業經濟社會生產的基礎本來就建築在農村之上。領主和農奴在某種時期之內，可以離城市而生活，而絕不能離開農村土地而生活的。這時城市發生重大的事變雖然可以影響農村，但決不能破壞整

個農村的經濟基礎；農村如果生產發生危機，人口過剩，天災水旱等等馬上便影響城市，立時連着而發生恐慌。在資本主義社會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我們所認為“領導”作用，應在這樣的意義上來理解。同時，我們不能承認，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或歐洲先進資本主義經濟，在此刻能夠領導中國雲南，貴州，山谷間不與外來發生交換關係的苗族經濟生活；因為彼此之間此時尚無若何經濟的聯繫。

所以，我們不管潘東周君是否願意這樣來了解“領導”的意義，我們始終是這樣了解和這樣解釋的。

第一，關於封建經濟是否能夠在中國經濟生活中佔支配地位的問題。

“新思潮派”諸君為要垂憐中國資產階級起見，一致把一切罪惡歸到封建勢力身上，堅決地承認，封建經濟在中國經濟生活中佔支配的地位。最可憐的理論則莫過於潘東周；他一面說：“城市的資本主義確已佔領了領導的地位。”同時又說：“但是，在全國經濟生活的比重上，半封建關係仍然站着比較的優勢。”隨後又說：“但無論如何，在中國的全國國民經濟中，封建的關係仍然佔着極強度的優勢。”最後又說：“說到中國的資本主義，我們不能不記住帝國主義是佔着絕對的優勢。”觀念的糊塗再沒有比此更甚的！豈有在同一的歷史階段內一個國民經濟系統中忽而“資本主義領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39

導”，忽而“半封建關係佔比較優勢。”忽而“封建關係佔極強度的優勢。”忽而“帝國主義佔絕對優勢。”若說領導只是指經濟發展的趨向而言，我們試問：“當着資本主義還沒有在城市佔領導地位時候的經濟狀況是怎樣？那時代有否領導當時經濟生活的其他經濟成分？”若說“優勢”祇是指數量之多而言，那問題便容易解決多了。譬如說在小農佔優勢的資本主義國家小生產者必然在全人口的數量上比重為多；但是小生產者必然地要隸屬於資本主義的大工業的；或趨於破產。然而數量雖多，在經濟生活中不能起“領導”或“支配”的作用。我們不能說，小生產佔優勢的國家，小生產便一定居支配的地位。假使說，封建經濟佔優勢便是居支配全國經濟生活，那就是說，中國的國民經濟要視封建的經濟成分作用如何為轉移。

在上文我們業已說過，在中國農村經濟中，因為貨幣經濟的發展和帝國主義商品的侵蝕，早就將封建領主自給的經濟基礎嚴重的破壞。農民的貧困與破產就是促使農村經濟陷於停滯，生產力衰落唯一的表現。封建勢力唯一的基礎是靠農村的土地生產，農村經濟的衰敗便證明地主階級經濟基礎的削弱，愈促成農村依賴於城市的過程。我們現在再就中國國民經濟系統中再生產而言，假使城市資本主義工業中生產停頓和恐慌，馬上便立刻影響到農村中去。在今日

中國的農村生產中，雖然沒有普遍的採用資本主義式的技術，但在農村經濟中再生產行程，所需要於城市資本主義部門生活資料如：棉紗，縫衣針，布匹，火柴，煤油，等等的供給是非常重要的。現在甚至在粗笨生產工具上的鐵器也要在城市資本主義式的手工業工場購買的。一旦城市與農村交換的關係斷絕，農村的生產便是束手待斃的。而城市資本主義工業則不然，他雖然在輕工業和食料和原料要靠農村經濟的供給，但農村不能封鎖城市使之決絕地馬上發生危機，因為城市在相當時期內還可以得到世界市場的救濟。尤其對於重工業的影響更為微弱。這就是說農村經濟，（即說封建經濟吧！）雖然可以影響城市資本主義經濟，但是不具第一等的意義。而且農村經濟只有一天天擴大與城市進行交換而愈趨於隸屬的地位。就是說農村要受城市的領導，而城市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為全國民經濟生活中的命脈。在中國現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正是如此。承認中國封建經濟佔支配地位的新思潮派諸君！請回答我們一個問題：“現在中國的農村是否支配城市呢？”

固然，城市假使絕不與鄉村進行交換，那末，不但資本主義不能發展，並且也是不能生存；可是，城市受農村的影響最少最少也要說比較有程度之別；最少最少也要承認城市比較農村為優越罷。國際交換的發展表現國際分工與隸屬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⁴¹

於帝國主義之下的商品經濟的發展，便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發展之唯一的而重要的表現。鄉村農業經濟之依靠與城市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品而再生產而生存。這便是資本主義關係支配農村的一種表現！我們不能像機械唯物論者那樣笨重，將鄉村和城市分開，又將中國和外國分開，⁴²來討論問題說：“中國農村中還缺乏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吳黎平的意見）因此，照馬克思主義不能發生資本主義關係！？中國城市比農村數量為少，於是封建關係佔支配地位！？固然，在水鍋下面未曾架火時，冷水不會增加熱量的；但我們若從別處弄來的開水沖進去，難道這時鍋內原來的冷水不會起變化嗎？難道還是原來的冷水自冷水，後加的開水自開水，各不相犯而截然分開地并存於一鍋之內嗎？

馬克思主義簡直被不肖門徒糟踐比“教條”還要無用！

第二，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問題。關於這點，幸好新思潮派諸君也承認，“帝國主義是佔絕對的優勢”，帝國主義是什麼？牠是“資本主義最後的階段”。（列甯）牠是最發展的資本主義；牠不但在中國佔絕對的優勢，並且在全世界佔絕對的優勢。牠勢力所能達到的地方，一切經濟都要受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支配；中國的國民經濟不外就是整個世界資本主義一個單位。中國國民經濟不能離開世界市場而生存，正像中國農村不能離開城市而生存一樣。

帝國主義既然在中國經濟生活中“佔絕對的優勢”，何以在中國居支配地位的又是封建關係呢？難道帝國主義的關係是“外國人”的資本主義關係不算數嗎？要中國資本家開的工廠纔算得資本主義的關係嗎？這是很難索解的一個疑謎！

第三，就是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整個國民經濟和封建關係的影響問題。

我在上文業已說過，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是使中國愈趨於殖民地化，即愈使帝國主義在中國國民經濟中愈佔絕對優勢和支配地位。我們絕不能因中國之更淪為殖民地，而否認在中國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與勢力的發展；我們不能將在中國經濟生活中，把帝國主義在華的工廠，企業，礦山，鐵路等等推到國民經濟系統以外。只有最無恥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上的叛徒纔會說：“築路也好，開大港也好，建築新式的工業也好，但是保持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銀行，外債，航業，工廠，礦山，及一切經濟挽救，則中國無論如何……長受現在這些封建關係的束縛，”？！承認帝國主義只是在中國維持中國封建勢力阻礙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是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留着最難堪的污點！我們知道，帝國主義固然在中國要阻礙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但同時不得不在他自己的卵翼下培養一部分中國買辦，半買辦式的中國資產階級；所以，帝國主義之破壞中國純粹民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43

族工業，只是相對的，但他在中國勢力的發展要絕對的破壞封建勢力和關係，促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進化的過程。難道，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開辦的工廠，礦山，建築鐵路，等等不是增加中國無產階級的數量，難道不是在中國領域和國民經濟生活中，擴大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嗎？何以還要“長受現在這些封建關係的束縛”呢？若果如“新思潮派”諸君所說帝國主義佔絕對優勢，而帝國主義又勾結封建勢力；而封建關係在中國又極強的優勢又佔支配地位，那簡直不但中國民族工業不能發展，即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工廠，礦山，築路，也是無從進行的，何以，帝國主義的新式工業又可以在中國會發展呢？帝國主義不怕中國這麼利害的封建關係嗎？中國民族工業何以又這樣的怕封建關係呢？其實，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也不怕封建勢力，他們所怕的乃是擁有雄厚的財政資本和操有政治經濟特權的帝國主義和他們競爭呵！歐戰時期中，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便是證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怕中國封建關係而怕“外國人”！

若果一面說，佔絕對優勢的帝國主義在中國永遠維持佔支配地位的封建關係，另一方面又說：“中國從帝國主義侵入以後，工業革命的過程確實已經開始。經過世界大戰的影響以及最近幾年的變動，中國工業資本主義在城市中確是已有了相當的發展，並且在農村中已經孕育了他的種

子。”(同上 P. 17)這不是以自己之矛攻自己之盾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存在，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的兩大桎梏”。(同上 P. 22)這兩“大桎梏”一種“桎梏”是“佔絕對優勢”，一種“桎梏”是“佔支配地位”。這樣不但使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不能發展，並且會使中國資產階級的運命漸趨滅亡，難道中國資產階級一天天會消滅了嗎？帝國主義既不算數，難道中國會發生沒有資產階級剝削的無產階級嗎？

我們最後還希望“新思潮派”諸君要把“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和“中國民族工業”弄個明白！

末了，我們承認：中國社會經濟中是資本主義成分佔“支配”或“領導”的地位。

我并引王學文君的話來作為對他們的總評：

“那種見解，我們不能不說他是盲目的，不能認識中國經濟現狀是甚麼。”

(附註)以上關於“新思潮”中國經濟專號是忽促中作了一個簡單的零碎的批評。在本誌第二期當為有系統的詳細的解釋。

壟斷資本主義與經濟學

阿特拉斯著 彭葦秋譯

I 經濟與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進化的規律，是資本主義經濟進化之規律的別面。經濟學與經濟間的相互關係，不外是“上層建築”與“基礎”間的相互關係。政治經濟學是一種科學，並且是這樣一種科學：牠是適應於某個階級心理的思想成份。然而，經濟學這種思想因子的特徵，即在於牠研究的對象就是“基礎”本身——經濟。這是所謂“基礎的上層建築”，亦即是說：此種上層建築，較之其他的思想成份，要更顯明的表現“基礎”及其一切的矛盾。

要認識某一種政治經濟學體系的社會特徵，不需要怎樣在“經濟學上”探尋，因為後者（經濟學）很明顯的就陳在你面前，並且材料的本身就提供出他自己，描述出理論智識與決定理論智識之經濟基礎間之相互聯繫來。

斯塔浮爾德在他著名的貴族商人醫士的對話中，完全沒有露出工業資產階級，從這一件事中，還不就明顯的說明構成該時代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嗎？

亞丹斯密拿製針作坊來明顯的證明大工業對於手工業個人生產的優勢，顯然的，此種的敘述直接就指明了該種理論的基礎。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初步”中，也是彙集了這一些研究與敘述的材料，因為當時每章所講到的都是機器，而此種活的與死的勞働（固定的與流通的資本）與勞働價值規律間的矛盾，也正是給了前世紀這一聰明的經濟學家之不可解決的任務。

爲了節省時間，不防礙我們往前研究起見，我們不再引證政治經濟學最近歷史中之此種類似的敘述了。因為這些事實橫豎在後面還要指明的。如果正確的了解了他所研究的材料，那末對於經濟學與經濟間之密切的聯繫，或許就有一個相當明瞭的概念。

普列哈諾夫敘述馬克思所決定的一切社會制度的基本因子間的聯繫，是用下面一個比較擴大的圖表：

1. 生產力的狀況。
2. 由生產力所決定的經濟關係。
3. 在現有的經濟“基礎”上所產生的社會政治結構。

4. 部份的直接由經濟部份的由社會政治結構所決定的
社會人類的心理

5. 反映在此種心理的特性中之各種不同的思想。

普列哈諾夫所提出的這一個“貫徹着唯物主義”的一元論的公式，當然也沒有否定此各個連環間互動的可能與必要。

政治經濟學不只是對於物象的寫真，也不是一個消極的因子，他本身對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發展也表示絕大的影響。如果說：古典派政治經濟學之出現於英國，是整個的完全由經濟來限定（不只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樣承認，一切經濟學史與英國國民經濟史的深刻的研究者都這樣的承認），那末就很顯然的，在另一方面古典派所提出的原則“Laisser Faire, Laisser passer”之發展與普遍化，也促成了生產力之凶猛的增長，並且決定了未來的政治經濟學的進程。考布金以“自由貿易聯盟”而取消了麵包條例，並且因此而更鞏固了英國的工業資本主義。但是，如果是沒有李嘉圖，考布金是難以成其為考布金，亦正如沒有舊歷史學派的鼻祖李斯特，而難以有德國的保護關稅制一樣。

布加攷夫就已經講過：“政治經濟學和一般的社會科學一樣，是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合體，”在這一點上布加攷夫是正確的。“純粹的”，亦即是說與階級心理和利益不相聯

繫的，“抽象的”政治經濟學，是不存在的，亦正如“純粹的”哲學或“純粹的”藝術之不存在一樣。

如果說“政策”（亦即是形於一定形式國家機關中之社會的階級結構。）是總的表露於某種思想形態之中，那末在政治經濟的關係上（政治經濟學此名稱中之“政治”一字也不是偶然用來的，雖然此字意義在此處已有變化），此種科學與“政策”間的聯繫，將更要密切而顯然。

雖然各個現代的經濟學者，永遠是鄭重聲言純粹客觀與“絕對科學”（即超政治的）的研究任務，但是無論何時何地也不曾有過一種經濟理論，牠是脫離開階級經濟政策問題的。縱使理論的作者不肯公開的將這些關係宣佈出來，但是他的理論的本身就提供出他自己來了。

我們試拿以闡解為本職而論貨幣的實質，在數量與質量上都甚豐富的文字來看。克納樸當然是以“純粹”科學的目的，而發明貨幣的實質的，但是他所創立的唯名主義（Nominalism）却正是國家貨幣政策的基礎，而在這些政策周圍，參差了許多種階級與階級內部的利益與矛盾。唯名主義與金幣論同時既是理論又是政策；沒有不適合於某種貨幣理論的貨幣流通政策，反之，沒有一種貨幣理論，他不是同時既解決“抽象”理論又解決貨幣政策之主要問題的，並且是給後者（政策）以基本的指導原則的。

李嘉圖是流通學派(Currency School)的主腦,而同時他在金幣委員會(Bullion Committee)中所擁護的貨幣政策原則,完全適應於他們所創立的抽象的數量論,並且其原則完全是由此種抽象的數量論而產生。他的著名的論文“金幣價格高漲乃銀行鈔票價格衰落的明證”,就是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綜合的顯明的範型。

且看另外一個例子。十九世紀初葉,英國工業資產階級(在國會中),站在古典派的理論原則之基礎上,施行與工廠法運動作鬥爭(因為此種工廠法是破壞了“Laissez Faire”原則了),並且還要求許多保守黨員如 Shaftesbury, Fawcett, Oastler 等貴族的壓迫,以經過國會而實現許多自己的工廠法。此種的例證我們還可以再舉出許多。

我們既確定了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之一體之後,還要講一講上面所引證的普列哈諾夫的圖表。我們不要認為圖表中的五個因子是分階梯的,是一個個順次依屬的。生產力當然是社會一體的基礎,但是直接與生產力有聯繫的社會經濟結構,與上層建築的因子也是有特殊的聯繫的。

不能夠說:社會心理或思想是直接適應或反映政治結構,只能說是間接的(經過後者)與社會之經濟基礎有聯繫。

馬克思說“社會的經濟結構”是“真實的基礎,在此真實的基礎上建立起法律與政治的上層建築,而社會意識的某

種形態亦完全與此真實的基礎相適應。物質生活之生產方法決定一般的社會，政治，與精神生活的過程。”

此處沒有什麼階梯的上層建築。“社會意識的一定形態，和“政治的上層建築”一樣，都是適應着“社會的經濟結構”。此雙重連環對於“基礎”的關係上是平等的，但是他們不只是受同一的基礎的限制，他們彼此間還有相互的連繫。

我們認為此種校正是必要的，因為“上層建築”聯繫之“階梯”論，是不能夠正確的認識政治經濟學與思想的進化的。在這種場合下我們需要將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相互對立起來，並且承認兩者是平等的。在某種情形下，經濟理論實際上只是建基（“支持”）於已經構成的經濟政策的體系之中。而在另一種情形之下，經濟理論則又提出了經濟政策之新的原理。而此種新的原理在將來還要被統治階級或統治階級之某個集團之實際所採納。因此我們不能夠提出此種誰“接近”於“基礎”的問題。經濟理論呢，還是經濟政策。當經濟理論只是在“依屬”着經濟政策時（例如德國的歷史學派），他們兩個對基礎的關係是站在同一的距離的；當經濟理論提出了新的經濟政策原則時（如英國的古典派），那末就可以說：現存的經濟政策的體系與適應於生產力發展之路線的經濟理論，兩者間存在着一種矛盾。此時生產力的發展已與經濟政策發生衝突，而此種衝突的解決，只待於新經

濟政策體系的實現，而此種新經濟政策之體系，也在經濟理論之發展中準備起來。例如，美國的政策許多年都是保持着禁止壟斷協定的原則，但是經濟發展的力量比政策還更大些，而判定此種性質政策的經濟理論，就完全適合於經濟發展的趨勢了。

英國的古典學派，當還在重商主義的體系時，在理論上就已經創定了自由貿易的原則，結果終於實現了自由貿易的經濟政策的凱旋。

經濟政策，我們不要認為狹隘的只是國家的政策，例如：保護關稅與自由貿易等等。統治階級實現他的政策，絕不一定要經過國家的形式。當然，無論在何種情形下，他也要利用自己的力量以壓迫國家機關，要求立法機關施行他一定的路線，但是經濟政策的含義，絕不僅限於此，

例如：加特爾化與托拉斯化無疑義的是資產階級統治階層之一定的經濟政策的表現，但是此種加特爾化政策（一般的就是壟斷政策）的實現，是不曾經過國家的，例如美國的大工業資產階級只要求過政府不要妨礙此種過程，因此而復活了“Laisser Faire”原理，但是此種復活完全是在另外的條件之下，而得到的是另外的結果，因為此種原理當十九世紀的前半葉時，不外是自由競爭發展的工具，而現在此種原理的應用，却是向着相反的——壟斷的方向發展了，

因此，此種體系也正是古典派所鬥爭的對象了。

經濟政策——這不只是國家的方法，而是各個階級一體的或單個部份的爲了鞏固與發展其經濟力量之一切行動之總合。如果我們說：利益的矛盾不只是存在於各階級間（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地主階級）與階級內部（大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工業的與財政的資產階級，貧農與富農，工人貴族與不熟練工人），並且還有在世界經濟中之同一階級間的矛盾，那末經濟政策的意義，就更豐富而且有各種各色的內容了。

如果認爲世界經濟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那末在此種社會中，不斷的階級鬥爭（各個社會集團爲了分得社會的生產品，主要的還是爲了分配由工人階級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在過去在現在都是沿着此三條路線的。每一個經濟政策，歸根結局都在於要求增加某一個集團之社會生產品的分量，並且使生產力的發展也依屬於此目的之下。

只指明出一般的階級經濟政策之不足，即在於此。所以當我們講到工業資產階級的時候，我們必需計算到此工業資產階級在世界的經濟體系中之地位如何（而此工業資產階級更永遠受本國的國家制度的限制。）

根據我們對於經濟政策的定義，已經十分顯然：經濟政策不外是階級鬥爭，而成爲某種經濟政策之基礎的政治經

經濟學，要創造出代表其階級的某種“社會思想”，此種“社會思想”在實現該階級的經濟發展或鞏固其經濟的統治上是必要的。因此，對於一般的資本主義結構的辯解（並且對於某一時期，某一國家之具體的形式的辯解），這是每個資產階級的理論經濟體系之必要的特點。

因此，辯解不過就是經濟政策，因為此種辯解是階級統治的有力的武器，因此，資產階級在他爭經濟統治的鬥爭以及保護關稅或美孚油公司之帝國主義的侵襲上，此種武器都是必要的了。

× × × × × × ×

布哈林說：“每一種科學都是由實際中由社會人類同自然的生活鬥爭以及各個社會集團彼此間的生活鬥爭的條件與需要中產生出來。”——這當然是公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立場。

但是，要解釋某種理論經濟體系的社會現象，此種一般形式的立論是不夠的。根據上面我們所已經說過的，我們應當將理論的經濟體系分為兩種彼此密切交互攙雜的作用。

第一，政治經濟學是反映一定階級的心理。牠永遠是以自己階級（或該階級之某種集團）的觀點，來分析“經濟結構”，而正是隨着他此種觀點之不同來決定他對於現存的經

濟制度是批評還是辯護。當資產階級需要同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封建組織的壁壘施行鬥爭的時節，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是曾經批評過封建組織的，但是，當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已經完全肅清，而階級的矛盾也已經變為另外一種形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時節，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例如：斯益，馬克遼德，巴斯加，卡利等等，他們就由批評下亦即是進攻，轉到辯護，亦即是保守了。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結構，已經不再攻擊，而只是擁護了。

由此看來，經濟學者永遠是批評者與辯護者，隨他所處的歷史環境之不同，他所持的態度亦各異。當馬克思的革命理論廣大傳佈的時候，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又轉向進攻的——批評馬克思的理論了，但是很顯然的，他們現在所保持的不過是“以攻為守”的戰略而已。

邊巴維克對於馬克思的價值論是怎樣熱烈的批評，但是很顯然的，他的批評絕對沒有任何其他的積極任務的，唯一的任務就在於證明“實質上，資本的利息是不能作為他（馬克思）虛妄的責難的材料”，這即是邊巴維克對於使他成為維也那大學講座的現存制度的擁護。

然而，如果我們斷定了各種經濟體系的一體是某一個階級——資產階級思想之後，我們還要發明並且在現社會的根底上去解釋他們間之區別，那末只一般的判斷為辯護。

(或辯護的批評),在論證上還是完全不充分的,因為所有的資產階級的理論都是辯護的理論。

爲了解釋這些區別,我們不能夠着眼于某個作家的才力的特性,只可以觀察那在現有條件下決定他辯護的對象的社會材料。根據歷史條件之不同,而過去那些批評的對象,現在却成爲辯護的對象,此種辯護的對象,在將來的發展中却又變爲批評的對象,因此,我們的所得是黑格爾的否定的否定。”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是從否定(批評)封建式的壟斷中產生,而走到對於自由競爭的辯護,並且以批評自由競爭與辯護資本主義的壟斷而完成其發展。此種辯證的過程,我們希望能夠在新的政治經濟學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研究出來

但是,不只是在各種不同的歷史時期,即便在同一的歷史時期之中,也可以發現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體系在辯護的趨向上深刻的分歧。無疑義的,西斯曼與巴斯加實質上都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但是西斯曼批評的武器,恰好正是巴斯加辯護的對象,反之巴斯加之批評也恰好是針對着西斯曼辯護的對象。解釋此種矛盾是很簡單的。經濟發展的過程,將統一的資產階級分裂爲許多集團,在這些集團之中,首先就可以分出小資產階級以及與他對立的,剝削并消滅他的獨立性的大工業資產階級。由此而產生了上述兩種

針鋒相對的經濟體系。

在下面的分析中，當我們講到資產階級的經濟學時，我們所注意的只是資產階級領導階層的思想，資產階級中那些統治着其餘的各階層之某一階層，因之也統治了社會之全經濟機體。自然，資產階級中這些階層的心理也正是培養一般的經濟科學的精液。

馬克思說：“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以及由此發展而產生的矛盾，是與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下社會矛盾與階級鬥爭的真實發展相並行的。”此種原則是本書的基本指導紐樞。資本主義結構的真實矛盾的發展，根本變換了辯護與批評的性質的及經濟理論的一切內容。但經濟的內容絕不僅限於辯護或批評。

如果我們在總的目標上只認定是辯護與批評，認定是資產階級經濟學之自覺的或在自覺之下之目的行爲，那末我們就不能夠認識與解釋政治經濟學之新的進化了。布留敏在自己的著作中，批評奧太利學派爲“爲了反對馬克思主義而產生的人工的產物，人工的理論創造”。此種估量就是站在上述的立場之上了。當然，階級鬥爭的過程，激發起資產階級的理論家探尋新的堅固的經濟體系，但是，約曼斯，瓦爾拉斯，與敏哥爾這三個彼此不相依屬的著作家，同時都創造了界限效用說，而不創造任何另外的“堅固”理論體

系，難道我們能承認這是“人工”的，因之也是偶然的麼？

各國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之所以創造同樣的界限效用說，這絕不能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客觀基礎的。解釋此種“基礎”，只認定在經濟科學的戰線上思想的鬥爭為階級鬥爭之形式一種（但不是唯一的形式）是不夠的，還必需來分析資產階級經濟政策中之新的任務。

上面我們已經決定經濟政策為各個階級一體的或單個部份的爲了鞏固與發展其經濟力量（因此首先就在於增加其社會生產品的分量）的行動與方法（或經過國家機關實現，或不經過國家機關）的總合。批評與辯護只是此種鬥爭之一方面，只是其思想的形式。但是批評或辯護之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此種手段只能創造出一種適應的社會空氣，以實現此種鬥爭之最初目的——在現代社會中增加資產階級之剝削部份。

但是，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合爲一體的政治經濟學，他不僅是在一般的形式上答覆此種剝削之可能，並且還要在具體的形式上指示出此種剝削步驟。他不只是證明可以剝削，他並且證明需要怎樣剝削以“怎樣的方法”達到“最低的消費”和“最高的收入”。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何時何地都在執行此雙重任務：1. 一般的爲此種剝削作辯解，2. 指出某種形式或提出某種原則，以使在現有的條件下在此方面取得

最大的效果。此種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統一，貫徹在一切的理论經濟體系之中。具有以此種觀點，能夠解釋重商學派，重農學派，古典學派，歷史學派，以及最後奧大利派與現代的馬爾沙爾克拉克等的折衷派。

老辯護家克遼德完全正確的說：“政治經濟學是在經驗的敘述中辯明自己的真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最抽象的理論，是與此種“經驗”相聯繫的，並且馬克思主義研究家的任務就在於將此種理論拿到“經驗”上去。

資產階級經濟學，一方面是永遠受此種“經驗”所培養，另外一面則又是此種鬥爭的武器，並且當經濟學所提出的原則不能成為好的武器時，則對於此種不適應於新的“經驗”之舊的“真理”，施行根本的修正。

還要講明：我們現在所提出的分析經濟理論進化的原則，絕不是由我們所發現。

在布哈林“有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中，完全即以此種原則給了古典學派與歷史學派以社會學的評判。布哈林認為：“雖然他們（即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者）過去是英國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但他們所講的却是一般的經濟生活的規律。”的確布哈林也認為歷史學派，同英國以及切身感覺到英國競爭的壓迫的德國工業資產階級比較起來，乃是一種落後的產物。因此，布哈林是以具體的經濟利益的觀點，劃

分了古典學派與歷史學派，因此也是以同樣的觀點劃定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在各個不同的國家與不同的歷史時期中之不同的任務。此種方法是唯一的正確的與科學的方法。

如果說在估量這些學派(古典學派與歷史學派)時，馬克思主義者間沒有什麼分歧，可是在以社會學的觀點估量奧大利派與現代各派別時，矛盾的觀點都是免不掉的。其原因即在於：我們在估量奧大利派時所得到的歷史遠景是太小了，尤其是在現代的各個派別中，此種遠景已完全消滅。

× × × × × × ×

如果，我們將資本主義的進化劃分為三個階段——商業工業與財政(壟斷)資本主義，其原因是因為我們認為每個時期的經濟背景在原則上不同於別一個，那末，在政治經濟學的進化上，我們也必需劃分出與此相同的階段。

政治經濟學中之重商學派及其後起的貨幣論與貿易抵算論，是適應着商業資本主義時期，這是已經確定的事實。古典學派的理論，正適應着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已發展了的(但還未終結其發展)工業資本主義，這也是已經確定了的事實。

同樣的也可以說：從自由競爭的工業資本主義轉到了壟斷的財政資本主義，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一切內容

隨之也起了根本的變動。此種轉變，在程度上講無論如何也不亞於由重商主義到古典主義。

然而此種轉變究竟在何時發生的呢？其具體的表現在那裏呢？資產階級的書籍對於這些問題已經給了答覆，下面就要指明，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經濟學者已經隨着資本主義經濟之新的形態，而正確的領受了經濟學之新的精神。

爲了述明理論上的此種轉變，我們必需先解釋（雖然是很簡短的）此種因爲新的經濟環境關係而遭受了嚴重修改的古典學派的理論。但是我們只限于分析理論的根本基礎而不能夠一一的敘述其全體系。

價值（或價格），分配（利潤，——利息——工資——地租）與複生產——恐慌，這是一切經濟體系的中心。價值論（建基于一定形式與原則之方法之上）可以說又是此中心體系之基礎，價值論建立起自己的標幟，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預定出（如果該學說體系的發展是循序的，演譯的）一切基本的經濟問題的集體的解決。

分析那由經濟實體進化的基礎所產生的價值——價格——論的進化，給我們以認識整個的理論經濟體系進化的鎖鑰，其原因即在於此。

我們的任務就在于解釋古典學派的價值論（自由競爭的原理即建基於此價值論之上）怎樣並且爲什麼發展到了

自身的否定，并且代之而起的勝利的凱旋者——界限效用說，怎樣和爲什麼根本的否定了一切解釋現象之因果相屬的科學理論。但首先我們先講一講關於古典派進化的社會歷史基礎。

2. 古典派經濟學的衰落

英國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者，是工業資本主義凱旋的歌頌者。結果引起了後來瓦特，哈爾利夫斯，亞爾克拉特與克藍普頓的技術發明，此種發明從唐伯時起即可完全稱爲“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不錯，此種凱旋的第一步，已經就暗示了工人的公開的鬥爭——擁護那舊日禁止使用機器的法律，例如因爲一八〇二年維爾特史爾與庚麥史爾兩處騷動的結果，在這些區域之內棉紗的生產上都未得應用機器。在另一方面聖西門的“日內瓦通信”也在此同年出世；一八〇八年傅利葉的第一部著作出版，雖然其理論的基礎只是關於一七九九年；最後，合作運動的鼻祖禍文在一八〇〇年一月一日得到了紐蓋納爾克工廠的指導，進而實現擔負在他身上的勇敢的社會嘗試的歷史光榮。

然而，無論聖西門，傅利葉，禍文，怎樣革命的起來反對此種新社會關係的物質形態——機器，無論他們怎樣創

造社會烏托邦的思想與嘗試，他們也沒有力量挽住此種在社會生產關係上的革命，此種生產關係的革命是技術革命的必然結果。恩格斯說：“如果說一八〇〇年代，新社會結構的衝突還只是在萌芽，那末解決此衝突的方法將更是合理的。”

資本主義是生產力發展的有力的支點，生產力的“動搖”更使生產關係往前進。生產關係之新的形態——資本主義——決定“古典學派”的新的經濟理論的出現，隨資本主義之發展，此種經濟理論亦因之而發展而鞏固。

肯尼，斯密，李嘉圖諸學說之異于以前或後來的各學說的特徵，是大家都曉得的，我們現在只提出其幾點，以作為我們分析新的經濟學派時的對照。

如果說：在以前商業資本主義的時期，資本主義利潤的唯一形態，就是此種與工業因之也與勞動沒有直接聯繫的商業利潤，那末現在從十八世紀後半葉起，一般的狀況就大大的變更了。

以前因為商業的聯繫薄弱，因為沒有適當的交通，因為到東方諸國的貿易要遭到危險且時間上也特別久遠，所以資本主義式的商品迴轉是很稀少的，商品勞動價值量的決定也不能形成調劑的作用，在交換經濟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時代，此種勞動的價值才發生調劑的作用。

商業資本主義思想家——重商主義者，他們注意的中心都是貿易都是迴轉，並且以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此種由迴轉而造成利潤的學說與實際間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迴轉(消費)的觀點，被古典派的徹底的生產觀點所代替，此種觀點(生產)的產生，是直接由於十八世紀的後半葉與十九世紀初葉之生產力的突飛發展。

壟斷的與經濟生活之萬能的條例的觀點，也被一種自由競爭與國家完全不干與經濟關係的思想所代替。但是此種自由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之所謂“永久理性”之最高理想的表現，在實際上却有些不同，這不過是將該時期的“中等平民轉變為資本家，而此資本家的“特性”，就在於他以工廠的方法生產產品，在當時所統治的歷史一定關係中進行貿易。”(恩格斯)。

利潤與價值和生產與勞動間的聯繫，從實際的經驗中使資本家顯然的了解，因此而創造了辟特——斯密——李嘉圖的古典學派的價值與分配的理論，由應用大的技術(最初手工業，然後機器生產)而引起勞動量的縮小，使商品的价格能夠降低，擴大商品的銷路，將手工業家庭工業的作品從市場上排擠出去，最後，增加了利潤量。但是此種過程之能夠實現，只有在消滅了萬能的行會壁壘之時，例如：學徒條例，商業壟斷，糧食稅等等，這一些都是阻礙工業資本

主義發展過程的贅物；古典學派所倡導的所謂“堅固的”與“自然的原則”的理論，在一八二〇至一八五〇年，被英國工業資產階級在實際中實現出來了。

古典學派的市場與恐慌學說與他們的價值論和分配論有密切的聯繫。馬爾薩斯與西斯孟，李嘉圖與斯益，這兩方面的理論鬥爭是大家都曉得的，關於他們此種爭論，我們現在只指明一點，就是；他們此種爭論絕對不是工業資產階級間思想的衝突，而是在現有的情形下各種不同階級集團間的利益的衝突。馬爾薩斯與西斯孟他們共同證明“純粹”資本主義社會之不可能，剩餘價值實現之不可能，因此必然的發生不斷的資本主義恐慌，他們所反映的是敵對工業資產階級的階級經濟政策的利益。他們的悲觀主義——不信任資本主義進化發展的可能——只是一定階級的經濟政策的理論的反映。馬爾薩斯——土地的佔有者，西斯孟——小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的“鐵蹄”下遭受到無情的摧殘的獨立的小生產者。

西斯孟在大陸上批評“英國”的工業資本主義，並且隱秘的指出了由資本主義所引起的社會的貧困。這完全是“大陸派”的批評，正如圖幹——巴蘭納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樣：大陸諸國，尤其是西斯孟的家鄉瑞士紡織業的狀況，較之英國的手工紡織業要強的多，因為在這些地方（大陸諸國）農業

還沒有與紡織脫開。但是小資產階級的此種對於資本主義的批評，在這一點上是完全與馬爾薩斯的地主的批評相適應了。

因此，在經濟學上反對古典學派的反對派，是當時統治階級的反對派。當然，爭論的解決者不是理論，而是實際，而是工業資本主義的有力的發展。進步階級的理論戰勝了，他們的經濟政策也促成了廣大的生產力的發展。工業資產階級就是此進步的階級，其思想的代表就是斯密——斯益——李嘉圖——約翰穆勒。他們都是樂觀主義者，他們認為生產的發展沒有什麼社會的界限；現有的一切生產力可以盡量的利用，因為馬爾薩斯——西斯孟——喬美斯——冒法特所提出的純粹社會制度的界限，不外是需求，但是生產提高到若何程度，需求就擴大到若何程度。由此，供求的混合論，代替了簡單商品交換的迴轉論。“生產的發展從來不能特別超過需求。生產是需求的原因，並且是其唯一的原因。生產如果是不能同時創造同量的需求，則亦不能創造供給。”（約翰穆勒）。

他們將供求的一體論，轉變為供求的混合論，因此，他們將商品的迴轉（即將“商品——商品”的公式，分為“商品——貨幣”與“貨幣——商品”）同簡單的商品交換（商品——商品）混同起來。因此，恐慌是不會有的，即有也是偶然

的，並且他們不是以生產過剩來解釋，而只是以某些生產部門的生產不足來解釋。

然而他們此種理論上的錯誤，也是有他客觀的經濟基礎。當時，資本主義還正是在所謂創造時期，而且涵養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矛盾，還未能在明顯的形態中表現出來。不錯，當李嘉圖（他的著作第一部是在一八一七年）以前，當約翰穆勒與斯益（他們的著作是在十九世紀之初二十年）以前，已經就有工業恐慌的發生了，但是這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恐慌，因為此種恐慌的產生是由於特殊的，按布尼秦的術語就是：外來的因子所引起。例如：一七一九年的恐慌是約翰洛的財政活動的結果；一七二一年英國的恐慌是“南海公司”倒閉的結果；一七九三年與一八一〇年的恐慌是由拿破侖戰爭所引起。破壞經濟體系平衡的因子都是從外來的。因此他們也不能夠確證或否定李嘉圖，斯益，穆勒他們所宣傳的“自然的規律性”，此種宣傳他們是由斯密的荒謬的複生產學說為出發——將社會的生產品分為V（可變資本）與M（剩餘價值）與未定的C（固定資本）。

當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雖然實際上有某種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但是此種障礙都是舊日經濟關係的遺跡，——封建制度，行會制度以及其他許多條例及壟斷等。

被一種經濟鬥爭最有力的武器——技術的發明——武

裝起來了的英國工業資產階級，他只要求一個自由生產與銷售，因為，生產的擴大；隨之生產的消耗亦特別降低，價格亦特別降低，這都是競爭的武器；所以，古典學派所高唱的，並且在他們的價值論與複生產論的基礎上很科學的創立的自由競爭與消滅壟斷（舊式的壟斷）的原則，是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經濟政策的要求的真實表現。

壟斷與壟斷的價格，他們仍認為是一種過錯。古典派史陶爾說：壟斷的最高的價格的可能只有在……；有時壟斷要從自然規律的本身產生出來，但是很少是由人非正當的構成的結果”。在另一方面，政治經濟學已經為資產階級下了命令：用全力擴大生產吧，因為這樣既有益於你每個資本家，又適合於全社會的利益。斯益說道：“我們應當這樣說：商品之不能賣出，是因為其他的生產品少”。換句話說：經濟上困難的產生，不是由於生產過多，而是由於生產過少：“生產者愈多，生產品的數量愈大，則生產品的各種的與擴大的銷售亦愈多。

由此看來，古典學派的政治經濟學，乃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之統一的最明顯的模型。

古典派的經濟學不只是批評了封建主義，重商學派，辯護了工業資本主義。他並且提出了完全適合於資產階級實際的經濟政策的一定原則，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他們才得

到了偉大的成功：Hibbins 說“經濟學家的學理，結果被活動的人類實現在實際中了”。這是發生於十九世紀的初葉；自由貿易的凱旋，在一八四六年取消了麵包稅。

但是當自由貿易與英國工業家的激進生產還未能完全鞏固了英國資本主義時，英國資本主義的結構就已經露出了破綻。一八二五年雖然沒有任何“外來的因子”，雖然經濟學者對於此新的經濟結構有熱烈的讚頌，但是完全出人意外的工業恐慌，究竟又發生了，並且從此時起恐慌就定期的排演。正是此種恐慌的必然實現，使西斯孟意識到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因此，他在政治經濟學上開始了一新紀元”（馬克思）。洛伯薩斯很肯定的說：“正是一八一八至一八一九年的恐慌將西斯孟從斯密學派的熱烈同情者，變為斯密的堅決的反對者。在二十年代，不僅西斯孟對於資本主義有所批評，拉溫斯頓與郭德肯站在李嘉圖的價值論的基礎上也有對於資本主義的批評。但是現在我們不再敘述這一些批評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說了，因為我們的任務乃在於解釋工業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經濟學之未來的發展的階段。

毫無疑義的，革命運動（一八五至一年的里昂暴動，一八三八起一八四二年的憲章運動）一方面在馬克思的“經濟學批評”未出世以前就加緊了經濟書籍中對於資本主義的

批評，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也不能不完全揭露出來：恩格斯說：“資產階級的學說認為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利益相同，認為自由競爭的結果乃是全人類的幸福，全人類的調協，但是事實却愈益確切的流露出此種學說的荒謬”（“反杜林”）

正是因為事實“揭穿”了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並且顛覆了李嘉圖，斯益，約翰穆勒的一切調協說，站在階級利益的觀點上，資產階級還必需努力的加緊辯護方面的經濟理論，因之在舞台上乃有庸俗學派的出現。他們堅決的保持着古典學派的自由競爭的原則，發展了古典學派辯護方面的理論，他們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修正了古典學派的理論，因為實際上李嘉圖的理論已經就“發現了，敘述了階級間的經濟矛盾——內部的聯繫暴露了此種矛盾，——因此，在經濟學上發現了，創造了歷史鬥爭及其根本的發展過程。因此加利促成這一點，就好像促成共產主義的父親一樣。

這是很顯著的事實：英國在政治經濟上創造了些最大的經濟學家如斯密，李嘉圖等，因之在整整的半世紀中（從十九世紀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一直到傑堯西也不曾再有一個創造獨立學說的大經濟學的出現。此後，德國在保護關稅的口號之下，才鞏固了，發展了歷史學派，其代表即：利斯特，洛色爾，希德伯蘭，克尼斯，史冒萊爾等等。然而，德

國工業資本主義在保護關稅的庇護之下之有力的發展，同時要提高了德國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又進入一長期恐慌的時期，此時德國經濟學的代表就是些歷史家，他們就直接宣佈自己的原則，否定對於經濟過程之抽象的理論分析，在其他各國就是些庸俗經濟學者的出現，如馬克遼德，巴斯加，加利等。

然而，英國的馬克遼德，穆勒，辛尼爾，肯斯，法國的巴斯加，美國的加利，他們都不能創造新的派別，其原因就在于：他們完全還佔在以前自由競爭的立場，而將辯護方面的古典的理論庸俗化了。

在自由競爭方面，他們整個的還是繼續着古典學派的傳統。例如，馬克遼德曾說：“貿易上的壟斷是一種嚴重的社會罪惡：因此，政治經濟學乃是此種壟斷的最大膽的破壞者”。

此時在大陸上又有巴斯加及其嬌柔的“經濟的詭辯學”的出現：他實行與蒲魯東鬥爭，擁護資本主義，他最初認為資本主義乃競爭的工業資本主義。在巴斯加的許多論文中曾有一篇寫道：“自由貿易應當割斷寡頭政治的對內掠奪，壟斷和對外(殖民地)掠奪的根源，因為壟斷與殖民地完全不適合于商業自由，不外是一種對於自由的人為界限”。肯斯在六十至七十年代的著作中也是激烈的壟斷主義的反對

者，擁護貿易的自由競爭。

但是，我們要問一問：此種建築在濃厚的辯護色彩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自由競爭原則，是否已保證了工業資產階級的階級的經濟利益呢？

對於這個問題是得到了否定的答覆，其原因是這樣的。古典派之以生產的觀點來研究經濟現象（首先對於價值），關於恐慌之不可能及需求的隸屬作用的學說，一切這些原則在實際中都遭到了破產。在一八二五，一八三七，一八四七，一八五七，一八六六諸年中，英國是經歷着嚴厲的工業恐慌。在七十年代從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九的六年中又遭遇着工業的極端的衰落。失業工人增加，革命運動興起，工人階級的組織成立起來。德國與美國的保護關稅制，促成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的強烈的發展。英國在七十年代就失掉了他過去在世界的領導。英德美這三國間的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狀態減少了。在英國，在大陸諸國在美國，都一樣的進行着資本集中與集合的迅速過程，內部競爭的範圍漸次的縮小，而國際上的競爭漸次的尖銳起來。生產的漸次遞增是與他（生產）所處的“狹隘的消費的基礎”相聯繫着的。工業資產階級現在很敏捷的感覺到市場問題是他們的生死問題。古典學派的複生產論，斯益穆勒的供求混同說，現在在工業資產階級看來，真就是對於他們親身經歷的實際開玩

笑。

資本家對於生產的威力，對於可以無限制擴展的信仰已完全失掉。“自由競爭”不只已經不是提救貧窮的萬能劑，反之，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絕對不適合於工業與商業穩定的原則了。對於來日的希望已完全沒有，恐慌與衰落成了家常便飯，因之工業資本家就不得不採取掠奪市場的方法，現在這些市場已經完全被他們所統治了。

以前的武器——生產技術，在過去是英國工業家的基本號牌，現在已經是市場競爭與擴大銷路的無用工具了。每個人都看到了價格的搖擺不定（在恐慌時期），因此，必然的要打破以前認價值由勞動與生產的消耗來決定的觀念：表面看來，價格的漲落是與生產的消耗沒有任何聯繫的。工業資產階級現在注意力的中心，已不是生產技術，不是勞動，而是市場，而是週轉，而是供求了。

因此經濟發展的全過程，為資產階級提出了根本改變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的問題。而政治經濟學（下面要指明）形成的本質，就在於理論上表明出此種新階級的經濟要求。

古典派的經濟學以及許多無用的庸俗的古典派的辯護者們（他們在各種場合上都保持着那些舊的與實際有不可共存的矛盾的真理），已不能滿足資產階級的積極任務了。舊經濟學已經進入了死巷，因此，創造新的理論經濟學的

體系，不只是辯解資本主義，並且還能夠提出與建立新的經濟政策原則，只有這樣才能脫開這條死巷。此種適應於十九世紀末葉的新學說，就是界限效用說。

我們現在還要指明一點，就是爲什麼在德與(奧大利)國感覺到創造此新的理論派別之必要，而在英國則沒有發覺。歷史學派在過去已相當的反映出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在過去一個時期之所以能夠保持沒有任何理論，就是因爲歷史學派實質上否認一般的經濟理論。他保證了德國工業資產階級的基本經濟要求，——保護國內市場並製造和緩空氣以發展國內工業。但是到七十年代，德國已經不只是需要保護國內市場，並且還需要奪取世界市場了，因此，只一個保護關稅政策已經感覺到不夠了。在另一方面，國內市場在過去還只是在無組織的狀態，並且國內的競爭要削弱德國資本在世界上的力量。最後在第三方面，德國（與奧國）此時已經傳佈了馬克思的經濟著作（“經濟批評”在一八五九年出版，“資本論”第一卷在一八六七年），而當時在德國佔統治地位的各資產階級學派，還沒有力量以自己的學說與馬克思對立。上述的一切情形，給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一個大的社會的命令，使他創造新的理論體系，並且此種命令已經被界限效用說完全執行出來了。

（本節完本文未完）

本社出版女作家兩大傑構

素箋

——著士女清晶陸——

這本美麗的小書包含十封寫給幾個似曾相識的人的信。這樣的體裁在文藝界上已經開了一個特別的面目，她曾經用一個假名在她自己辦的一個刊物上發表過幾篇，極博得讀者的愛好。中國婦女生活史的著者陳東原特爲此事寫了一個信給她追問作者的眞姓名，並且在慨嘆中國沒有眞正女性之後，這樣揄揚這幾篇美麗的散文：「讀了波影君的素箋之後，馬上便令我感覺到這女性的逼真的表現的親切有味。」至於文筆的輕剽婉轉而富有詩意，尤其是作者的特長。

雁盞

——著士女隱廬黃——

黃廬隱女士很久沒有與文學界讀者見面了。這一個很久的沉默的時期，就是精心去完成這一部極偉大極精彩的傑作。讀者讀過這部小說以後，自然會驚異黃女士的詩意的文筆是更有詩意了，對愛情是有了更深的了解與體驗，所以寫來能這樣動人。體裁是用日記體寫成，似乎裏面是含有些很有深意的背境，這在乎聰明的讀者去探索了。

馬克思價值論的基點及其與李嘉圖學說之區別

盧彬(Rubin)著 代青譯

本文原係盧彬替羅遜白格 Rozenberg 所著“李嘉圖與馬克思的價值說”一書此所作的序言。原文甚長，幾佔那本小冊子全篇幅二分之一。

盧彬本是蘇聯著名的經濟學者，著作甚富。所著有“馬克思的價值說”一書，約近三十萬言，甚為一般經濟學者所注意。最近且因這本書在蘇聯經濟學家中引起了一番很熱烈的爭論。至于這次爭論的內容，本誌下期當另有專文介紹。

——編者

(一)

引言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對於他的前輩古典派經濟學說之關

係問題，特別是對於李嘉圖理論之關係問題，是具有莫大的科學興趣的。我們可以斷然地說，如果沒有對於馬克思和李嘉圖的關係有明白的觀念，則吾人對於馬克思添入于理論經濟學中者是何新學說，以及馬克思在經濟思想史上是佔何地位，亦將不能得一確切之了解。此問題初視之，一若久經人解決而現在已不復有何特殊置疑之餘地了。蓋李嘉圖巨作之出現，已百年于茲，而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之入世，亦在十九世紀以上，難道馬克思的學說及古典派政治經濟學之關係問題，迄今尚未得最後之解決？不幸得很，事之發生于今茲者，恰恰是如此的。對此兩個經濟學者的問題之完全一致的意見，是很難找的，讀者于羅遜白格書中所論列各種不同的判斷，即可找到不少的例子。此問題之在今日，仍富有生動之爭點，而經濟學在任何時，少有能宣佈此問題為已得解決者。

此種初視似甚奇怪的現象，其原因，是兩方面的。一方面，十九世紀末，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對於前此極佔優勢的亞丹斯密及李嘉圖的價值說進行修正甚力。在此時以前，古典派之經濟學說，雖稍經改頭換面，然尚為建立新理論體系之共認的基礎。歷史學派對於古典之抽象的及演繹的方法之攻擊，不能達到目的，實因歷史學派本身亦迅即充分曝露出自己理論上的弱點。然至十九世紀之末，情形大變。當時

在官場的科學舞台上，有效用界限說出而風靡一時。此種學說，對於古典派所建立而為馬克思的價值論之出發點的客觀價值說，自不能放過。主觀學派中之最頑梗的代表，曾從前面對古典派採用最堅決的襲擊，而企圖證明他的理論之不正確性，矛盾性及其無根據。而官場科學中之另一派代表，則從後方加以包抄，要證明古典派在實質上，無論何時皆非勞働價值說之同情者，百年來之作如此承認者，是特錯解而已。那時他們便開始把斯密變成一個主觀勞働價值說的理論家，這還具有一點根據；或是把他變成使用價值說的理論家，效用界限說的前輩，這一點連半點理由也是沒有的。同樣的，他們之觀察李嘉圖學說中生產費的理論，也是以為他和勞働價值說是毫無關係的。至于亞丹斯密，批評家們對於他的價值說之以前共認的見解之“修正”，據我們看來，是給與了某種的積極成績，而指出了混在他的理論中的思想影響及理論立場之各種形式。然此積極成績，亦是片面的和誇大的形式。其對於李嘉圖，則更是如此。想推翻李嘉圖之為勞働價值論者的企圖，根本上是虛偽的，不加以糾正，則實有害於經濟思想發展之前途。

資產階級科學最近以來既從事對於古典學派的“價值之重新修正”，而他一方面，第三卷“剩餘價值論”中的馬克思的思想，更有了新的豐富的材料，要求吾人對於馬克思學

說及其前人的學說間之關係，作深刻之研究。此種問題尚有待于詳細之考察，現在不但是在馬克思主義者及非馬克思主義者之間有不同之爭論，而且即在同一營壘之中，亦不見有同一之意見。指出馬克思及古典派之關係問題的複雜性及可爭論性，將羅遜白格所著馬克思與李嘉圖的價值論譯為俄文，是應該的。本書的著者，是馬克思勞働價值說的同情者，對於馬克思及李嘉圖之學說及其間比較的價值，予以明顯的，系統的說明。他在各方面，注意於檢討此兩思想家的學說之共同點及差異點。此種對於各方面之詳細的，有系統的分析，是羅氏本書之莫大成績。然同時亦就是他的弱點之來源。著者在未指此二者學說中之一般的邏輯方法的基礎，因而近于接合了此二學說，而不最充分地說明此二者之原則上的差異。羅遜白格是從這一方面極力向那些認為李嘉圖的學說是與勞働價值說毫無關係的批評家作最激烈之論戰的。一方面是極力的指出李嘉圖之為勞働價值論者，另一方面對於馬克思價值論之邏輯方法的基礎的分析，又付厥如，因而羅氏是太把此二種學說接近了。著者雖曾指出此二者間對於各方面見解之不同處，然而並不能指出原則上馬克思添入于經濟學中是何思想，而其與李嘉圖區別之點究何在。著者本身對於馬克思與李嘉圖間，在價值論方面之區別，且有言曰：“所差無幾”，而以為大部分是在于對

“歷史社會及哲學的觀點”之不同。這個意見我們是不能同意的。一般的，在李嘉圖的經濟學說及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間及其部分的價值論間，皆存在有根本之區別。本文之目的，即是指明這一方面的問題，而對羅遜白格書中之推論，加以糾正。為達此目的，本文即不能對於各個問題都加以討論，不過是指出馬克思經濟學說之總的邏輯方法的基礎及其價值論之一般的特點。然後對於馬克思及李嘉圖學說間加以比較，其中並說及我們和羅遜白格分析不能相同之各點。

(二)

馬克思經濟學說之方法論的基礎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是和他社會學上的理論，和他的歷史的唯物論，在思想上密相連貫的。費爾斐丁曾指出歷史的唯物論和勞働價值說，具有共同之出發點，此共同之出發點即是：“勞働成爲建立人類社會之要素，而勞働之發展成爲社會發展之最後的決定者”。(註一) 結合於社會中之人類勞働行爲。吾人可從兩個不同的方面研究之：或是人類賴此以制勝自然界並產生人類所必需的生產物的生產工具及技術方法之總和；或是連繫人類於生產過程中社會關係的總和。技術與經濟間，生產之物質技術與他的社會形式間，生產力及

(註一) 費爾斐丁著：馬克思批評家的柏堅爾克。

人類社會生產關係之區別，乃由於此。無論是歷史的唯物論的理論，無論是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都是旋轉於一個同一的基本問題之上，這個問題就是生產力及人類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問題。兩者研究之對象，是一樣的：即依生產力之發展的人類生產關係之變遷。人類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發展之相適應，——表現在此兩者漸次發展矛盾形式中的過程，是歷史的唯物論之基礎的理論。應用此總的方法論的觀點於資本主義的商品社會，即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是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中之人的生產關係，人類生產關係對於生產力發展程度之相適應及此兩者發生矛盾（表現于危機中）的過程。

因此，政治經濟所研究者，非勞働之過程，即非研究其物質技術方面，而所研究者，乃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働組織之社會形式。生產技術或生產力之入于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或歷史的唯物論之研究的範圍以內，只因牠在我們研究之真正對象（人的生產關係）上，是為說明所必要的前提，或出發點而已。馬克思所徹底指明生產過程及其社會形式間之區別，是予其以了解其整個經濟制度的鑰匙。這個區別完全決定了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是一種社會的及歷史的科學。在經濟生活之五花八門，錯綜混雜之中，表現了“社會連繫及技術方法之結合”（資本論第一卷P. 614），這個結合立即

引起吾人對於生產過程中之人的“社會連繫”，對於他的生產關係之注意力，並以生產技術爲此生產關係之前提或基礎。政治經濟學不是檢討物與物間的關係之科學，如那些庸俗的經濟學者所理解者；亦不是檢討人與物之關係的科學，如那些限界效用說所主張者，而是檢討在生產過程中人與人間之關係的科學。

研究資本主義商品社會中之人的生產關係的政治經濟學，預先即已肯定了一定的經濟結構及一定的社會形式。如吾人只以爲是研究一定社會中所發生的現象，則對於馬克思“資本論”之任何一個理論，都不能有正確的了解。“亦如在一切的历史社會的科學一樣，對於經濟範疇之關係，無論在實際上，或在頭腦中，都應該經常根據于主體，我們現在的主體，便是近代資產階級的社會，所以範疇所表現之生活形式，生存條件，常常只是這個一定社會，這個主體之一方面”，“在政治經濟學之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要經常在我們觀念中，當作一種前提”。（註二）從一定的社會前提出發，即從一定的經濟的社會結構出發，政治經濟學首先予吾人以此種經濟形式及其人的生產關係之特性的分析。馬克思在其“商品拜物教的學說”中，已給吾人以這個一般的分析了。此種分析，正確些言之實，可稱爲資本主義商品社

（註二）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序言。

會的生產關係之總理論。本章中即要認識此種生產關係之總分析，下章再研究此種關係之一，即是價值論所研究之商品生產者間之關係。

在吾人研究資本主義商品社會之時，應先認此種社會是商品經濟，而此商品經濟是由建立于私有財產權之上的各商品生產者所指揮所組織之各種企業組合而成的。商品經濟之一般的結構，有下列幾個根本的特點：(1)國民經濟之各單位，即各部分之企業，在形式上是獨立的；(2)他們在物質上，因分工之結果，是互相連繫的，他們藉此而相互幫助；(3)各商品生產者之直接連繫，只有經過交換，才能發生，然間接亦影響於其生產行為。每個商品生產者在他的企業中，是可以自由按其意志便利生產某種生產品，或在某種生產工具之下較便以生產的生產品。然當他運自己勞働所製成生產物于市場以為交換時，便不能建立交換之標準，迫而服從某種生產物的一切生產者之一般市場條件了。生產者對於市場之依賴，即可以證明生產者之生產行為是和社會其他各份子之生產行為相依為命的。設今有許多羅紗匠運載羅紗于市場上，非常之多，則羅紗匠伊凡諾夫（他並未曾擴張自己的生產），將迫而減低價格，並迫而縮小自己的生產。設其他羅紗生產者，皆有完善之生產工具（例如，機器），則這個羅紗匠亦將迫而圖改良生產技術。就其趨勢，就其範

圍，就其自己生產方法而言，每個商品生產者，形式上仍是獨立的，實際上他們經過了市場，經過了交換，從而發生了密切之關係。在其自己的生產過程中彼此還不為社會連繫而結合的各單個商品生產者，經過了交換，經過買賣的生產關係，經過物之轉移，而結合起來。人之勞働行為經過勞働生產物而結合，人則經過物而結合。物之交換，影響於勞働活動，沒有交換，則資本主義之生產過程，亦是不可能的。

“資本主義生產之過程，從整個觀之，則為生產過程及流通過程之一致。”（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部，P.1）

此交換之作用，乃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之要素，而從無組織性質中，或從所謂資本主義生產之無政府狀態中發生出來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交換之近代的形式，是沒有的。社會機關已預先建立好人與人間一定的生產關係，它是在物質技術的生產過程的正當而無妨礙狀況之下的必然的生產關係。消費生產及工具生產的東西，彼此間之轉送，非從交換開始，即非從買賣開始，而是有社會特定計劃並與技術生產過程的必要相適應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吾人可見到企業內部勞働組織（勞働之技術分工）之有組織的生產關係的例子，和各單個企業間（社會勞働分工）之無組織的勞働分配有別。以例言之，有一大紡織廠；由紡紗，織布，染色三大部分組合而成，而屬於

一種企業。工程師，工人，及職員，都按預定計劃，在各部分中預先分配好的。你們在預先已有和技術生產過程的必要相適應的一定經常的生產關係之連繫。因而在生產過程中，物在彼此間之轉送，是依于生產過程的人的地位，依于他們間之產生關係。例如由紡紗間收到了紗，並以之製成紡績品，紡織部門的管理人並不把這紡績品送還紡紗部門的管理人，以為報償他們前所送之紡紗，他却又把這紡績品送到染色部。因為結合染色部工人及紡織部門工人的經常生產關係，早就預定了物（勞働生產物）從前一生產部門（紡紗）做工的人送到後一生產部門（染色）做工的人中間之移轉了。人與人間的生產關係，早就組織在物之物質生產的整個當中，並非以經過物為手段。另一方面，物在生產過程中，從這一部份的人轉到別一部分的人，是藉着存在于他們間之生產關係，然此種移轉並不創造他們間之生產關係。人與人間的生產關係，是表現有社會的性質，而物之移轉，是表現了技術的性質。此兩方面，預先已有計劃彼此互為適應，然仍存有兩種不同之性質。

如果紡紗，織布及染色，是屬於三個不同的企業家A B C，則其情況即要劇變了。此時A不會簡單地因為B可以把紡紗製成有益于社會的紡績品這一點理由，就將自己製成的紡紗交給B，他是不會這樣做的。一般說來，此時他所願

意的，不是把自己的紡紗交給誰，而是把它出賣，就是從交換中去取得相等量的貨幣，或價值相等的東西——對等物。誰是能夠這樣做的，對於他都是一樣的。他和這種人，亦無何種經常的社會生產關係，A之入于買賣的生產關係，凡是他有確定的東西，相等量的貨幣而願意賣他的紡紗者，任何人我都和他發生關係。這種生產關係，是限制于物之移轉，即是紡紗由A轉到購買者，而貨幣則由購買者轉到A。所以，商品生產間之生產關係，非預先即存在了的，而是從買賣的行為中，經過物之彼此移轉中才建立起來。因此他們不僅有社會的性質，而且有物的性質。另一方面，物由此一部分的人轉到他一部分的人，並非因有生產關係，預先就存在于他們之間，而是因為有限制物之移轉的買賣之力，才發生起來的。物之移轉，建立了人與人的生產關係，不但有技術的意義而且有社會的意義。

這樣我們看見了商品社會中人的基本生產關係，這即是買賣，它和有組織形式的生產關係之區別，有下列幾點：

1. 關係是按照對於某份子有利才建立起來；社會連繫是部份結合的形式；
2. 這種關係之結合份子，是暫時的，並不在他們之間創立經常的生產關係，然此種暫時的和不斷的買賣結合，在他的總和中，應是保證經常的和不斷的社會生產過程。
3. 這個關係之結合人類，是在于他們間物之移轉

時，并爲此物之移轉所限制。人與人間之生產關係之建立，不先于物之移轉，而和他同時發生。“商品交換，是物之社會交換的過程，亦各份子特殊生產品之交換的過程，同時即表現了一定的生產關係之建立 (Erzeugung)，在這個關係上，人便加入于物的交換當中。”(註三)換句話說，交換，買賣把兩個不可離的社會經濟的成分(人與人間的關係)及物質的物的成分(在生產過程中物的移轉)結合起來了。在商品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此兩個成份非預先組織起來的，彼此間亦不相合，因此，交換之每一行動，只在此兩成分(其中每一個都是好像去迎合別個似的)結合而共同行動時，才能實現。物之移轉，沒有在他們的所有主間建立了特殊買賣的生產關係，是不可能的；反之，人之相互關係並非以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佔有一定位置的社會份子資格出現的，而僅是以物的所有主出現的。

如有人和別人發生了生產關係，僅僅是以某物的所有主資格出現，那末，某物(假設還不屬於任何人)即給予他的所有主在生產關係的系統中佔有一定地位的可能。因爲物之佔有是建立人與人間生產連繫的條件，因而物之本身，即佔有機能，建立生產關係的特性。若商品所有主間之連繫，是經過物之交換，若物可以給與自己所有主以和別個

(註三)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1907 P32

商品所有者發生交換關係的可能，則物之爲物即發現有交換之特性，就是“價值”。若某物結合了兩個商品生產者，其中一爲資本家，一爲工人，則此交換特性。不僅是“價值”，而且還是“資本”。若資本家和地主發生了生產關係時，則此價值，貨幣，轉到地主，因而和地主發生了生產連繫，則變爲“地租”。由工業資本家支付貨幣給貨幣資本家，以爲使用他的貸金之報酬，是謂之“利息”。人與人間生產關係之每一形式都給與物（人之入于生產連繫是經過了它）以特殊的“社會特性，和經濟的形式。”物除他是使用價值外，他還是有一定特性的物質的物，是消費品或生產工具，即是在物質生產過程盡了技術的機能，同時亦盡了人的連繫之社會的機能。人們建立他們間的生產關係，是經過物。因而，物成爲人的社會生產關係之“居間人”“紹介者”了。人的關係，由物所表現的社會性質表現之，人們也就“自化爲物”了。

所以，在商品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入于社會生產關係中，是以商品所有者出現的，即以物的所有出現的。另一方面，物因而得到特殊的社會性質，特別的社會形式。代替建立于有組織經濟的社會的人及其工作之直接社會關係的，我們現在此地看到的是“人之物的關係及物之社會關係”。（資本論第三卷，P.40）這兩個商品經濟之特點，“物之人格化及生產關係之物化”（資本論第三卷第二部360），實

質上祇是一個現象之兩面，像我們所說的：是人的生產關係之建立及物質生產過程中物之移轉混合起來的過程，而密切相連繫的。此種生產之社會的及技術的成分之混合，在普通人看來，或是庸俗的經濟學者看來，以為他是同一的，馬克思在他商品拜物教的理論中所指發的錯誤，即是由此而來的。庸俗的經濟學者之錯誤，是兩方面的：他們或是(1)拿技術現象來闡釋社會現象，把一定的社會特性(價值，貨幣，資本等)當作技術生產的因素來看待；例如，拿生產工具的技術功能來闡釋資本的特性；或者是(2)拿社會現象來闡釋技術現象：例如，他們將提高勞動生產力的生產工具的能力(這是技術的功能)當作資本看待，亦即是當作資本主義社會中設置生產工具的社會形態看待。將這兩種錯誤看成對立的性質，那是走入同樣的基本缺陷：即生產之物質過程及其社會形式，技術與經濟，物之技術功能及社會功能之同一化。這個缺陷已為馬克思的新的社會學的方法所鏟除了。

馬克思的方法是在於徹底地將生產力及生產關係，物質的生產關係及其社會形式分別起來。政治經濟之研究人的勞動活動，非從其技術方法及勞働工具方面研究，而是研究他的社會形式這一方面，而是研究建立在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生產關係。然因商品的資本主義社會之中的人的生產關係，乃經過物之移轉而發生連繫，故人之生產關係，具有

物的性質。這種“物化”是在於人因物而入於相互間之一定關係中，物乃完成了特殊連繫人之社會功能，即人的生產關係之居間人或“介紹者”。除它的物質的或技術的存在性，即為消費品及生產工具外，他還具有社會的或功能的存在性亦即是特殊的社會性質（價值，貨幣，資本等），這個是表現了人的一定的生產關係，而給與物以特殊的社會形式，“形式之一定性”（Formbestimmtheit），這樣，政治經濟的基本概念或範疇，是表現了基本的社會經濟的形式。這個社會經濟的形式分別出人的生產關係之各種形式，而此形式乃由因而建立人與人間的關係的物所表現出來的。

馬克思當要研究“社會的經濟結構”或“人的生產關係之總和”（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言）時，即將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生產關係之各種形式區分起來。（註四）馬克思對此形式研究之程序如下。一部分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已經表現有某一社會各份子間生產關係之其他形式的存在性了，然而後者非前者關係之必要的存在性，即並非他的前提。以例言之，工業資本家Q及工業資本家B間之關係，（工業資本家從貨幣資本家得來一定的貨幣資金中表現的關係）已經

（註四）此地所說的，不是指經濟之各種形式，例如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等，而是指在資本主義經濟範圍內生產關係之各種各形式。

表現有工業資本家B及工人A（正確些說，許多的工人間）間之生產關係的存在性了，然另一方面，工業資本家及工人間之關係，並非工業資本家從貨幣資本家得來貨金之必要的[存在性]。故“資本”及“剩餘價值”的經濟範疇是先于“貨金資本”及“利息”[而存在的]。次之，工業資本家及工人間之關係，是在于勞動力之買賣的形式中，同時，工業資本家之生產商品，爲的是出賣，就是說，他同時又以商品生產者相互間的生產關係和社會之其他份子連繫起來了。然而，商品生產者的關係，即買賣的關係，並非工業資本家及工人間之必要的生產連繫。故“商品”及“價值”的範疇是先于“資本”而存在的。經濟範疇之邏輯的程序，是從他所表現的生產關係的性質發生出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體系，是研究由許多複雜的社會形式（由物表現的）所表現的人與人之間生產關係的許多複雜的形式。這個在人類生產關係的一定形態及其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功能或物質的社會形態間的聯繫，我們是可以從一切經濟範疇中研究出來的。

人之基本生產關係，即以自己勞動生產物交換的商品生產者之基本生產關係給與了勞動生產物以交換的特殊性質，好像他們存在的天性一樣，給與以“價值形式”，人與人間之經常正當的交換，使商品生產者的社會行爲因而劃定了一種商品（例如，金子）作爲普通的相等物，這個普通相等

可以直接和任何商品相交換，因此遂予此劃定商品以特殊的貨幣機能，或“貨幣形式”。這個貨幣形式，首先要視賣者與買者之間的生產關係的性質若何，其機能或形式，亦有所不同。如商品從賣者至買者間之移轉，和貨幣之對換，是同時進行，則此貨幣便完成了“流通工具”之機能或為“流通工具”之形式。如商品之移轉，是在貨幣之轉移前，則賣買者之間變成了債權和債務的關係，則貨幣即為“支付性質”之機能或形式了。

如販賣者保存由販賣所得的貨幣，而延長其投入于買之新的生產關係中的時間，則貨幣又成為“財富”之形式或機能了。貨幣之每一社會機能或形式表現了交換的兩造之不同的生產關係的性質或形式。

在生產關係新形式出現時，即在資本家的商品所有者及工人的商品所有者發生連繫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出現時，他們間因而發生生產關係的貨幣，此時又有新的社會機能或“資本形式”。正確說來，直接連繫資本家及工人之貨幣，完成了“可變資本”的機能或具有此種形式。然資本家為要建立和工人的生產關係還必須生產工具，或且是間接以為建立資本家與工人間的生產關係的貨幣，則它具有“不變資本”之機能或形式了。因為我們觀察資本家階級及工人階級之間的生產關係，在于生產過程之中，則有“生產資本”或

“生產階段中的資本”表現于吾人之前。然在生產開始之前，資本家是以生產工具及勞動力的購買者的資格出現于市場的。此種資本家購買者及其他商品生產者的生產關係是和“貨幣資本”的機能或形式相適合的。在生產終結之時，資本家是個自己商品的所有者，而表現之“商品資本”的機能或形式之中。如此則資本形態之變化或曰變態，是表現了人與人間之生產關係之不同形式。

然工業資本家與社會之其他份子連繫之生產關係，尙不止此。第一，因資本間之競爭，資本之從此一部門移轉到本部門的其他工業資本家中去，而此連繫表現了“平均利潤率”之形成；而在商品出賣中，則按“生產價格”。此外，資本家在本階級中亦分爲幾個社會集團：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財政資本家。在形成資本家階級的各集團以外，同時並存的，還有地主階級。在這些不同的社會集團中的生產關係創造了新的社會經濟的“形式”出來：曰商業資本及商業利潤，曰貸金資本，曰利息地租[等皆是]。“他(資本)從自己所謂內部有機生活中進入了外部生活的關係中，進入了那不是勞動與資本相對立而是一方面資本與資本對立，他方面仍簡單是出賣者及購買者的個人相對立的關係中”(資本論第三卷，十八頁)。這裏即是說生產關係的形式有下列各種：
(1)資本家與工人之間；(2)資本家與社會上之以購買者及

出賣者資格出現的各份子之間的關係；(3)工業資本家各集團間，整個的工業資本家與其他資本家集團，如商業資本家，貨幣資本家之間的關係。(其中因而有了資本家及地主間之關係)生產關係之第一個形態，是資本主義社會之基礎，而為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所研究的。第二種形態，是第二卷研究的，而第三種形態，是第三卷研究的。至於商品社會之基本的生產關係——商品所有者的人的關係，則此項之分析，馬克思在政治經濟批評中，已加研究，而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中之“商品與貨幣”，即用為資本論之導言中，又重覆了一遍。(註五)馬克思的體系，是研究人之生產關係之各種複雜形式，他和各種複雜的經濟形式是互為適合的。

故政治經濟學之基本範疇是表現在物的形式下生產關係之各種形式。“價值者，人之生產行為之物的外表關係也。”(註六)資本者，“表現於物並經過物之社會關係也。”(註七)蓋因處現今商品社會之中，生產關係，舍物末由連繫，而物遂因之得以執行特殊的社會機能。如經濟範疇表現了人之生產關係，則吾人亦有此同等之權利而言曰：經

(註五)在馬克思起草時，本章題目是：“序言·商品，貨幣”

見 *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第三卷 P VIII

(註六)同書218。

(註七)同書325。

濟範疇亦表現物所執行之各種社會機能，此社會機能即各種生產關係之“介紹者”是已。由此觀之，價值，貨幣，資本，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固定資本，流通資本等，皆為各種之社會機能。“此地所論者，非及於那能以解釋物的定義（固定的資本及流通資本的定義——盧彬註）；而是論及一定的機能，而此機能，應表現之於一定的範疇之中”（資本論第二卷 P205）資本的特性并不是就這樣包含於物質之中的，而是物表現的一種機能，此機能之能否執行，是隨環境之不同而轉移的”（資本論第二卷 P.181）。

據上所見，政治經濟的範疇，是表現物之各種社會機能，而與人的各種生產關係相適應的。然由物所完成的社會機能，遂予物以特殊的社會性質，一定的社會形態，“形式之一定性”（Formbestimmtheit），此常為所常用者。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說到一般的“社會形式之分析”及其部分的“價值形式”及“貨幣形式”分析之困難處。貨幣之形成，是“形式的新的一定性”，（註八）貨幣之各種機能，隨之而存在有各種的“形式的一定性”。（註九）“資本是社會形式，用這個資本以作為在僱傭勞動基礎之上的再生產工具”，他（資本）是特殊的“社會一定性”。（註十）馬克思的體系，

（註八）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1901 P. 23

（註九）同書 46 P.

（註十）Theorien über der Mehrwert B. III. P. 383, 547

是研究許多和人類複雜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列的複雜的社會形式或“形式之一定性”(Formstimmtheiten)此形式或機能之帶有社會性質,並非物本身存在有此性質,而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發生作用,人賴此而發生彼此間的一定生產關係的物。此形式非從物之性質表現之,而是由社會環境之性質表現之。馬克思有時只簡單地使用“形式”或“形式之一定性”之名辭,然其常用者是如下列等等:“社會形式”,經濟形式,歷史社會形式,形式之社會一定性,歷史社會的一定性等。(註十一)有時馬克思所說,是有如下之意思:就是物有“社會存在性”“機能存在性”,“形式存在性”“理想存在性”,這些和“物質的”,“物的”“直接的”或“實際的,存在性相對立的。(註十二)在這個意思上說,社會形式或機能是和“物質內容”“物質實體”,“內容”,“實體”,“生產成份”,“物質及物的”成份及生產條件是相對立的。(註十三)凡此表現,它區別了物之技術的與社會的機能,工具的技

(註十一)見資本論第一卷P.116, 117, 119; 第三卷第二部P. 345, 399, 第三卷第二部351, 399, 360, 360, 366; Theorien III. P.484—5, 547, 563; Zur kritik, P. 20

(註十二)見第一卷P.98, 98, 資本論第三卷第二部P.359, 399及第三卷第一部 P.19 Theorien III P 183, 292, 314, 327, 340 434, kritik, P. 28, 94, 100, 101, 102。

術作用及勞動條件與社會形式間之區別，實質上只有一個根本的區別，此為上文所已分析了的。他說到了物質生產過程及其社會形式之間的根本區別，說到了同一的人類的勞動行為之技術的與社會的兩面。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的生產關係，亦即是生產過程之社會形式，它和物質技術“內容”或“實體”是有別的。自然，人的生產關係，是在生產力一定狀態的基礎之上發展的，經濟範疇是有其一定的技術條件。然後者在政治經濟學之中，不是當作從技術方面觀察的生產過程的條件，而是當作一定的社會經濟形式之前提。政治經濟學研究之對象，是此等人的生產關係的形態，及“經濟形式”，此形態是採用物的社會機能及社會形式。

(本節完，本篇未完)

(註十三)見資本論第一卷 P. 2, 94, 116, 117, 119; 第三卷
第二部 P. 354, 329; kritik P. 100—104, 121, Teorien III,
P. 315, 316, 318, 326, 424及其他。

普羅文化與普羅藝術

托洛斯基著 迅 雷 譯

每一個統治階級都須創造它自己的文化，因之也創造它自己的藝術。歷史上曾經有過東方和遠古的奴隸佔有文化，中世紀歐洲的封建文化以及現在支配着世界的資產階級文化。由此好像已足以這樣引申說，無產階級也應該創造自己的文化和藝術。

然而問題迥不像一眼看來那麼簡單。奴隸主所支配的社會，其存續曾歷數世紀之久。封建制度亦復如此。資產階級的文化假如只從它大張旗鼓的時期算起，亦即是從文藝復興時代算起，已存續了五世紀之久，但它直到十九世紀，或更精密點說，直到十九世紀的下半期才充分成熟。歷史告訴我們，環繞着統治階級形成一種新文化，需要很多的時間，且僅在該階級瀕于政治衰落的時代，才能達到圓熟的

境地。

無產階級能以很簡單的拿出充分的時間來創立普羅文化麼？與奴隸主的，封建地主的乃至資本家的統治制度迥不相同，無產階級乃是把它的階級專政看作一個短促的過渡時期。對於這種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我們若不願太過於樂觀估量時，那我們即須指出，蔓延全世界的社會革命，其延續期將非數月，而是數年或數十年——也只是數十年，但並不是數百年更不是數千年。無產階級能在這個期間創出一種新的文化麼？懷疑到這一層是很合理的，因為在社會革命的時期正是階級鬥爭最激烈的時期，比起新建設來，這兒破壞要佔更大的地位。無論如何，無產階級須傾其主要之精力以從事奪取政權，並且為着求存及進一步鬥爭的迫切需要，須保持，鞏固而且運用這個政權。唯其當着這個革命的時期，這時有計劃的文化建設的可能，被局限于窄狹的範圍以內，而無產階級這時亦正達於高度的緊張與其階級性之充分流露。反之：新的統治制度愈能充分免除政治軍事的意外，文化創造的條件愈能順利時，則無產階級愈能消融于社會主義的集體之中而脫除其階級本色，亦即是不復成其為無產階級了。換言之，在專政的時期談不上什麼新文化的形成，亦即是歷史上大規模的建設；但當鐵一般的專政需要失其意義時，這時所要開始的前無其倫的文化建設，卻已不復具

有階級性了。由此可以做出這樣一個一般的結論：無產階級文化不僅沒有，抑且不會有；平心而論，對於這一點實沒有惋惜的理由：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正為的是要永遠消滅階級的文化，并為人類文化開闢一條道路。我們對於這點似乎常沒有在意。

以資產階級文化來類推無產階級文化，這種不倫不類的論調，是由于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命運毫無批判的看成一例。這種淺薄而任意的，歷史形式對比的方法，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通之點。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歷史進行的軌道，固迥不相侔。

資產階級文化的發展，在資產階級經過幾次的革命，取得國家政權之前的幾世紀便已開始了。當資產階級還是第三閱一切權利半被剝奪的時期，他在文化建設的各方面，便已曾發生過很大的而且與日俱增的作用。在建築上尤其顯然。歌特式的(Gothic)教堂，不是在宗教靈感的衝動之下忽然建築起來的。克玲禮拜堂的構造，它的建築與彫刻，彙集人類穴居時代以來的經驗，并將這種經驗元素併合在一種新的形式中，以體現當代的文化，終之亦即是體現當代的社會結構和技術。舊時基爾特式的行會式的資產階級前身，實是歌特式建築的真正創意者。當資級階級地位漸臻鞏固時，亦即是當它更形富有時，它于是乃自動的沿着歌特式而創

出他們特有的建築形式——這已不是爲着教堂而是爲着建造自己宮殿的需要了。他們依據着哥特式的建築經驗，回溯之于往古，(主要的是羅馬的建築)，并利用摩爾 (Moor) 民族的建築形式，把這一切攬總起來以適應新都市建築的條件和需要，這樣也便形成了文藝復興(十五世紀末的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那些元素是取之于往古，那些元素是取之於歌特人(Goth)，以及二者的去取孰輕孰重，專家很可以將它計算出來。總之，文藝復興實始於這樣一個時期：那時在文化上已經飽和的新興社會階級，自覺已足以從歌特式拱廊底束縛之下解放出來，把哥特式的藝術以及前此的一切，都一例看作材料，而隨心去取那過去的技術成分以自創其建築藝術。其他一切藝術其情形亦復相類，所不同的，只是因爲那些“自由的”藝術更富於可塑性，即它們依據實利目的和材料的程度，比較更淺，故特能顯露其風格之取得與蛻變的辯證性，而不像建築藝術那麼呆板。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其目的在於替資產階級在封建社會中造成一種心理與政治環境的更順利條件，從那時起，直到政權轉入資產階級手中的革命時期(在法蘭西)止，其間經過三四世紀，資產階級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有長足的發展。法國大革命與因之而生的戰爭，使文化之物質水平趨低降。但自此以後，資本主義的統治制度卻竟被認爲

“自然”而且“永久”的東西了。

因此，資產階級文化壘成的基本歷程及其風格之凝固，乃係由資產階級（它是佔有的剝削的階級）之社會特性所決定：資產階級在封建社會中不僅物質上是在向前發展，用各種方法與後者相纏涉，把財富攫入自己手中；並且遠在它還是第三閱沒有公然取得政權以前，便已將知識階級吸收到自己方面來以形成它的文化基礎（學校，大學，研究院，新聞紙，雜誌）。我們總該記得，德國資產階級在技術，哲學，科學和藝術上都非常超越，遲至1918年政權還留在封建官僚的掌中，僅到德國文化的物質成份將毀成碎片時，才決定，或者更正確點說，才被迫而直接握取政權。

但有人也許可以這怎說：奴隸佔有時代的藝術，幾千年才完成，資產階級的藝術，幾百年便完成，那末，為什麼無資產階級文化不能於幾十年之內完成呢？現時生活的技術基礎已經不同了，因此速度亦自不同。這種異議表面上似乎足以服人，實則事實上是沒有看清問題的實質。固然，在新社會的發展中，必有這樣一個時機的來臨，那時在經濟方面，在文化建設方面，在藝術方面都可得到運行前進的高度自由。至於它的速度這時我們只能憧憬着罷了。在擺脫了每天為麵包而煎迫的社會中，這兒的公共食堂要預備優美滋養而適口的食品，任人選擇；這兒的公共洗衣廠，要洗淨每

人的優良襯衫；這兒的兒童，一切的兒童要養育得很好，快樂而且健強，並且可以在其中吸收科學與藝術元素，像吸收蛋白質，空氣和太陽的熱力一樣；這兒的電氣和無線電要不像現在一樣；成爲奇技淫巧，卻須隨着規置齊全的電紐的支使成爲動力集中供給的不竭源泉；這兒要沒有“吃閒飯的人”；這兒被解放了的人的自我精神，適成爲無上之力！——要用之于全宇宙的瞭解，改變與改善上——在這樣一種社會中，文化發展的動力，將成爲空前無比，但這只有經過一個長期而艱苦的涉渡才能進入這個時期，而這種涉渡還在我們前面。我們現在所說的正是這個涉渡時期的問題。

難道我們的現時乃是非動態的嗎？不，實係在大動態之中。不過動力是集中在政治上。大戰與革命都是動的，——但這些都很足以破壞技術與文化。固然，大戰曾產出許多技術的發明。但由它所產生的貧窮，使這些足以徹底改變社會生活的發明，會長期延擱而一時不能見諸實用。無線電，航空術以及其他技術的發明都是如此。革命的本身是要替新社會準備下前提。但它是用舊社會的方法，如階級鬥爭，暴力，破壞與毀滅這些方法來進行準備的。假使不發生無產階級革命，則人類也許要窒息於自身矛盾之中。革命拯救了社會與文化，但卻用的是殘酷的外科手術。一切的精銳力量都集中在政治上和革命鬥爭上，——其餘一切都退至不重要

地位，那一切足以防礙革命鬥爭的東西都被無情的踏在腳下去了。自然，在這個過程中有其局部的漲潮與落潮：軍事共產主義讓渡於新經濟政策，而新經濟政策本身又經過不同的階段。然根本上無產階級專政還不是新社會“生產文化”的組織而是爭取這種組織的革命戰鬥的陣列(Ordre)。忽視了這點是要不得的。我們想，未來的歷史家定要把舊社會的頂點位之於1914年八月二日，彼時資產階級文化的瘋狂勢力，將帝國主義大戰的血與火塗污了全世界。人類新歷史的開端，卻應從1917年十一月七日算起。我們想，人類進化的基本階段，大致可以劃分如下：原人的前史時期；以奴隸制度為骨幹的古代史；基於農奴制的中世紀史；榨取自由勞動的資本主義社會，與夫最後的共產主義社會及其無痛苦的，讓我們這樣希望，向無國家的社會的過渡。無論如何，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所占的二十，三十或五十年，在歷史上看來恰只是由一種制度到另一制度的艱難渡涉期，但絕不能把它特劃為無產階級文化的獨立時代。

現在，在這幾年喘息期中，關於這一層，在我們蘇聯很可以發生一些幻想。我們已將文化建設問題放在議事日程之上了。若把我們現日的懸想，心理的伸張至遼遠的將來，那或有無產階級文化之可言。但實際上，我們的文化建設雖然重要而且異常必需，卻不能不全為歐洲和世界革命的信

號所支配。我們依然還是戰陣中的健兒。休息時我們要將襯衣洗淨，我們要梳剃頭髮，最要緊的還得把來福槍擦淨上油。現時我們一切的經濟文化工作，只不過是在兩個戰爭間略事調整我們的隊伍而已。主要的戰事還在前面——也許不怎麼遠。我們的現時代還不是新文化時代，只不過是走向這一時代的入口而已。第一我們要將舊文化的重要元素歸諸國家占有，俾至少能為新文化填補出一條道路。

假若將這一任務就國際範圍來加以考察，則問題將愈為顯明。無產階級過去和現在只是一無所有的階級。即此已將它局限于狹隘範圍之內，使其不能吸收資產階級文化那些可以永列於人類財產簿上的元素。固然，就某種意義講來，無產階級，至少是歐洲的無產階級曾經有過它的改良時代，特別是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期，這時它不敢輕於一試去奪取政權，乃暫謀在資本主義統治之下，爭得適於其發展的更有利的合法環境。但是，第一，在那與第二國際時代大體相合的“改良”時代（議會政策與社會改良），歷史所給予無產階級的時間只幾十年而給予資產階級的卻是幾世紀。第二，無產階級在這個準備時期並沒有變成一個更形富有的階級，並沒有能把物質的力量集中於自己的手中——反之，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來看，它卻變到更不幸的地位去了。資產階級是在當代文化全副武裝之下取得了政權；無產階級在它從事

奪取政權的時候，只是在一種獲得文化的迫切需要之下而已。既得政權後，無產階級的主要職任，在於將那些過去與之無緣的文化機關——工業，學校，印刷廠，出版機關，劇場等攬入自己手中，經過這一着，替自己開闢一條到文化之路。

在我們俄國，因一切文化傳統之貧弱，以及近十年事件所造成的物質毀滅，使這一任務愈加沉重。在取得政權以後，經過幾近六年的鬥爭，以求使這政權繼續存在而且趨固，俄國的無產階級不得不竭其全力去造成物質生存最原始的條件并去和文化的初步相接觸——而此處所說的初步，實即就字面的真實意義而言。我們決定要在蘇聯成立十週紀念之時，使全俄人民都能識字，這決不是無所為的。

也許會有人反對，我把無產階級文化看得太寬泛了。并以為，充分成熟的無產階級文化固不會有，然工人階級在它未消融于共產社會之中以前，固可以在文化上加蓋它自己的印記。實際上這種反對的論調，首先我們可以看出，實是從普羅文化陣地的一個嚴重退卻。在專政時期，無產階級要在文化上加蓋上它自己的印記，這是不成問題的。假使我們對於普羅文化的了解，是把它視為在物質創造精神創造的各方面，其智能發達而且和諧的全系統，那麼，那種蓋上自己印記的文化，與普羅文化相距不知有多麼遠。只有一件事可以算是極重要的新文化的事實，即便是成千百萬的人學

會了寫，讀，算的藝術。新的文化，就其本身性質而言，不應該是貴族的，爲着少數特權者的，而應是羣衆的，普遍而且通行的。這兒可以由量轉變到質：隨着文化羣衆化的發展，將可以提高文化的水平並且可以使其整個的改頭換面。但這種歷程須經過幾許歷史階段才能以發展起來。在它成功的程度上，無產階級的階級聯繫將隨之日益減弱，而終之亦減弱普羅文化的立場。

但階級的上層份子是什麼樣的呢？它的智識的前鋒是什麼樣的呢？就在這很狹小的範圍以內，是否可以說現時已經完成普羅文化的發展呢？難道我們沒有共產主義學院嗎？難道我們沒有紅色教授學院嗎？有些人很容易上這種極抽象的設問方式的當。他們似乎以爲可以用實驗室的方法去創造一種文化。實則文化的基本織物，是由一階級及其本階級知識分子之間的交互影響交互動作而織成。資產階級的文化——技術的，政治的，藝術的——是由資產階級與其發明家，領袖，思想家和詩人交互影響而造成的。讀者創造作家，作家創造讀者。這對於無產階級更是如此，因爲它的經濟，政治與文化，只有在羣衆自動創造的基礎上才能以形成。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最近幾年中的基本任務，不是向壁虛構其沒有基礎的新文化，而是最具體的文化建設，亦即將那些已有的最必需的文化元素，有系統的，有計劃的，且自然

是帶批評性的向落後的羣衆貫輸。在一階級的背後，創造一種階級的文化是不可能的。如果要隨着階級，並且密切的隨着它的歷史的總興起而建設文化——那必須……粗枝大葉的去建設社會主義。在這歷程中，社會之階級特性將非日增而是日減，且隨革命之成功而漸歸於烏有。無產階級專政之解放意義，乃在於它是一種暫時的——短時期的——工具，用之以清除道路并爲非階級的社會及建在萬衆一體上的文化打一基礎。

爲得將工人運動發展中之“文化建設時代”這一概念加以具體的詮釋，讓我們不從階級而從世代去看歷史的繼承。它們的承襲性表現於此：每一世代——在社會發展而不是衰落的情形之下——總是將它的寶藏加入於過去文化的積蓄中。但在未能如此實行以前，每一新世代都要經過一個學習期。它要吸收已存文化，按己意加以改變，使之多少與前代不同。這種吸收不即是創造，不即是新文化價值之形成，而只是一種前提而已。就某種程度講來，以上所說的也可以適用到起來作歷史創造的勞動階級的命運上。所要補充的只是，在無產階級脫離了文化學習期以前，他已不復成其爲無產階級了。讓我再複說一次，第三閩的資產階級上層曾在封建社會的屋脊下經過它的學習期；當它還在封建社會的胎中，它在文化方面便已超過了舊的統治階級，並且在取得

政權以前，就已變成文化的推動者了。就一般無產階級而論，或特別就俄國無產階級而論，則適得其反。它在未能吸收資產階級文化主要成分以前，便已不能不起而握取政權；它之所以不能不用革命暴力將資本主義社會推翻，便是因為這種社會不許它與文化接觸的原故。勞動階級要努力將國家機關變成強有力的抽水機以解除民衆文化的饑渴。這是一件有無限歷史意義的工作。假使我們不願輕率的舞文弄墨，那麼，這還不能即稱之為無產階級特殊文化的形成。“普羅文化”，“普羅藝術”等等的名詞，十回有三四回是用來含糊地表示將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文化和藝術，十回有兩回是用來表示無產階級中某些集團正從事吸取無產階級前期文化底某些元素這一事實，而十回中倒有五回則係代表一叢概念與字眼，你休想從中找着什麼頭緒。

我們且從許多例證中挑出一個顯然拖泥帶水的，含糊的，且很帶危險性的濫用“普羅文化”這一名詞的最近例證。隋佐夫(Sizov)說：‘經濟基礎及與之適應的上層建築體系…形成每一時代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的)文化特性’，因此，無產階級文化時代在這兒是和資產階級文化時代併列在一起了。然而此地所指的無產階級時代只是由一種社會文化體系到另一體系——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短期過渡罷了。在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以前，同樣曾經過一

個過渡時期，資產階級革命在求階級統治之綿續（而其企求也成功了），無產階級革命則與之相反，其目的在於消除無產階級之階級存在，且盡可能的求於短期中實現這一點。這一期限之長短，則直接視革命成功的期限如何而定。居然把這一點忘了，而將無產階級文化時代與封建時代資本主義時代并舉，這豈不是咄咄怪事！

如此，那麼我們就不能有無產階級的科學了嗎？我們就不能說唯物史觀和馬克斯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無產階級無價的科學元素嗎？

自然，唯物觀史和勞動價值說無論是就無產階級的階級武器來看，或是就一般的科學來看，都有莫大之意義。單拿“共產黨宣言”來說，就比那經過許多教授專門編纂，考證，校刊過的歷史叢書和歷史哲學叢書，更富於科學的價值。但我們是否可以說，馬克思主義乃是無產階級文化的產物呢？是否可以說，我們已真能運用馬克思主義不僅為政治鬥爭之用，而且為廣泛科學之用呢？

馬克思和昂格斯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中，自然是在資產階級文化上而不是在無產階級文化上長育起來的，假使沒有工人階級及其罷工，鬥爭，痛苦與暴動，自然便不會有科學的共產主義，因為乾脆就不會有這種歷史的需要。這種學說雖曾向資產階級文化宣告作最後的決死戰，

但它終是在這種文化(科學的政治的)基礎上建成的。爲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所浸潤，成爲它的最勇敢最誠實而且最有見地的代表者，在資本主義矛盾打擊之下，卒躍達總的自我否定的地位，用一切批評的武器及資產階級科學的準備步驟將自己武裝起來。這便是馬克斯主義的歷史起源。

無產階級并不能立即地，直到現在也還不能完全的從馬克斯主義中取得它的武器。而這種武器，主要的且幾於是絕對的，只能用之於政治鬥爭。辯證唯物論之普遍的實際的運用及方法論的發揮，還全在於將來。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馬克斯主義才能由政治鬥爭的片面工具一變而爲科學創造的方法，精神文化的重要元素和工具。

一切科學在某種程度講來，它會反映統治階級的趨勢，——這是不成問題的。愈是與征服自然有密切關連的科學(物理，化學，一般的自然科學)，它愈爲非階級的全人類的寶藏。愈是與社會剝削機體有極深關係的科學(政治經濟學)，或愈是抽象概括全人類經驗的科學(心理學，非就其實驗生理的意義而言，係就其哲學意義而言)，則它愈須聽命於資產階級之階級私利，而它對於人類知識的總和亦愈無何種意義。在實驗科學方面視其普遍化的開展程度如何，而具有不同程度之科學的純真性與客觀性。照例，在方法論的哲學和宇宙觀這些絕高的學術領域中，資產階級的趨勢總

喜歡更自由的找到這些地方馳騁。因此必須自下而上的來清理科學的結構，或更正確些說，自上而下的來清理它，因為這種工作的開始，必須從上層起。但如果以為無產階級在運用科學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以前，便要批評的重建一切從資產階級傳來的科學，那就未免太愁了。這幾等於和烏托邦的道德家一起說：在未曾建造新社會以前，無產階級應該先昇達共產主義道德的高峯。實則無產階級固應激烈的改造倫理，也應改造科學，但這只是建造新社會（縱然是粗枝大葉的）以後的事。這我們不是走入了魔道嗎？怎麼可以借助於舊科學和舊道德來建造一個新社會？這兒我們卻需引用一點辯證法，即是我們現在在抒情詩中，在公務中，在白菜湯和粥中，無處不胡亂應用的辯證法。將無產階級意識從資產階級心理束縛之下解放出來，需要某一些依據，和某一些科學方法，無產階級前鋒在開始工作時便須找到這些的根據和方法；它在學習這些，並且一部分已經學到家了。它已將它的基本方法，在歷次戰鬥中在各種情況下試驗過了。但這還和無產階級科學離得很遠。儘管黨還沒有決定是否接受電子和伊洪的假設，佛勞特（Freud）的分析心理學和相對論的數學新發現等，但革命階級依然要不停的向前鬥爭。固然，在取得政權以後，無產階級得到了更大的可能去學會科學並且去審查科學。但做起來決沒有口說那麼快。無產階級

絕不能等它的新科學家們（他們之中有許多人都穿着短褲在街上跑呢）把一切知識的工具和道路，清理審查好了才來從事社會主義的建設。它對於那現有的科學方法和結論，一面要排除其顯然不需的，荒謬的和反動的成分，一面要馬上用之於建設工作的各方面去，有時這中間甚至難免挾入了一些反動階級的摻雜物。這，實際的結果會從頭到尾的來校正它，因為在社會主義目標統馭之下，既得的實際結果，自會將一種理論的方法和結論逐漸加以統馭和檢討。這時自可以在一種新環境之下養成一些科學家。無論如何，在未能自上而下的將科學加以總清理之前，無產階級定要盡可能的提高社會主義的建設。亦即是盡可能的滿足一般社會之物質的文化的需要。這在我全不是說，我要去反對那些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工作，而這種批評檢討工作，在各方面正用着研究班或專科的方式在那兒進行。像這類的工作本是必需的，有效果的，應該用各種方法使之擴大而且加深。但我們却又需保持馬克思主義者衡量事物的眼光，認清現時此種經驗與努力，在我們整個歷史工作中應該佔多少分量。

以上的話，是不是說在革命專政時期，從無產階級行伍中，全沒有產生科學家，發明家，戲劇家和詩人的可能呢？并不是全無這種可能。但若果隨便指某個工人出身者的某種有價值的創獲，說這就是“普羅文化”，那便太過於輕率了。

文化這一概念，不能像零用錢一樣可以隨便替每人分發，而且，也決不能單憑某個發明家或詩人之一紙無產階級護照，以決定一個階級文化之成功。文化是知能的有機總和，它表現全社會或至少是它的統治階級的特性。它遍賅而且滲透人類創造的各方面，並把它聯成一體。個人的創獲超越這個水平，同時便漸漸可以使這個水平提高。

現時我們的普羅詩歌與整個勞動階級文化創造之間，是否有此種有機的相互關係存在呢？很顯然的，並沒有這種相互關係的存在。無產階級某些分子或團體，正開始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創造的藝術相接觸，且一直在十分折衷地去運用它的技術。難道這為着要表現他們內在的無產階級的世界嗎？事實上遠不是如此。無產階級詩人的創作尚缺少一種有機性，而這種有機性須使技術與整個文化的現狀及其發展發生極密切之交互聯繫才能產生。我們有高明的天才的無產者的文學創作，但這並不就是普羅文學。不過，這也許可以算是它的支源之一吧？

自然，在現今世代的工作中，已顯露着許多的胚種，根莖和支源，後輩們有人將可以循着這些線索以追溯將來各種文化的前踪，正如我們現時的藝術史家將易卜生劇場追溯到教堂的神祕，將印象主義與立體派追溯到僧侶的繪畫一樣。在藝術組織中也像在自然體系中一樣，亦是一切不會

消滅，一切互相連屬的。實際具體而且重要的是：從無產階級出身的詩人，它們現時的創作，迥還不是循着準備未來共產文化條件的歷程——亦即是提高羣衆文化水平的歷程而向前發展的。

杜保夫斯基 (Dubovsky) 很懊喪，因為它有一篇文章激起了普羅詩人團體的反對，在這篇文章中——據我看，除了一些可疑的思想而外——固自表出一些真理，雖不免有些悲苦意味，但大體是無可訾議的。杜保夫斯基的結論是這樣：普羅詩歌不能求之於“庫司尼查”(Kuznitsa 原意係冶鐵廠) 社中而須求之於無名作家投稿的工廠壁報中。在這個結論中固亦含有正確之思想，雖立論似近乖僻。同樣亦許可以這樣說，無產階級的莎士比亞們和哥德們，現在還正在光着腳到處亂跑并且都還在初級小學中上學哩。無疑的，工廠詩人的作品，就其對工人階級的生活，環境與興趣而言，它是比較更富於有機性。但這也還不是普羅文學而只是一種文字上的鴻爪用以表明無產階級文化增高之微小歷程而已。我們在上面已經解釋過，這二者不能混為一談。工人通信員，地方詩人和宣示人 (Revealer)，他們都是在執行着偉大的文化工作，在鋤開地面，將它準備好，以為將來播種之用。而文化與藝術的豐收將是——應該很愉快的說！——社會主義的而不是“無產階級的”了。

普列特涅夫 (Pletnev) 在“論普羅詩歌之道路”一篇有趣的文章中曾提出這種意見：普羅詩人作品，撇開它的技術價值而論，它大體已和階級生活發生直接之關係。普列特涅夫舉出許多普羅詩歌作品為例，以充分證明勞動詩人的心情，是在隨着整個無產階級之生活與鬥爭的進程而變遷。他並且特別指出，普羅詩歌作品——雖不是整個的但却是多數的——乃是文化歷史的重要文件，這一點也是毫無疑義的。但這並不是說，那些作品乃是藝術的文件。普列特涅夫在表揚一個從祈禱心情升到交緩革命心情的勞動詩人時，他說：“假如你高興，你儘管說這些詩歌是微弱的，舊式的，不通的，但它難道沒有指出普羅詩人生長的道路嗎？”無疑的：微弱的，平淡的，甚至是不通的詩可以指出詩人與階級之政治生長的道路，且可以有無限文化表徵的意義。然微弱的，尤其是不通的詩歌并不能形成其為普羅詩歌，一般講來，且并不能形成其為詩歌。普列特涅夫循着無產階級之革命的生長以追溯勞動詩人的政治演進時，他很確切的指出，在最近幾年中，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開始以後，許多普羅作家有脫離階級的事實發生，這是極可注意的現象。普列特涅夫以黨對於詩人的忽略來解釋這種“普羅詩歌的危機”以及那同時發生的形式主義與俚俗主義的趨向。因此以至說，詩人“經不起資產階級思想的壓迫而潰退下來了，或者還正在

潰退”。這個解釋顯然太不充分。那一種資產階級的思想壓迫還存留在我們中間呢？何必這麼過甚其詞。黨過去對於普羅詩歌是否能給予以更大的援助或不可能，這個問題且不置論，但只是這一層，亦迥不足以概括那種詩歌本身缺乏抵抗力的全部問題，正尤之單用“階級的”深刻暗示（這是“庫司尼查社”宣言的調子）絕無補於它的內力不足一樣。事實上是，在革命的前期或初期，普羅詩人不把詩藝視為有其特殊規律的藝術，而是把它視為一種鳴訴不平及表現其革命心情的工具。只是到了近幾年，內戰的緊張已經弛緩之後，普羅詩人才逐漸注意詩歌的藝術與技巧。於是又發生這樣一種情形：無產階級的在藝術範圍以內，還沒有造成一種文化的背景，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無論好壞，這種背景總是有的。問題並不在於黨或其上層“有沒有充分加以幫助”，問題却在於下層的藝術修養太不夠：藝術也和科學一樣，需要素養。蘇聯無產階級有其政治文化，——其程度足以保持專政之存在——至於藝術文化呢，却還沒有。當普羅詩人還雜在軍陣之中時，他們的詩歌則固如上所述，含有革命文件的意義。但在詩人之前發生藝術與技巧問題時，他便自然會不由自主的要開始替自己找出一種新背景。所以這兒並不是簡單忽略的問題，而是由於更深刻的歷史環境的關係。然這並不能說，陷入危機中的普羅詩人，會永絕於無產階

級。我們希望，至少總還有人能從這個危機中振拔出來。這又不是說，現時勞動詩人之分化，便足以替偉大的新詩歌築下一個堅固不拔的基礎。不是這麼一回事。就一切表徵講來，這是屬於下一世代的事，要進入這一世代必然要經過一些危機，因為在這樣一個長時期中，緣於階級文化之未能充分成熟，必然有文化思想的團體，會走向不正確的，迷惑的，錯誤的道路上去。

僅就文學技術之研究而言，便已是必需的且非短時間所能成就的步驟。很顯然的，只有技術很嫻熟的人，他才能夠運用技術。我充分可以說，有許多年輕的普羅作家，不是他們支配着技術，却是他們為技術所支配。這對於天才作家。只能算是發育時期的小病。然對於那些不善運用技術的作家却會使其成為“不自然的”模仿家馴至成為小丑了。由此而做出這樣的結論，說工人不需要資產階級的藝術，這便太奇怪了。但有許多人竟陷於此種錯誤。他們說：“給我們些什麼，縱使是百孔千瘡的都好，只要是我們自己的。”這直是一種虛偽的誕語。百孔千瘡的技術并不能算技術，且也不是勞動階級所需要的。以“百孔千瘡”為滿足的人，他們根本上便是蔑視羣衆，也像高明的政客一樣，雖然根本不能信任階級的力量，然當“一切順利”時，却要趨炎附勢的去頌揚它。許多頭腦簡單的呆人，受了這種愚弄的結果，每喜重複背誦

着這個假冒無產階級招牌的簡單公式。這絕不是馬克思主義，這只是反動的民粹主義，在“無產階級”思想意識之下，不過稍為改換了一點頭面而已。“普羅藝術”絕不是次劣的藝術。我們必得學習，雖然“教科書”——於必要時須借用敵人的——中含有其本身的危險性在。我們必得學習——且特殊講來，普羅文化組織之重要，不能就其創造新文化的速度來衡量，而須就其幫同提高階級（自上層始）文學水平的限度來衡量。

像“普羅文學”，“普羅文化”這類的名詞通很危險，因為他們誤把文化的前途，拘限於現日之狹隘範圍中，他們違反透視法，破壞比例，滅絕標準而且培植黨派的傲慢——這一點尤其危險。

但假使我們否認了“普羅文化”這個名詞，那我們對於……普羅文化組織將持取什麼態度呢？我們以為普羅文化組織，其作用乃在於從事普羅文化的建設，亦即是堅決作提高工人階級文化水平的運動。實則此種解釋固絲毫不減普羅文化組織之意義。

這篇文章是從托氏“文學與革命”一書之第六章譯出的。後面本還有三小段，係附帶批評蘇聯文藝界的某幾種趨向的，以其較為次要，茲暫從略。

近幾年來——尤其是近一年來，“普羅文藝”問題，在中國文壇上嚷得十分熱鬧。但不幸得很，我們所見到的那些搖旗吶喊得最起勁的先生們，大都對於問題本身沒有什麼真知灼見，只是抓住了一些“捕風捉影”的口頭禪在那裏自欺欺人。

他們把“普羅文藝”的商標，像“出賣傷風”的紙條一樣，隨便向任何一個垃圾箱上亂貼。最有趣的是：昨天還審查過某人的作品，認為它夠不上資格貼普羅的商標；今天一覺睡起來却儘可發現自己的錯，趕忙向人家“賠罪服輸”，“自承胡鬧”。天曉得！這個年頭兒究竟是鬧的些什麼把戲。

他們的文藝理論，有的是東鄰的來源，而東鄰的左翼文壇，其本身也便充滿着烏煙瘴氣。從這種烏煙瘴氣中我們可以檢析出兩種主要的組成成份；其一，是布哈林的機械論，其二，便是盧那恰爾斯基的二元論。在這兩種成份的基礎上所建立起來的藝術觀，與真正辯證唯物論者的藝術觀，自然毫無共通之點。我們為要校正這些不正確觀點在中國革命文壇上的散佈，特先把托氏這篇文章重譯發表出來，以後我們還要陸續對於這個問題有所論列。

1930, 5, 24, 譯畢附記。

本 社 出 版 文 學 研 究 要 籍

中國文學論叢

鈴木虎雄著 汪馥泉譯

本書是中國文學研究專家鈴木虎雄的近著的選譯，是有系統的選譯，先是論騷賦，其次論五言詩及絕句，再次論詞，未附青木正兒氏論詞的一文。凡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是不可不一讀的。

現代南歐文學概觀

實價四角

徐霞村著

南歐文學在現代的世界文壇上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惜乎因為太專門的緣故，國內無人介紹。本書為徐霞村先生數年來心血之所聚，共含「現代意大利文學」「現代西班牙文學」「現代希臘文學」「現代葡萄牙文學」「古魯兌司格派與皮薩得婁」「阿左林」諸篇，為研究文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辛 克 萊 評 傳

辛克萊是現在的美國的最傑出的作家，他的生平的文藝戰績，不特在大陸劃一新時代，即在全世界也佔極重要的地位。對於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猛烈的攻擊，竭力替被壓迫階級說話。這種反抗精神是為全世界任何著名作家所不及的。他的作品，最近已有了許多漢譯，他的生平也有人零星介紹過，但關於他的整個研究，卻還未曾有過。本書是孫先生根據戴爾氏的辛克萊評傳，再參考好幾種書籍編譯而成，是國內第一本研究辛氏的專著。讀者諸君，應以先睹為快。

八國文學漫談
孫珍席著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

趙景深著

實價七角

藝術斷片談

馬克思著 劍青譯

這個“斷片談”是由馬克思兩篇小東西集合而成的。第一篇是馬氏與人因論哥德而作的。第二篇乃是馬氏“政治經濟學批評”導言中之一段，但這篇導言，在“政治經濟學批評”付印時，却被馬氏抽出去了。一直到馬氏死後，才被考茨基發現此文手稿發表於“新時代”。

雖然這是兩個“斷片”，但其中却包含有關於藝術理論的基本原則，及馬克思主義對於藝術及藝術家的態度。譬如第二篇起首幾句就顯然與現在市場上高叫“藝術藝術”的那些“小市民”的“機械論”的論調完全異致，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此等意見尤其出之於創造馬克思主義的本人，這是特別值得令人吟味的。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最富有精彩的文件，人們可以從這“斷片”中去學得馬克思主義對於辯證法在藝術問題上之運用。故我們特介紹於此。

在哥德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對於當時德國社會的兩重關係。有時他對社會是取敵對的形式。社會厭惡詩人，詩人也急於想擺脫社會——此種情形，在“愛非金”及其在意大利旅行的整個期間，都可以看到。在“瞿茨”，“普羅美沙”和“浮士德”中，他就興奮的起來反對德國社會；在“默菲斯士菲”的個性當中，他又表示着對德國社會的有力諷刺。有時他也取好于當時社會，同社會調協——這我們可以在“Zahme Xenien”及許多散文作品中看到。在“Mashenzige”中他更讚揚德國社會；在他所有的文字中，一談到法國革命哥德就歌頌起當時的德國社會，想排擠出歷史運動對於當時德國的壓迫。這裏並不是說，他承認德國生活中的某幾方面，否認其別幾方面。我們最易看到的是：哥德常陷于種種不同的情緒之中：在他的“內心”裏，經常的發生着永續的鬥爭，其來源是由于：一方面他是天才的詩人，四圍的貧困激起了他的憤怒，另一方面他又是佛蘭克府貴族的公子哥兒，再方面他又是維馬爾的樞密顧問。使他不得不同此貧困妥協，并與之苟安一時。哥德之所以一方面那樣偉大，另一方面又那樣氣量狹小，一方面對社會不顧情面的譏笑，另一方面又是個恭順，苟安，短見的俗子，其原因即基于此。哥德沒有力量戰勝德國的貧困，反之，德國的貧困却戰勝了哥德，貧困對於德國偉大人物的戰勝，這便是一個最好例證，說明德

國貧困不能由德國的“內部”戰勝。哥德的過分的博學，積極和勇敢，使他在康德的理想的映照之下，追尋貧困的趨避所。哥德的過分聰敏使他看不透：此種追求結果不過是以更誇大的不幸代替現代平淡的貧困。他的稟性，他的力量，他的一切精神趨向，使他接觸實際生活，而他所遭遇到的實際生活却是慘然悲悽。在這矛盾的雙頭之下——現存的生活領域使他不能不厭惡，同時他又得同此生活聯結，因為這是他唯一的可以活動的場所——在這樣的矛盾的雙頭之下完結了哥德的生平。偉大的詩人愈近衰老，他就愈發潛居于小的維馬爾官爵之下。我們並不責難哥德，說他不是自由主義者，我們只能夠說：時代只許他作個俗子。哥德的罪過并不在於他沒有愛自由的熱情，而是在於將一切對真實的偉大的歷史運動所引起的恐怖，變為他伸展健全的美的情感的犧牲。他的罪過是在於：當拿破崙已在洗滌德國Augias註一的馬廄時，他還僅視為不足道的小節，視為德國皇宮之一件最小的消遣。一般講來，如果我們要責難哥德的話，那末就不是以道

注一 Augias 為 d'elide 的皇帝，有一圈廄，養牛 3000 隻，此圈廄經過三十年之久不曾刷洗，後有名 Hercule 者始導入 Alphee 河，將廄洗淨。

演此故事，後拿破崙言破壞舊日封建制度者皆用洗滌 Augias 馬廄一語。

德的或黨派的觀點，而最主要的是以美學與歷史的觀點。我們不能以道德的，政治的與“人類的尺度”，來度量哥德。

× × × × × × ×

關於藝術問題，很顯然的，藝術之一定的黃金時代，絕不與社會之一般發展相應，因之也不與構成其骨骼之社會物質基礎之發展相適應的。例如，拿希臘人[的藝術]和近代人或莎士比亞[的藝術]相較[便可以瞭然]。至於講藝術的某幾種形式，例如史詩，也是誰都承認的：當他已形成一個歷史時期，變為古典形式時，已經就不能再存在了。只有在藝術的創造（此字本意）剛開始時，才有此種形式。所以在藝術領域內，形式之可以形成偉大意義者，只有在藝術的發展還比較低級時才有可能。如果說在藝術自身範圍之內，在其各種不同形態的關係上，一般的情形是如此，那末，設如我們拿藝術整個的對於一般的社會發展的關係來看，此種情形更是顛撲不破的了。困難的只是在于探尋這些矛盾的一般的表現。只要拿任何一個例證來看，即可完全解釋清楚。例如，拿希臘藝術及莎士比亞對現代的關係來看。顯然的，希臘的神話不僅是構成希臘藝術的有力武庫，並且是希臘藝術的立足點。難道作為希臘冥想與希臘藝術之基礎的該種對於自然與社會的觀點，在電絲羅網（鐵路，機關，電報）密佈的今日。

還可以存在嗎？難道烏爾堪 (Vulcain) 註二 與羅伯特公司 (Roberts & Co.) 還可以同時共存嗎？難道禹辟特 (Jupiter) 註三 與避雷針，海美斯 (Hermes) 註四 與押貸公司 Crédit mobilier 還可以同時共存嗎？每一種神話都是在想像中并借助于想像以戰勝，征服并創造自然力，且因對自然力之實際統治而使神話消滅在 Printinghousesquare (倫敦泰晤士報印刷所) 存在的時候，浮姆 (Fome) 將要變成什麼呢！希臘的藝術構成希臘的神話，亦即是在民族幻想中所獲得的不自覺的藝術創造的自然與社會形態。這是他們的材料。然並不是每種神話，每種非自覺的藝術的自然創造都是如此。埃及的神話永不能變為希臘神話的立場與母胎。然而無論如何他們都是神話。所以，社會的發展如已脫離了一切對自然的神話關係，擯絕了一切神化了的自然，使藝術家也與冥想的神話絕緣，那末希臘的藝術的立場無論如何是不會創立起來的。

在另一方面看來，當火藥與鎧甲存在的時期是否還可以

註二 Vulcain, 為神話中之火神與五金神名。

註三 Jupiter 又名 Zeus 希臘羅馬神話中的諸神之父。

註四 Hermes, 為 Jupiter 之子，為商業星，演說星，飛星。

註五 Achilles, 荷馬 (Homers) 史詩中的一英雄，跑極速，最勇敢，全身堅固，槍刀不入。惟腳跟一處，槍刀能穿透。

有阿赫列士？(Achilles)註五 油印機與印刷機是否可以與依里亞德 註六 并存？隨印刷的發明還不就必然的消滅了故事的歌謠和音樂，因之亦消滅了敘事詩的必要前提嗎？

然而，困難的並不在於認識希臘的藝術與史詩和某種社會發展形式的關係。難以解釋的是他們仍繼續供我們愉樂，而且在某種意思上還保持着其風格與現在不能達到的姿態。

成人不能再變為小孩，不能再如小孩好玩。然而，難道他也就不喜歡他孩童時代的天真了嗎？難道他就不應當再追求充分恢復其天質了嗎？難道他就不會時時在自然的小孩的天性中，復活其本來的天性嗎？為什麼曾經表現過光明燦爛的幼年人類社會不能給我們以永久的悵惘，成為永不復返的往日？也有那幼而老成不可教的小孩。許多古代的民族都屬於此類。希臘人曾是常態的小孩。其藝術賦有的魔力並不與培植他的那尚未發展的社會環境相矛盾。恰恰相反，他正是其社會環境的產物，並且與社會有不可分離的聯繫，他是在那尚未成熟的社會條件下降生，並且也只有在那樣一個時期降生，永遠不會再生。

(馬克思手稿至此止)

註六 Iliad：荷馬的史詩。

馬克思及其夫人的疾病 與死亡

十九世紀兩個最偉大的科學家對於人類有絕大的貢獻，即達爾文與馬克思。達爾文發現生物界的發達律，馬克思發現人類歷史的發達律，溯其起源，固出于同一運動律，論其重要，也可等量齊觀，然馬氏的發現對於人類日常生活的關係更為密切，因此我們對於他也更感興趣。關於馬氏生平的事業，拙著馬克思傳上，中兩冊所介紹的已經不少，現正整理下冊，茲特先將其中比較重要的最後一章在本誌發表，以饗讀者。

季子識

我們對於馬克思的生平大事以及和他有關係的一切大事，在本書上編一、二、三冊中已大致說過了，現在只剩着一樁不幸而又不可避免的事待講，就是他的病亡。當馬氏五十二歲時，(一八七〇年)旅居日內瓦的一般俄國青年寫信給他，尊之為老前輩，他當時在致昂格思的信中說：“這些青年把

我當做老前輩，我是永不會原諒他們的。他們儼然以為我的年紀已在八十與一百之間。”（見昂格思與馬克思書信錄第四卷二五九頁。）這雖是一種笑話，然即此可以窺見衰老為馬氏所不願聞，他的意思顯然是在“老當益壯”。他的身體本來十分強健，可是他壯年因奔走革命，到處見逐，既飽經世變，晚年復因兒女夭亡，家計困難，尤備嘗憂患，又加以矢志為無產階級造成一種獨立的學說，刻苦自勵，從事著作，以致體力大受損傷，而容貌也居然呈出一個“龍鍾老叟”的樣子。卡斯特于一八八〇年在倫敦看見他和昂格思，後來回憶他們兩人當時的情形說：“馬克思比昂格思雖只大兩歲，然他的容貌却表現老得多。”（見卡氏我的亡命時期一六九頁）由此可以想見馬氏體質上的犧牲所達的程度了。

昂格思常說馬克思的晚景十三年（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三年）只是一種遷延的死症時期，這句話雖形容得稍微過當，然自一八七〇年起，馬氏實已入于疾病的時期。他既是從此多病，而他對於國際黨的事務，猶奮不顧身，盡量參與，他于是年五月十日寫信給昂格思說：“我自上次訪波克海姆受寒得鼻病後，至今猶為所苦，我的女孩子們禁止我今晚往總會，如不聽從，就以向昂格思盡量宣佈我的行為相恫嚇。然在實際上我出席會中是很重要的。”（見昂格思與馬克思書信錄第四卷二八三至二八四頁。）就馬氏這些話看，似乎

他所患的病只是一種感冒，其實尚雜有他種病症，如風濕病，和失眠症等等。昂格思屢次勸他于是年夏季往奧大利的卡爾斯巴德 (Karlsbad) 去養病，因為該處是歐洲最有名的溫泉之一，極有益于病人的調養。然他不以為意，及病劇時才移居英國海濱的藍茲給特 (Ramsgate) 他于八月十二日在此處報告昂氏說：“當我來此之前，左腿上已經很痛，並且開始蔓延到腰部。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但此病現已帶一種嚴重的性質。這是一種風濕病，十分兇猛，我晚間很難安睡。”(見同書同卷三一七頁。) 同月二十二日他又告訴昂格思說：“我的風濕病非常厲害，家人決定送我往倫敦就診于馬的孫 (Madison) 醫生。”(見同書同卷三二五頁。) 他于九月一日寫信給索爾格說：“你屢次來信，我沒有答覆，是由于兩種情形的貽誤，起初為“工作過度”，後來則大病臨身。八月初間醫生送我往海水浴地方。但我在該處患臀骨筋風濕症甚劇，至幾星期之久。昨天才回倫敦，然尚沒有完全復元。”(見倍克，雷慈根，昂格思，馬克思等致索爾格等書信錄一六頁。) 他的病既“沒有完全復元”，此後竟力疾作工，毫無限制，他在同月十四日致柯格爾曼的信中說：“我的時間完全耗在國際黨的工作上，夜間從沒有在三點鐘以前上牀睡過。”(見馬克思與柯格爾曼書七七頁。) 至十二月十三日，他復報告柯氏說：“這次戰爭(指德法戰爭)，使總會最大部分

的外國通信祕書馳赴法國，幾乎全部國際通信都要我來擔任。”（見同書同頁。）他在這一年的病勢本已不輕，可惜不能從工作中擺脫出來，安心靜養，以致不獨沒有早日復元的希望，並且還讓其深入膏肓，貽後日無窮之憂。

關於馬克思的病狀，當時似乎沒有人作一種有系統的紀錄，遺留下來，因此我們不能知道他病中經過的詳細情形，只能從他的書信中偶然窺見一鱗半爪。他于一八七一年八月雖聽醫生的忠告，曾往布來屯（Brighton）養病數星期，然在這一年中似乎沒有什麼大病，不過工作非常之忙。他于七月二十七日向柯格爾曼訴苦道：“即使每天有四十八點鐘，然幾個月以來，我還是不能做完每日的工作。國際黨的工作極多，還有亡命客充滿倫敦，我們必須予以救濟。此外各種各樣的人和報館記者都來訪問，想藉此親眼看一看我這個“怪物”。”（見同書九〇頁。）至九月十二日又告訴索爾格說：“我們此時非常忙碌，自三個月以來我迫得（現在仍然如此，）停止十分迫切的理論工作。”（見倍克，魯慈根，昂格思，馬克思等致索爾格等書信錄二九頁。）但他也並不是完全無恙的，所以他于十一月十日致書斯拜爾，（Speyer）有“過度的工作和後來生病使我不能早日回信”（見同書三四頁）的話。

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的健康情形似乎還較前一年為

好，因為他從三月至六月寫信給索爾格共有六次，除掉間或提及自己因德法文的資本論付印等事非常忙碌外，從未說到病痛的事；迨九月國際黨在海牙開會，且親自出席。此後昂格思寫信給索氏，提及馬克思一家的情形，沒有關於馬氏生病的話，他自己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致索氏的信中，也只說因對法譯資本論作工過度，以致不能寫信，可見他在這一年中總算是很平安的。

可是到了一八七三年馬克思的情形就不同了。他于是年八月十二日寫信給丹聶爾孫 (Danielson) 說：“好幾個月以來，我害病非常厲害，有時並陷入一種危險的狀況中，這是作工過度的結果。我的頭痛甚劇，恐怕會有中風之一日。”（見波士德格特工人的國際黨八〇頁。）至九月二十七日他復對索爾格說：“我的妻子已經將我的健康情形，幾次寫信告訴你；（按馬夫人此等信件未見刊布出來，恐已遺失了，）我大有中風之虞，腦子至今仍受痛苦，所以我的工作時間必須力加限制。”（見倍克，魯慈根，昂格思，馬克思等致索爾格等書信錄一二〇頁。）昂格思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告訴索氏說：“馬克思及其幼女于昨日前往約克州 (Yorkshire) 的哈洛格得 (Harrogate)，他們兩人應在該處休養幾時。此舉對於他尤為必要，自本年春季以來，急性的病徵雖已消滅，然壓迫的腦病旋又出現，使他不能作工，並不願動筆，此病如果

延長下去，也能發生不好的結果。他現在將往曼切司特去訪我們的朋友哥白特，這是他充分信任的唯一醫生，在春季也會受其診治。”（見同書一二九頁。）越五日馬克思寫信給昂氏說：“哥白特替我驗過身體，發覺肝臟稍微擴張，據他的意見，我當住卡爾斯巴德去調養，才能痊癒。”（見昂格思與馬克思書信錄第四卷三四頁。）但馬氏當時並沒有聽哥氏的話前往該處，仍寄居哈洛格得，至十二月七日復報告昂氏說：“我的寒症從前非常厲害，至今還沒有完全痊癒，現仍服藥，這是哥白特于得信後馬上由曼切司特開給我的方子。我希望此病得于一二日內告癒。可是此地的空氣與靜悄的生活（我絕對沒有作工），對於我非常有益，你可知道，我雖得了這種煩惱的和頭昏的病症，然許多年來，却沒有覺得和現在這樣舒服的。”（見同書同卷三五六頁。）我們從這些信中可以窺見他在一年中的病況已經是十分沉重了。

馬克思在當時不過五十多歲，年紀不算十分大，就是他的病也並非一種什麼免不了的老病，只因他要完成資本論二三卷，及從事其他著作和黨務等等，奮不顧身，遂致一病再病，並且大病特病。他不獨于病癒後，復拚命作工，即在病中仍想繼續不輟，所以他于一八七四年四月四日寫信給索爾格說：“可惡的肝氣病現又加劇，竟使我絕對不能繼續訂正（資本論的）法文譯本，（在實際上此書差不多要完全修正

過,)要聽醫生的命令往卡爾斯巴德養病,實在是逆着我的意志。”(見倍克,雷慈根,昂格思,馬克思等致索爾格書信錄一三五至一三六頁。)至五月十八日他復告訴柯格爾曼說:“我自從哈洛格得回來後,起初受癱瘓的襲擊,隨後又發生頭痛,和失眠等症,所以不得不於四月半至五月五日逗留于藍茲給特。(海濱。)自此以後,身體又好得多,不過還沒有完全復元。我的特別醫生(曼切司特的哥白特)主張我往卡爾斯巴德,並且當立即前往,但我必須將完全停頓的法文繙譯(指資本論第一卷,)告一個結束,此外很願在該處和你相會。當我不能動筆的時候,已經替第二卷搜集了極多的新材料。不過結束法文版和完全恢復健康之前,我不能作出這第二卷。”(見馬克思與柯格爾曼書九二至九三頁。)

然馬克思為恢復工作能力起見,畢竟於是年八月偕同幼女伊利安樂往卡爾斯巴德養病。昂格思在九月十二日致索爾格的信中提及此事,並追述馬氏以前的狀況說:“馬克思現在卡爾斯巴德,飲該處的礦泉,藉以恢復他的肝臟。他已經經過許多不幸的事變。七月間在外特島(Wight)還沒有收得何種效果,又因幼女驟得重病,必須回來。剛才到家,(小)燕妮的一歲小兒便死了。此事使他十分傷心。我想(他的)肝臟一經復元,則診治那用功過度的神經系統,當易為力。”(見倍克,雷慈根,昂格思,馬克思等致索爾格等書信錄

一四〇頁。)

馬克思抵卡爾斯巴德後，于九月一日寫信給昂格思說：“此次遷地養病，對於托細實有奇效；我（自己也）覺得好一點，但失眠症還沒有痊癒。”（見昂格思與馬克思書信錄第四卷三六二頁。）他于同月十八日復報告昂氏說：“你知道我是懶于執筆的；然此次久不通音問，却非出於這原因。起初所經過的三星期幾乎不能睡眠；這樁事和在此努力守規則一事合起來就可以向你解釋一切。飲礦泉雖只在早晨，（晚間臨睡之前，飲一杯冷水，這是由一個特別礦泉取來的，）然總覺得終日是一種機械式的（生活），差不多沒有片刻可以自由。早晨五點或五點半鐘起床。於是飲各礦泉的水六杯。每飲一杯至少須隔十五分鐘。然後購買依診所規定的麵包，預備早餐。此後則出去散步，至少一點鐘，最後就在城外一個咖啡店中飲咖啡，這種飲料在此處是最馳名的。飲了咖啡之後，在近處山上步行一陣；約於十二點鐘歸寓，但每隔一天洗澡一次，又花去一點鐘。然後更換衣服；隨便在任何旅館中午餐。食後眠睡是受嚴格的禁止，（食前則准眠睡，）我自己試過一次，相信這是對的。餐後再出遊行，有時驅車前進。晚間六時至八時回到卡爾斯巴德，飲一盤清湯——於是就寢。這種出遊有時又變作往戲園看戲，（戲園總是九點鐘關門，和其他一切游樂事一樣，）赴音樂會聽音樂，或到閱

報室看報。”(見同書同卷三六五至三六六頁。)

馬克思在卡爾斯巴德依照醫生所指示的方法，盡力調養，果然獲得大效果，他的病暫時已告痊癒。他似乎於是年九月底或十月間離開此地。可是他的工作能力一經恢復，又盡量作工，至一八七五年病復大發。他於八月間重往卡爾斯巴德，至二十一日寫信給昂格思說：“我(每日)至少在露天中度過十二點鐘，於解決應履行的事件後，主要遊樂就是山中散步，和看風景，這種風景愈加奪取我的注意力，我便愈加喪失辨識方向的能力。”(見同書同卷三七〇頁。)至九月八日他復將他的療養狀況報告昂氏說：“此次的旅行療治於我非常有益；就是在間睡眠，除掉少數例外，也十分良好。然據許多和我講交情的醫生說，我也是卡爾斯巴德一個頭等旅客。這些先生們藉口於“現時的療治”等等，到處努力來引我離開“安全”的路，但這些誘惑者只是枉費氣力。我是第二年(來遊)的病人，在礦泉表上得升高等級。在去年則忒累濟井(Theresienbrunn 爲累奧陸耳——Reaumur——(寒暑表)四十一度，)馬克特井(Marktbrunn 爲累奧陸耳)三十九度)和謀爾井(Mühlbrunn 爲累奧陸耳)四十三度六分)爲我供給飲料的泉井，我當時飲斯布諾德爾(Sprudel)泉井只有兩次。今年(自寄居後)第二個星期起，每早在阜爾孫井(Felsenquelle 爲四十五度，每天一杯，)拍拉慈井

(Bernardsbrunn 爲五十三八分，(每天)兩杯，)和斯布諾德爾井(五十九度至六十度，(每天)兩杯，)飲熱泉水五杯，此外，則起牀時飲一杯施洛斯井(Schossbrunn)的冷泉水，臨睡時也飲一杯冷泉水。”(見同書同卷三七二至三七三頁。)

馬克思在卡爾斯巴德第二次養病，又獲得大效，於是年九月回家，復拚命作工。他因索爾格要求他和昂格思往美國參與國際黨最後的會議，於一八七六年四月四日回信說：“昂格思和我極爲忙碌，不能前赴菲列得爾菲亞，我尤不可失去光陰，因爲我的健康情形總是逼迫我(每年)到卡爾斯巴德去治病，約花費兩個月工夫。……我能從紐約獲得一八四三年一直到現在的美國書目麼？(自然是由我出資。)我(爲着資本論第二卷的緣故，)須親自看一看關於美國農業，土地產業關係，和信用(危機，貨幣，以及這一類有連帶關係的事件，)的出版物有沒有可用的材料。”(見倍克，雷慈根，昂格思，馬克思等致索爾格等書信錄一四七至一四八頁。) 倫敦博物院中偌大的圖書館不足以應馬克思的要求，他竟於晚年多病之秋，要向美國購買三十餘年的書目，藉替資本論搜集材料，他對於做學問力求精確與淵博的精神，真是世所罕見。

馬克思既因著作的緣故而“極爲忙碌”，其結果又是舊疾復作。在一八七六年這一年中不獨他自己害病，即其夫人

及幼女也同樣害病。他在六月二十六日致昂格思的信中說：“當我們回家時，我的妻子仍然病得很厲害，迨我們離家時，才略微好一點。”（見昂格思與馬克思書信錄第四卷三七九頁。）到了八月，他復往卡爾斯巴德去養病，於十九日報告昂氏說：“托細在旅行途中頗有微恙，到此處竟復元了，至於我自己，卡爾斯巴德對於我總和往昔一樣，是有奇效的。我在最近的幾月中又開始患劇烈的頭痛，此病現在竟完全若失。”（見同書同卷三八一頁。）我們看了這幾句話，便知道馬克思如安心靜養，毫不作事，則他的病並非不可救藥，可惜他的工作太多，以致恢復健康只等於曇花一現。

至一八七七年，馬克思及其夫人仍是患病，他並仍舊工作不輟。他於七月十八日寫信給昂格思說：“上星期的幾天和本星期的開始，我患失眠症，並因此發生神經錯亂的狀態，達到很嚴重的程度。”（見同書同卷三九四頁。）至八月八日他又報告昂氏說：“我的妻子的健康情形毫不能使人滿意。”（見同書同卷四〇七頁。）他於同月前往普魯士的恩紐拉（Neuenahr）浴場養病，至十七日將病狀告訴昂氏說：“我的肝臟沒有表現再行擴張的痕跡；消化器官却不大如法，但是本病還在神經系。施美慈（Schmitz）今天又向我說，在此處寄居三星期之後，必須往黑林（Schwarzwald）的高處去吸山林的空氣。我們將看看，到底怎樣。施氏又勸我的妻子

同去，她還須吃藥，並且在病沉重之前，恰來此處了。”（見同書同卷四〇八至四〇九頁。）至九月二十七日，他從倫敦發信給索爾格說：“今天從歐洲大陸回來，（醫生令我前往的，）才看見你的信。因此我的回信未免太遲。抱歉之至！但是這一年來可惡的失眠症復來侵襲，使我懶於執筆，因為我的適宜於做事的時間是絕對要花在工作上的。”（見倍克，魯慈根，昂格思，馬克思等致索爾格等書信錄一五四頁。）馬克思這一段話直接表見他在“適宜於做事的時間”必然作工，間接表見他的遷地養病，並非求一己的幸福，不過要在垂暮之年設法延長他的“適宜於做事的時間”罷了。

當一八七八年，馬夫人的病是有增無減，而馬克思也不見得較前好許多。他於九月四日寫信給索爾格說：“我今天往馬爾維（Malver）去養病，將在該處寄居三星期。……我的妻子在該處已有好幾個星期，她的病很沉重，小外甥孫也病得很厲害。”（見同書一六一頁。）

至一八七九年馬克思的病已有轉機，而馬夫人的病却更加沉重。馬氏於九月十九日報告索爾格說：“我起初寄居格塞，（Gersey）後來寄居蓋茲給特共有七星期之久，昨天才回倫敦。……我久居鄉中是因為（療治）神經系統的緣故——此病加劇了，兩年以來，因畢士馬克作梗，不能前往卡爾斯巴德——這種神經系統竟至使我差不多不能從事於一切精

神工作。然現在却好得多了。”(見同書一六二頁。)昂格思於是月二十四日寫信給倍克且說：“馬克思現在又在此處，他的健康情形好極了，所以他現在可以很順利地從事於資本論第二卷的工作。”(見埃系霍恩編的昂格思書簡三二頁。)至於馬夫人的病就大不相同。馬氏於十一月十九日寫信給索爾格有“我的妻子仍是病得很危險”(見倍克，喬慈根，昂格思，馬克思等致索爾格等書信錄一六七頁。)的話。昂格思於下月同日寫信給倍克也說：“我們這裏也不見得十分好，然我却不抱怨，(因為)馬克思的病較往年為好，不過沒有復元罷了。許久以來，馬夫人即害消化不良症，現在並不見得好些。(資本論)第二卷進行得很慢，然馬氏如沒有一個比本年更好一點的夏季，使之恢復原狀，此書是不會迅速告成的。”(見昂格思書簡三三頁。)

馬克思夫婦在一八七八年和一八七九年的情形既不能令人樂觀，在一八八〇年的景況尤十分淒慘。昂格思於是年四月一日寫信給倍克說：“此處也不過爾爾，馬夫人仍舊沒有痊癒，馬克思也不見得十分順利，一過了冬季，便是他的最壞的時期，一種極厲害的咳嗽妨害他的眠睡。”(見同書三五頁。)至八月十七日昂氏復告訴倍克說：“我們都在此處，馬克思及其夫人，和各女兒，女婿，外甥孫等等(會集一堂)，這種集會很有益於馬氏，我希望他能恢復原狀。可惜他的夫

人許久以來就害病，然尚勉強歡樂。”（見同書三八頁。）昂氏對於馬夫人的病狀似乎是輕描淡寫，馬克思却看得十分沉重，故於八月三十日對索爾格說：“我和我的妻子此時在藍茲給特，特從此處寫信給你；我從前和她到曼切司特，就診于友人哥白特醫生。她是害了很危險的肝氣病。”（見倍克管慈根，昂格思，馬克思等致索爾格等書信錄一六八頁。）至十一月五日他再答索氏的信說：“我許久不寫信，必須向你表明是：（一）由于工作緊迫，（二）由于我的妻子年餘來那種有生命危險的病痛。”（見同書同頁。）

我們在一八八〇年既目觀馬克思夫婦陷入愁雲慘霧之中，至一八八一年便看見他們的大悲劇。馬氏於是年六月三十日寫信給索爾格，說他患一種六個月以上的咳嗽，傷風，頸病和風濕症等等，而馬夫人的病更是每况愈下，所以他很悲慘地說：“我們講句私話，可憐我的妻子的病是不可救藥了。我於幾天之內和她同往伊斯特本（Eastbourne）海濱（去養病）。”（見同書一七七頁。）然馬氏夫婦旋又力疾前往巴黎，因為他們長次兩女的家庭都在該處，馬夫人自知病將不起，欲和自己親生的骨肉作最後的會合。馬克思於七月二十日將旅行的狀況報告昂格思說：“從倫敦至多維（Dover）的行程恰如所願；這就是說，當我們從麥特蘭公園出發之際，我的妻子病很沉重，然在途中並不見得有什麼變象。她在船

上居婦女室中，躺在很舒適的安樂椅上。海不揚波，而天氣尤為清爽。她在卡雷(Calais)上岸時比在離開倫敦時的景況好一點，因此決定再前進。……我們於晚間七點半至巴黎，……於十點鐘達到目的地。”(見昂格思與馬克思書信錄第四卷四二六頁。)至八月中間，馬氏接到幼女患病甚劇的消息，遂於十八日與他的夫人從阿戎忒厄市(Argenteuil)長女的家中，分道返倫敦。他們兩人自返倫敦後，便大病而特病。昂格思於十一月四日報告倍克說：“馬夫人好幾個月以來病在牀上，十分危險，馬克思也得一種劇烈的氣管枝鬱熱症，這種症候在他這樣年齡和健康狀況中真不是好玩的。幸而最壞的時期已經過去，目前一切危險都沒有了，然他每日大部分的時間仍須躺在牀上，並且非常軟弱。”(見昂格思書簡四一頁。)

馬夫人的病已成不治之症，距臨終之期也不遠了。不過我們現在不能急轉直下地敘下去，還須徵引她的幼女對於他們兩人病中經過的紀述，以補上文的不足。

“現在講到卡爾斯巴德的事。我們於一八七四年第一次到該處。黑人因肝氣和失眠症往該處。至一八七五年——他第一次寄居獲得非常的效果——他一人獨往。我於一八七六年復陪着他前往，因為他說去年和我同住的日子太少。他在卡爾斯巴德利用醫藥最為審慎，凡開給他的醫方，都盡量

照行了。我們在該處結交許多朋友。黑人做遊客是心曠神怡的。他總是用他的好脾氣去看待一切事情，因使自己喜不自勝，對於清秀的山水固然如此，即對於一杯啤酒也是如此。凡我們所到的地方，因他那淵博的歷史知識便使之愈加顯出生活的神氣，愈加顯出過去比現在還要新鮮活潑。

我相信關於黑人在卡爾斯巴德的寄居，（別人）曾有各種記載。在我所聽見的記載中有一種長篇論文，但我不復知道在那種報上；或者是在 M. D. in D. 黑人曾向我說及一篇很好的論文。

至一八七四年，我們到了萊比錫。我們當要回家的時候，前往丙根（Bingen）旅行——黑人要把該處指給我看，因為他和我母親的結婚旅行曾到該處。此外，我們在這兩次旅行中又經過諸勒斯登，柏林，布拉格，漢堡，和努連堡（Nürnberg）。

至一八七七年，黑人又須往卡爾斯巴德，然却有人報告我們，說德奧兩國的政府有意放逐他，這種旅行路途既長，費用又大，要是被放逐，殊不值得，所以他中止前往。——這是於他最不利的，因為他每於旅行該處之後，便覺得和新生的人一樣。

我們到柏林的主旨是去訪父親的朋友，即我親愛的舅父亞德高。在該處住了幾天。後來聽說，當第三日，警察在我

們所住的旅館中搜人——恰在我們離開該處之後一點鐘——(逃出羅網),這是黑人所欣喜的。

至一八八〇年的秋季——我們慈愛的小麥姆當時病得很沉重,她在病痛中很少復元之時——黑人患肋膜炎,十分厲害。這種肋膜炎已經很危險,因為他對於自己的病痛總是過於疎忽。醫生(我們的好朋友唐卿——Donkin)以為這種症候幾乎沒有希望了。當時是一個可怕的時期。我們的母親睡在前面大房中,黑人睡在旁邊的小房中。這兩個人本是同居的,並且是同長大的,斯時竟不復能同住一個房中。

我們善良的老蘭欣……和我須看護兩個病人。醫生說,我們的看護將黑人救出來了。不管此事是否如此,然我只知道,在三個星期之中,蘭欣和我都沒有上牀睡過。我們整天整夜坐着站着,要是疲極了,便輪流休息一點鐘。

黑人的病尚好過一次。他有一天早晨覺得強健一點,走到母親的房中,這一早晨,我是永不會忘記的。他們斯時是返老還童——母親是一個可愛的女孩,黑人是一個可愛的少年——不復是一個為病魔所傷害的老人和一個行將就木的老婦,他們是終身作別。

黑人病好一點,他雖沒有氣力,然似乎是會有氣力了。

至(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日,母親死了;……她的死拖延至幾個月之久,並且受盡一切極可怕的痛苦,這是由於癱

毒所致。然她的好脾氣，她的無盡藏的談諧……未嘗一刻離開她。她對於（一八八一年）德國選舉的結果，和小孩子一樣忍不住細細盤問；對於（選舉的）勝利是何等歡喜啊！她到死時還是歡樂，常力求用談諧的話來破除我們對於她的恐懼心。她患病雖十分厲害可怕，然她總是說談諧話，發笑聲，並嘲笑我們和醫生，因為我們十分沉悶。她至彌留之際，還完全清白，當不能再說話的時候——她的臨終的話是向着“卡爾”說的——便和我們握手，猶欲勉強發笑。”（見李卜克內西馬克思紀念冊八六至九〇頁。）

馬克思與馬夫人相依為命差不多自孩提時即開始，自結婚後，魚水交歡，愛情膠漆，尤非尋常的夫婦可比。拉花爾格說：“馬克思和他的夫人是由一種最深的愛情結合攏來的，馬夫人的美貌為他所心喜，並且是他所自豪的，馬夫人性情的溫柔和誠篤已經使他在困苦中覺得容易忍受，至於這種困苦是他做革命的社會主義者煩惱的生活中萬不能免的。”（見新時代雜誌第九年度一卷四一頁。）馬氏當此風燭殘年，忽然喪失一生相依為命的佳偶，其悲痛的深切，可不言而喻。昂格思於馬夫人死後即說：“黑人也死了，”這句話要算是將他們兩人的關係形容出來了。

馬克思於他的夫人死後，雖猶一息尚存，然却已病得十分沈重，故當夫人入土之際，醫生禁止他前往送葬。他於燕

妮葬後兩日寫信給長女說：“我對於這種禁令是依從的，因為親愛的死者在未死的前數日已經向她的侍疾者表明她入土時不要一點葬儀；“我們不注重外表”，……她的氣力消失得這樣快，（沒有受很多的痛苦，）我大為安慰。她的病和醫生所預言的一樣，具有一種死症的性質，這是起於衰老。當彌留之際——沒有死的痛苦，只是一種慢慢的長眠，而她的眼睛較平常並且更大，更美，更有光芒。（見同書第二十六年度一卷八六八頁。）

馬夫人的葬期為十二月五日，馬家遵她的遺囑，不用一點葬儀，而送葬的人也只有幾個親戚和朋友。昂格思在馬夫人的墓前作下列的演說：

“我的朋友們啊！我們現在所埋葬的豪俠的馬夫人是一八一四年在沙爾慈慰得爾（Salzwedel）出生的。她的父親威斯特華倫男爵旋為政府顧問，移居居利，並且和該處的馬克思家相善。（兩家的）小孩是同在一起長大的。這兩個才具優長的人相遇在一起。當馬克思進大學時，他們將來共同的命運已經決定了。

自一八四三年馬克思初次所主持的萊因報被封後，就是（他們的）結婚期。自此以後，馬夫人不獨是和她的丈夫同命運，同工作，同爭鬥，並且以最大的了解力和最高的熱忱參加此等事業。

這一對少年夫婦同住巴黎，作一種自由意志的亡命，然這種亡命不久就變成一種真正的亡命。普魯士政府也在此處跟着馬克思了。還有一事，我必須附帶聲明，並且深為悼惜，就是像洪保德這樣的人對於實現驅逐他的命令一事，也加入活動。他一家遂遷往不律塞。後來二月革命爆發。這種風聲傳到不律塞，也發生騷動，因此不獨使馬氏被捕，比政府並且也無緣無故把他的夫人一併投入獄中。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騷動在下一年就一起失敗了。（馬氏夫婦）於是重新亡命，初則出走巴黎，繼則因法政府又起干涉，出走倫敦。在實際上，此役對於馬夫人是一種具有許多恐怖的亡命。她眼見兩個男兒和一個女兒在物質的壓迫之下夭折了，然她對於這種物質的壓迫也是要制服的。但是（上自）政府，（下至）資產階級的反對派——從庸俗的自由派起至民主主義派止——共同作成一種大陰謀反對她的丈夫，他們以種種最卑鄙和最下賤的讒言蜚語誣蔑她的丈夫，報界全體排斥她的丈夫，使之不能申辯，所以她的丈夫站在反對者——這種人必定是他們夫婦所鄙視的——之前不得正當的防衛，——凡此種種使她受氣很深，並且歷時甚久。

但這也不是終古如斯的。歐洲的無產階級在有幾分可以自由行動的種種生存狀況中又突然興起。國際黨亦應運而生。無產階級的爭鬥從一處侵入他處，她的丈夫是最前驅

中的先驅者，努力從事奮鬥。她斯時開始經過一個時期，減去許多煩難的困苦。她親自看見種種對馬克思施行攻擊，並和冰雹一般密的讒言蜚語，像風前的枯草一樣消滅了，她親自看見，從前一切反對派——封建派以及民主黨——費絕大的氣力壓制她丈夫的學說，現在在一切文明國中和一切有文化的語言文字中，這種學說為窮家小戶所宣傳了。她親自看見，無產階級的運動——她的全部生活是與這種運動結合在一起的——撼動舊世界，從俄羅斯一直達到美洲，使世界脫出軌道，並且使一切抵抗望風披靡，因而勝利前進。我們德國工人在上屆選舉中（所獲的勝利是對於無產階級的運動）不可毀滅的生活力給出一種切實的證據，這也是她近來所歡喜的事件之一。

這位夫人具有如此敏銳和批評的理解力，具有如此政治的機智，具有如此熱烈的品性，具有如此的才能，在（無產階級的）運動中替戰爭同志服務幾及四十年之久，凡她所做的事還沒有在公衆的面前與當世報紙的編年紀事中表現出來。這是大家必須親自去考察的。但這是我所知道的，（巴黎）公社亡命者的妻子們將時常思念她，而我們這些人將永久失去她的勇敢和聰明的忠告——（她的）勇敢是沒有矜誇的，她的聰明是絲毫不累及體面的。

至於她個人的特長，用不着我來說。她的朋友們都知

道，並且是不會忘記的。(世間)如有一個婦人以使別人享幸福爲(自己)最大的幸福，那就是這位(馬)夫人。”(見同書第九年度一卷四一至四二頁。)

馬克思夫婦真可以算是一對“比目魚”，馬氏自喪偶後，雖勉強度日，總覺得愁苦萬分。他於十二月十五日寫信給索爾格說：“自你的兒子從此處帶給你的口頭報告後，你當確已到得我的親愛的和永不忘記的生平女伴逝世(十二月二日)的消息。我自己當時沒有十分復元，可以向她盡一種慎終的敬禮。在實際上我至今還囚在家中，但下星期當往文特邦(Ventnor在外特島中，)(去養病)。我從此次病中抽身出來受兩重磨折，在心神上的(磨折)是由於我的妻子的去世，在身體上的(磨折)是由於肋膜炎的加劇，和氣管枝鬱熱症的刺激性更大。再過些時候，我將和(我的)健康狀況的運動一起歸於烏有了。”(見倍克，雷慈根，昂格思，馬克思等致索爾格等書信錄一七九至一八〇頁。)

馬克思上面這一段話表現他已經不復感覺生活上的興趣，然他爲什麼反僕僕於風塵之中，急想延年益壽呢？他的幼女伊利亞樂說：“母親的生命一去，黑人的生命也完了。他努力奮鬥，求保持生命，因爲他至臨終時還是一個奮鬥者——可是他却衰敗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要是自私自利的，那簡直可聽其自然。獨有一樁事，自他看來是超蓋一切

的——這是他所繫念的。他力求完成他的大著，因此決定再作一種休養精神的旅行。”（見李卜克內西馬克思紀念冊八八頁。）

馬克思雖想休養精神，恢復健康，藉此完成資本論，然這種志願始終不能實現，因為他的健康已無復元的希望，中間復經過大憂患，故竟於馬夫人死後十五個半月即溘然長逝。昂格思於他死後一日寫信給倍克，說他的心中“或者已流血了”，（見昂格思書簡四八頁），昂氏誠不愧為他的真知己。關於他旅行中的經過情形，和臨終時的狀況，昂格思於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五日報告索爾格，極為明白，今特徵引原信如下：

“他於他的夫人去世之前，即一八八一年十月，患一種肋膜炎。此症痊癒後，他於一八八二年二月被送往阿爾及耳，（Algier）當時天氣寒冷，並且潮濕，他在該處又患肋膜炎。不好的天氣仍然繼續下去；當他的病醫好時，又因將屆夏天的酷暑，被送往蒙的加羅。（Monts Carlo）他復患一種慢性肋膜炎。天氣仍是不好。後來他的病稍有轉機，即往巴黎附近的阿戎忒厄，寄居於女兒浪規夫人的家中。他在該處利用翁季盎（Enghien）附近的硫磺礦泉醫治自己根深蒂固的氣管枝鬱熱症。該處的天氣也很惡劣，然診治上却有效驗。他在味薇（Vevey）住六個星期，於九月離開該處，

差不多已經恢復健康。於是送他往英格蘭的南方海濱，度過冬季。至於他自己對於這種無效驗的旅行生活十分厭倦，向南歐的新亡命對於他在心神上所損傷的與在身體上所補益的，或恰恰相等。當倫敦降霧期一到，他被送往外特島。該處天雨連綿，並且天氣又變寒冷。當着新年的時候，勾列墨爾 (Schorlemmer) 和我本要去看他，旋接到消息，使托細不得不即刻前往。未幾(小)燕妮去世。(一八八三年一月十二日) 他於是回到此地，(倫敦)又患氣管枝鬱熱症。照前此一切經過的情形和他的年齡看，這是很危險的。一種複雜的病症隨即出現，就是肺臟膿腫，四肢喪失氣力，極為迅速。情形雖是如此，然全體的病狀還算好，為他診病的主任醫生是倫敦第一等少年醫生之一，並且是由累蘭卡斯脫 (Ray Lankaster) 特別薦來的，這位醫生於上星期五日尙以最好的希望期許我們。但是一經在顯微鏡之下檢驗(他的)肺部肉膈，便知道危險很大，因為在肺臟的膿腫處有一次一根血管竟完全破裂了。因此自六個星期以來，我每天早晨一來到轉角處，即有死的恐懼來襲擊我，房中的幃幔終會取下。昨天下午兩點半鐘，正是日間訪他最適當的時候，我來他家——全家哭泣，好像是到了臨終之期。我問清原委，察看底細。有一點失血，但一種突然絕氣的樣子跟着出現。我們忠實的老蘭欣看護他竟比任何母親看護自己的兒子還好，蘭欣走上樓去，下

來說：他半睡着，我可同上去。當我們進去的時候，他躺在那裏，睡着，可是不復醒來。脈息和呼吸都已停止。在這兩分鐘之內，他安安靜靜，毫無痛苦地長眠了。

凡一切因自然的必要而出現的事件，無論如何可怕，自有其佳處。這裏的事也是如此。醫生的技術也許可以替他維持一種苟延殘喘的生活至數年之久，這是因醫生技術的勝利，使一個難於救治的人的生命不突然死去，但漸漸地死去。然這是我們的馬克思決不能忍受的。生存在世上，有許多沒有完成的工作橫在自己的面前，心中急欲完成，而在能力上又辦不到——此事對於他比那奪去他的生命的死還要苦一千倍。他必定會與伊壁鳩魯同說：“死對於死者並非不幸，不過對於後死者為不幸罷了。”眼見這個有偉大力量和天才的人像廢物一樣殘存人世，眼見他替醫藥增更大的榮光，眼見他被他強壯時一起壓倒的庸俗人加以挪揄——那我們後天將他送入他夫人長眠的墳墓中，何止好一千倍。”（見倍克，雷慈根，昂格思，馬克思等致索爾格等書信錄一八六至一八八頁。）

昂格思於馬克思逝世之日寫信給李卜克內西，追想他的功績道：“我今天晚上雖看見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臉部慘白，然絕不能想像這個有天才的頭腦將不復用他的偉大的思想去培養新舊兩世界的無產階級運動。我們大家所以

有今日，是由於受他之賜；現今的運動所以有如此的成績，是由於他的理論與實際的活動；沒有他，我們當永遠陷入紛亂之中，毫無辦法。”（見李氏：馬克思紀念冊二〇頁。）

三月十七日爲馬克思入土之期，他和他的夫人同葬在高門地方，葬儀也和他夫人的一樣，非常簡樸。是日送葬的，除他的家人外，只有一些親戚和同志，如浪規和拉花爾格則來自法國，李卜克內西則來自德國，其餘的人大概是在英國就近來的。至於資產階級的人參與葬儀的，僅有倫敦皇家科學院的兩個學者，即動物學家累蘭卡斯脫和化學教授勾列墨爾。（當一八七〇年代，馬克思還在世時，英國資產階級的各種報紙常常宣佈他的死訊；迄他真正死去，他們却默不作聲，僅倫敦泰晤士報於數日後由巴黎一個通信員的口中偶然說及資產階級社會的危險仇敵馬克思死於倫敦。即德國資產階級的報紙對於馬氏之死也一字不提。）昂格思當時在墓前演說道：

“當三月十四日午後二點四十五分，這位生存在世上的最大的思想家不復思想了。他一人獨在房中不到兩分鐘，迨我們進去，看見他已安安靜靜睡在椅子上——但是長眠不起了。

歐美兩洲爭鬥的無產階級對於斯人的損失如何，以及歷史的科學對於斯人的損失如何，簡直是計算不出來。因這

個有大力量的人之死所扯破的裂口即刻就會充分表現出來的。

達爾文發現生物界的發達律，而馬克思則發現人類歷史的發達律，向來被籠罩在冠冕堂皇的意識形態底下的簡單事實是：人類在能夠從事於政治，科學，藝術，和宗教等等之時，必首先備有衣食住三者；因此直接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以及一民族或一時代經濟發達的階段構成一種基礎，所有人類國家的組織，法律的見解，藝術，甚至於宗教的表象都是由這種基礎上發達出來的，因此也必須從這種基礎上去解釋——却不是和向來所遇見的一樣，從反面去加以解釋。

可是還不止此。馬克思又發現現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以及由這種方法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別運動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和社會主義的批評家早前（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探討，都迷離於黑暗之中，因剩餘價值的發見，此處便突然現出光亮來了。

一個生命有兩種這樣的發見，真是了不起。一個人只要能有一種這樣的（發見），已是（一生）幸事。可是馬克思（在學問上）所探討的每一門類，都有獨立的發見，甚至對於數學（也無不如此），至於這些門類亦復不少，而並且沒有一門他只是淺嘗而不深入的。

他爲學者已如上所述。然這却沒有講到他的一半。馬克思把科學看做一種歷史的運動力，看做一種革命力。任何種理論的科學在實行的效能上雖或絲毫看不見，然他對於這種科學的一種新發見，能具有純粹的興味——至於一種發見即刻以革命的態度侵入產業中以及歷史的發展中，則他又感覺一種完全不同的興味。他對於電氣學一門種種發見的發展，和最近對於對普雷 (Marc Deprez) 的發現是嚴密注意的。

馬克思尤爲一個革命家。他一生真正的職業是在這種或那種方法中，對於推倒資本主義的社會以及由這種社會所造成的國家組織，共同活動，是對於近世無產階級——他首先使無產階級覺悟自己的地位與需要，並且覺悟自己解放的條件——的解放，共同活動。這種爭鬥就是他的綱要。他和極少數人一樣，純以一種熱忱，一種毅力，和一種效能，從事爭鬥。(他)於一八四二年(主持)萊因報，於一八四四年(投稿)於巴黎進步報，於一八四七年(投稿)於德文不律塞報，於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主持)新萊因報，於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六一年(投稿)於紐約特里標報，——此外有許多爭鬥的小冊子，在巴黎，不律塞和倫敦各聯合會中的服務，最後就有一個大國際黨的崛起，作爲全部運動的冠冕——這的確又是一種結果，即使他沒有其他成就，然促成這

種結果，也足以自豪了。

不過馬克思却因此成爲當時一個最被人憤恨並最被人誹謗的人。共和政府和專制政府一樣驅逐他，保守派的有產者和極端民主主義派的有產者一樣爭奇鬥勝地來造他的謠言。他把這些東西推在一邊，和掃除蜘蛛網一樣絲毫不睬，直等到受着極大的壓迫，才予以答覆。他現在是一瞑不視了，千百萬革命的勞動同志無不表示敬愛與悲哀，他們所散布的地方自西伯利亞的礦山起，經全部歐洲和美洲，一直到加里福尼亞。我敢說：他現在或還有些反對者，但不會有一個私人的仇敵了。

他的聲名將於千百年中繼續存在，他的事業也將於千百年中繼續存在。”（見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的馬克思紀念雜刊三至四頁。）

昂格思這種演說詞是對於馬克思的爲人及其功績下一個簡單明瞭的批評，他的話既沒有絲毫虛偽，復沒有一點誇張，正是恰如其分，我們將他這些話徵引出來，做本書的一種傳贊，真是再好也沒有了！昂格思說，努力於近世無產階級的解放是馬克思一生真正的職業，讀者試一回顧本書所敘述的事實，便知道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馬克思對於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運動，既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則凡屬有覺悟的無產者以及完全表同情於無產階級運動的智識分子對

於他自當具有無限的敬意，因而發爲詩歌，形諸詠歎，這是人情中應有之事。可是德國一位大學教授說得對，世人以詩詞讚頌拉塞爾的，隨在都是，且幾視拉氏爲天神，至對於馬克思却寥寥無幾。這種情形在馬氏出生的德國爲尤甚。然利歐破爾得，雅各俾 (Leopold Jacoby) 於馬氏死後五日即作有十一首詩替各國的無產者哀悼他，感謝他，語簡而意賅，辭約而情篤，這是世界上有數的作品，今特譯如下，並在第六首後增補一首，表示中國人景仰之意，作爲本書上編的收場白。

成千成萬的人穿上作工衣服。

他們整天地坐着立着。

他們嗡嗡的聲音，

充滿偌大的堂屋。

在世界各國中，

一切言語，一切文字，

都發出送終的哀聲，

追悼這位死去的戰士。

英國人說：「在草廬茅舍中受人敬愛，

在皇宮巨室內爲人忌妒，
他生平只是不趨不停地
盡情活動，努力奮鬥。

在我們的城市鄉村中，
凡有機器轟轟作聲處，
凡在工廠裏發音時，
他的姓名被人稱道不置！”——

俄國人說：“在專制魔王的統治下，
千百萬人腳鐐手銬，
累月經年，飽嘗恐怖，
他的姓名實爲人所思慕！”——

法國人說：“他是世界的解放者，
他反抗野心的戰爭，
他抵制民族的尋釁，
這次追悼就是我們勝利的保證！”——

中國人說：“他生平有兩大發現，
資本主義要將宇內走遍；

只有奉他的主義爲準繩，
才不辜負現今的紀念！”——

德國人說：“我們直至於今，
滿具敬愛的熱忱，
謹替這位思想家與戰士，
撞着喪鐘，表示哀思。

有若普時哥白尼，
創造了天文新律，
他口中所發的呼聲，
正對準一種科學射擊。

這種科學是人民的禍災，
是勞動的窮困。
咳，魔鬼業已僵死，
這就是資本！

在我們人世的爭鬥中，
他遺下一把利劍，
新世界得由此造成；

所以他配受人敬念！

沒有人送給我們的寶物，
比得上雷聲一般的呼籲：
各國的無產者，
聯合攏來啊！”

本社出版革命文學創作

厄運

——著草芳彭——

厄運是描寫一個封建勢力壓榨之下的農家子怎樣參加革命的經過。對於土豪劣紳，軍閥的罪惡，描寫得淋漓盡致，尤其餘事。而在這個時代中，革命的民衆們，有了革命的客觀需要，而其生活為幾個傳統的奴隸觀念所支配，不曉得起來反抗，直至革命的洪流，把他們推上前線才猛烈的覺醒，這中間演變的經過，這篇小說裏面尤其描寫得深刻。至於作者文筆的痛快而且幽默，凡讀過他的作品的都欣賞過，用不著再來介紹。

實價四角

寒夜集

——著草芳彭——

本集的作者向以冷峭而緊張的作風見稱，其態度之勇進，思想之深刻，尤為馳譽於華北文壇。本集所收，為苦酒集發行後之短篇作品精華，其中之『愛與仇』諸篇，均為作者在戀愛流中，感情激越時期所作，不獨表示作者對戀愛之勇往直前精神，且能具體達出作者對人生之真實態度，作者自謂自本集以後，其寫作將轉於第二時期，努力於革命文藝之創作，讀者欲知由浪漫主義如何趨向革命文藝之過渡橋樑，不可不讀此書。

實價四角

馬克思給古蓋曼的信

Briefe von Karl Marx an

Dr. L. Kugelmann.

寒光譯

壹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廿八。

倫敦，哈弗爾斯托克，希爾，邁特蘭，巴爾克，格拉夫敦特萊司，九號。

高貴的先生！（一）

在不多時以前，佛來理格拉 Freiligrath 曾給我看一

封信，這封信是你寄給他的。若不是我家裏一堆不幸的災害使我好些時候（二）不能拿筆，那我老早就回信了。

從你的信裏看見你和你的朋友對於我的政治經濟學批評（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有着那樣熱烈的興趣，使我非常愉快。第二部分現在完結了，就是說到了預備付印的最後一部分*的謄清。牠大約有四百八十頁。牠是第一本的續篇，但牠是獨立地用“資本論”的名字發表，至於“政治經濟學批評”則只做為副題。牠實際上只包含着那應成為第一部門的第三章的東西即一般的資本論。所以資本競爭與信用制度並不包括在裏面，英國人所名為（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三）的就包含在這一卷之中。這是精粹 Luintessenz（四）（與第一部分相聯），並且以下的發展（各種國家形態對於社會的各種經濟構造的關係大致除外）在已經成立的基礎上從其他方面也將易於詳細地說明。

這種長久的遷延有如下的理由。第一，在一八六〇年伏格特搗亂（Vogtskandal）我許多時間，因為我對於原來平常的材料不能不做一大批的研究以進行訴訟等等。一八六一年中，我因美國的內亂失去我主要的收入來源，即“紐約講壇報 New York Tribune。（五）我對於這個報紙的參

* 書中此語為“in der letzten Feilung”按照上下文及本句意義恐

係“in der letzten Teilung”之誤。

譯者，

加工作就到這個時候中止。我爲着不讓我和我的家庭直接地拋露在馬路上，從前並現在不得不迫而負擔一大批銳厲的工作。我自己已經決定做個“實際家”，並且明年春我應當到火車站 Office（六）裏去。這種事情我應當叫牠做幸運呢還是不幸呢？我的拙劣的書法就是我不能獲得這種地位的理由。這樣你就看見我很少有時間和安靜以從事於理論的工作。以致付印的最終的竣工之時間，比我所希望的久，大半是這些同樣的原因。

關於發行方面，我決不照第二卷給董克爾君 Duncker。他於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取得第一本稿子，而這本稿子是一八五九年七月或八月印行的。我有幾分，然而却不十分強烈的希望，就是布洛克浩斯(Brockhaus)或許印刷這個東西。那德國著作家中的無賴所用以對我示敬的死守沉默的陰謀（七）不待言，事情常是因惡意而無濟，在出版上對於我是不利的，無論我的著作的傾向怎樣。我的草稿一旦磨好了清稿（這個清稿我在一八六三年一月開始），我將馬上把牠帶到德國，因為依個人自己的路程，或許容易和書店商人把牠辦好。

我有個連帶的希望，就是，德文著作一出來，馬上在巴黎準備個法文的修正本。把牠譯成法文，我自己絕對沒有工夫，就是說太少，因為我自己或須繼續工作，就要用德文寫

好的資本，競爭與信用之說明的結論，或須爲着英國的讀者把前兩個勞作總括在一本著作裏。在從國外得到一種證據（八）之前來清算牠在德國的影響，我是不相信的。第一本中的說明方法自然是不普通的。其所以致此者是由於對象的性質，限於我這樣寫的有限的地方和工作的目的。這一部分顯然是容易的，因爲牠是關於具體的事物的。實際上對於科學革命化的科學的企圖是絕不能通俗的。然而若是科學的基礎一旦建立之後，那通俗化就容易了。若是時間有些騷亂的話，那我們也可以重新選擇這些對象之通俗的說明所要求的色彩的濃淡。然而我自然希望過德國的專門學者不會因體裁而完全忽視我的勞作。此外我已經獲得到一種無論如何不能使我滿足的經驗，就是，自己好久就努力於這種科學的，德國的黨友們，他們在私下裏寫信把我，對於第一本做過過分的誇獎，然而不會前進一點在接近他們的定期刊物上寫一篇批評，甚至連一篇介紹內容的文字也不會寫過。若說這就是黨的政策，那這種政策的祕密我却猜不透。

若是你時時把關於祖國的狀態寫信告我，那我將十分愉快。我們公然地向着一個革命進行——對於此事我自一八五〇年以來就不復置疑的。第一幕將包含着一八四八——四九年的各種蠢事之絕無生氣的復活。無論如何，現在這是一度世界歷史的運轉並且這是大家應當思索這種世界

歷史究是怎樣一種世界歷史。

敬祝新年幸福無量！

你的加爾·馬克思。

(註一) 我們這裏所發表的信件是馬克思寫給漢諾威爾 Hanover 一個篤敬的朋友古蓋爾曼博士，博士爲他盡過重要大的勞力，特別地是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以後，助其打破死守沉默的陰謀，倍於他自己的努力，博士是德國科學界中首先容納這個著作的。

(註二) Sometime 一馬克思對於英法文寫作與說話都同德國語文一樣地好，易於把那些語言（指英法語——譯者）的句子和表詞應用在他的德文著作之中。若是把牠全行譯出，那或者是有點拘泥了；若是通統不譯，有許多地方對於大多數的讀者或許是困難的。我們已經把那些在關係上是必要的並且我們認爲牠是一般所不知道的外國字譯出來了。

(註三) 國民經濟的基本原理。

(註四) “Luinta essentia” 爲拉丁語——五分二拍子，核心。

(精粹)

(註五) 馬克思自一八五八年以來給牠做文章。

(註六) 公事屋。

(註七) Conspiraton be silcnce.

(註八) Zertifikat.

貳

一八六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倫敦西北區，哈弗爾斯托克，希爾，邁特蘭，巴爾克
摩登拿，魏拉司一號。

高貴的朋友！

你將接到我今天從郵政寄給你的我所做的“Adress of the Working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一)六册。對不起請你送一份樣本給馬克亥姆(佛爾達)夫人並代致拳拳之意。米凱爾Miquel君處也請附送一部。

聯合會——或則甯說是，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是重要的，因為倫敦的Trades Unions(二)的領袖們在其中，這些人預備(三)極懇懇地招待嘉里波底(Garibaldi)并由聖詹姆斯大廳的 Monstre-Meetings(四)使巴爾麥斯頓對於 United States(五)的計畫歸於泡影。巴黎工人的領袖們也與之聯絡。

我最近數年來非常為(譬如最近十四個月又被疔瘡)病魔所苦：我的母親之死的結果，我的私人的境遇已因遺產

而改善。

我相信明年年底我的資本論(九百六十頁)的著作該準備好付印了。

爲什麼我自己在拉塞爾生時不參加他的運動的各種理由,你該是很明白的,不需我把牠endetail(六)臚列出來。然而無論如何這却不能阻止我——尤其是因爲與他極其接近的人與我有關係——在他死後對於這樣一個拉……不去保護他像護保那個哭泣的孩子加爾·布林德一樣。

我恐怕來年夏初或春季之中要發生意,奧,法的戰爭。這種事情對於法國與英國內部的與繼長增高的重要的運動大大的不幸。

我希望馬上聽得你的回音

你的最忠實的加爾·馬克思。

(註一)國際工人聯合會就職演說。這一演說,是於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以馬克思所已隸屬的臨時中央評議會的名義提出於奠定國際基礎的馬丁大廳Martins中所開的大會中並一致通過的。

(註二)工會。

(註三)嘉里波底曾於八六四年一春季聘問英國。

(註四)群眾大會。

(註五)北美合美國

(註六)詳細地。

參

一八六六年一月十五日。

倫敦，哈弗爾斯托克，希爾，邁特蘭，巴爾克，摩登
拿，魏拉司一號。

親愛的朋友！

.....(一)

我們的團體已經得到大進步。牠已經有三個正式的機關報，一個倫敦的“The Workmans advocate”，(二)一個布律塞的“La tribune de peuple”，(三)一個駐在瑞士的法國支部“Journ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Section de la Suisse romande”(四)(日內瓦)而德瑞支部的一個雜誌“先驅者”幾日之內就在貝克爾(J. P. Becker)的編輯之下出版。(通信處：日內瓦，摩來路六號貝克阿，有機會請你時時供給他一種政治的或社會的通信)。

把那唯一而真實的龐大的工人組織即自己老早地就特殊努力於工銀問題的英國“工聯”(Trades Unions)引到運

動之中，這在我們是一種成功。我們所建立以促進普遍 suffrage(五)之實施的英國團體(這個中央委員會之成立一半是我們的中央委員會的同人——工人)以這一工聯之助在三兩星期之前，開了一個大會，在這個大會中只有工人們說話。“泰晤士報”連續兩號內在牠的 Leaders(六)中談論這個會議，你從這裏就可知道這種效果了。

至於我的著作，那我現在每天十二小時從事於牠的騰清。我想在三月間把第一卷的稿子帶到漢堡並且趁此機會給你一閱。游斯塔士繆塞貴爵的繼任人(七)的跳梁行爲大慰我心。但是一個有幹才的人，怎該這樣無價值，他在同樣的瑣屑事情當中尋求滿足！

至關於畢爾格斯，(八) 那他可保是善意的然而却是弱。不過一年之久的光景，他在寬恩的公開集會上宣言(發表過的，在寬恩各報紙中讀得到)道：叔爾木戴理慈已確定地“解決了”社會問題而他(畢爾格斯)只是因為我的個人的友誼誤入了共產主義的迷途。照着這樣公開的宣言我不把他視爲“叛徒”能把他看做別的嗎？

你的忠實尊敬的加爾·馬克思。

(註一)有些關於個人的不重要的事件我們已把牠刪去了。

(註二)工人的律師。

(註三) 民衆講壇 (Volkstribune)

(註四) 國際工人聯合會新聞，羅曼尼亞瑞士支部。

(註五) 普通選舉權的。煽動的結果至少是家政選舉權 (一八六七年)，即在自己家屋或賃租家屋中的獨立操持家政之各理事人的選舉權的允許。

(註六) 社論。

(註七) 據此看來顯然指着米凱爾 (Miquel)，他是一八六五年俄斯拿布呂克 Osnabrück 的市長和俄斯布呂克 省議會議員。繆塞 曾經居過同樣的地位。

(註八) 畢爾格斯 是共黨同盟 的黨員，屬於一八五二年寬恩 共產黨大訴訟案的被告人並被判決六年要塞監禁 (Festungshaft)。

肆

一八六六年四月六日。

蘇蓋特，蘭賽爾斯布萊司 五號。

親愛的朋友！

後天我將從此地返倫敦。我的醫生將我發配到這個海邊地方，在這個地方我已經十分恢復自己的健康。……

從德國來的報告是少有令人滿足的。普魯士被俄國（和那拿巴特），奧大利被後者（在正當防禦之中繼續着討厭的事正多）襲擊。若是我們的庸俗之輩最後看到，沒有一個廢黜哈布斯堡朝 Habsburg 和霍亨卓倫朝的革命（對於那些小——小兒女們說到此事却是贅疣），終竟要重新走到三十年戰爭和德國的新的分崩離析！

從意大利方面來一個運動可以幫助普魯士。然而奧大利與普魯士只是為本身着想，那他們確實是不利的，不管牠所有的杜伯爾倫諾馬格（Düppel-Reuommage）怎樣。無論如何本耐德克（Benedek）是一個較勝於佛麗德麗希加爾王子的將軍。奧大利不消說可以強迫普魯士，但是普魯士却不能強迫奧大利 single handel（一）而進於和平。普魯士的每一個勝利都是對於那拿巴特使他干涉自己的一種鼓勵。

當我寫這個短信給你的時候，畢士馬克或許又已收練那種鋒芒亦未可知。然而那只是把紛爭遷延下去罷了。這樣的遷延依我的意見看來大半是可能的。

在那拿巴特，德國的這種擾亂是一個極大的幸運。他的地位是完全提起來了。然而戰爭將給他造出一種新的猶豫期間。

請你馬上寫信給我並且特別關於德國的各種狀況。

你的加爾·馬克思。

(註一)離散

伍

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倫敦

我的親愛的朋友！

我對於你的無論各種友誼的書簡都遷延地默不作答，你對之當然要惱怒的。

然而你應當以我所處的非常的境遇而恕我。因為我的久病的結果，我的經濟狀況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方。我已經債務叢積，這種債務積壓我的腦髓並且使我除了調攝我自己的工作以外一切事情皆不能做。若是我至少不能借到五釐利息的一千塔列，那我實在找不着出路。雖然我從德國各方面許得到許多承認的書簡，但我不知何所適從。我只能需要私人友誼的援助，毫不需要公衆的援助。你知道，在這種情況之下，寫信是困難的。

從新恢復我舊來對於美國的盛大的聯結，還沒有成功。

我們那裏有許多個人的活動可作，而大家對於各種歐羅巴通信的支給，視為一種生產的附屬的費用若是我自己移家於彼，那或則可以有濟。然而就我的天職說，則應留在歐洲並完成我多年的著作。

至關於這種著作自身，則我不相信，我在十月以前能以把第一卷（現成爲三卷）的草稿帶到漢堡來。我每天只能有極少數時間做生產的工作並且同時不要顧到弱體上的健康，若是願慮到我的家庭，那我沒奈何就應當決定遵守衛生上的限制至我完全恢復健康爲止。除此而外，工作又因受外界的不如意狀況的影響而常時停頓。

我雖然費許了多時間結日內瓦會議（二）做了各種準備工作！然而我却不能到會，而且不願意到會因爲我的著作決不能有長期的間斷。我以為我藉這種著作致力於工人階級比我親身參加大會議中所能做的一切任何事體（三）都重要得多。

歐洲的國際狀況我以為都是暫時的。至特別關於德國方面的事情則應使各事適如其分，就是說應用一種適合各種變化的情形的方法貫徹革命的利益。至於普魯士則注意追求並攻訐他對於俄羅斯的關係，（四）現在比以前更爲重要。

你的極忠實的加爾·馬克思。

(註一) faux fraio depraduction.

(註二) Der Genfer Kongress der gnternationale fano
Vom 3. bis September 1836 statt.

(註三) quelconque.

(註四) Relations to Russia to watoh and to denonce.

陸

一八六六年十月九日。

倫敦，哈弗爾，斯托克希爾，邁特蘭巴爾克，摩登拿
魏拉司一號。

親愛的朋友！

我希望就是我不應該從你的許久默不做答，推想到我的前信有什麼地方冒犯了你。事情恰恰相反。無論何人，一處窮窘之境，都有發洩他的胸次的需要。然而他也只有對他所特別置信的人們才能以發舒他的胸次。我確實對你担保，我的市民的各種事務，因為牠們妨害我的著作的完成使我苦悶比任何個人或家庭的理由更多得多。若是我明天要想

從事於一個實踐的職業以代替對於這種著述的工作，那我明天這種著述的工作就可以算是完了。我希望你對此種困厄愛莫能助的情況也同樣地不會使你難過。這或許是那一個完全沒有理由的理由。

現就一般的事情說一說罷。我對於第一次日內瓦大會非常驚訝。但是牠的結果之佳完全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在法蘭西，英吉利與阿美利加的影響是非所預期的。我不能並且不願意前往參加，但是我却起草了倫敦代表團的綱領。我起草這個綱領立意在於工人的直接瞭解和通力合作所許可與夫對於階級鬥爭和工人成為階級的組織之需要與以直接的培養和推動各點：（一）那些巴黎先生們的裝了滿腦子蒲魯東派的空幻的浮誇之詞。他們賣弄知識而一無所知。他們輕蔑一切革命的就是說發源於階級鬥爭自身的行動，即一切集中的社會的，因而又是由政治的方法（例如勞動時間之法定的縮短）所可以貫徹的運動。——

他們藉口無自由和反政府主義或反權力個人主義（二）——這些先生們，他們自十六世紀以來就那樣安安靜靜地忍受了並且在忍受着那種悲慘的專制主義！——實際上是宣揚資產階級的普通的經濟只不過是蒲魯東式的理想化罷了。蒲魯東惹了非常的禍害。他的似是而非的批評與他對於烏托邦主義者（當在傅利葉，歐文等等的烏托邦之

中也是一個新世界之觀念與空想的表辭時，而他自己不過是一個庸俗的烏托邦主義者）首先感動並誘惑了頭角嶄嶄的少年，學生，其次工人，特別地是那些莫知所以“簡直”是屬於舊染之污的奢侈工人的巴黎人。他們無知，空說，僭妄，多言，唱高調，妄自尊大，主要是在消滅一切，因為他們迅速增加即絕對不與他們的會員的數目相比率的赴會的數目。我將在報告之中暗暗地打擊他們。

同時巴爾提摩 Baltimore 的美國工人會議大快我心。反對資本之鬥爭的組織是此地的口號，而值得注意的是我所給日內瓦提出的各項要求的大半均同樣地在那裏為工人出自正當的本能所提出。

我們的參事會 (quorum magna pars) (三) 在此地所創立的改良運動 (Reform leewegung) (四) 現在已經正在風行無阻地越發推廣起來。自從牠進行以來，我自己常是保持旁觀並不對於此事發生什麼關係。

你的加爾·馬克思。

再者。工人報 (Der "Workman") 是一個庸俗的報紙，對於我們沒有什麼用處。公益報 (Der "Commonwealth") (五) 屬於我們一班人的，然而暫時 (半由於經濟的理由半由於政治的理由。) 變成純粹的改良的機關報。

我在短時間讀了“莫一林博士(Dr. Moilin)的：生理醫學講義 (Lacons de Médecine Physiologique)，(六)牠是一八六五年出版的；其中有許多妄想並有太多的“構造圖”，然而也有許多對於舊來的配藥法的批評，我希望你一讀此書並把你的意見詳以告我。我並介紹特賈戀 (Tremaux)的：“萬物由來”(De l'origine de tous les etres etc) (七)給你。雖寫得浪費筆墨，充滿着的地質學上的錯誤，許多文學的，歷史的批評的缺點，然而牠總(with all that and all that)包含着超過達爾文的一個進步。

(註一)在日內瓦會議裏面因總參事會的提議遂討論和決定以下各問題；國際的規則與組織；國際的工作統計的準備，關於經常工作時間，童工的限制，適當的學校教育的實施，同志協社，職工會，直接稅與間接稅的專制主義的俄國之關爭的民主波蘭的恢復的必然，備軍的各種決議案的準備。已經被採納的各種決議還要由我們差不多逐字逐句的承認並且今天那些個極明晰，極精確的還是那用少數章句表現此等問題的文件。

(註二) Anti-Autoritäts-Individualismus, 即 Staatsgegenschaft.

(註三) 最後一字被刪去沒有讀出來；這是與來自嬰兒老兒歌 安奈斯 (Virgils Aeneis) 的引句； Quornm magna pars fui, 即

“wobei ich ein gutes Stück Arbeit leistete”有關。意即：我在其中做了一種好工作（譯者。）

（註四）獲得普選權的選舉的改良運動。

（註五）Gemeinwohl.

（註六）Vorlesungen über physiologische Medizin.

註七）Vom Ursprung aller Wesen.

柒

一八六六年十月十三日星期六，

倫敦。

親愛的朋友！

因為我要馬上回答你並且因為你的信恰巧是在郵局關門之後到來（而明天星期日從此發出的信件又寄不出去），所以我想將我的受損害的信件（一）的大要用少數語句總括地說一說。（這種信件的隱匿着實使人不快，因為他決不願畢士馬克君曉得我的私事。若是他希望知道我對我的政策的意見，那他可以直接寫信問我，我一定侃侃而談。

因疾病纏綿與因此而起的許多必需之費的結果，我的

經濟狀況愈加變壞了，一種財政危機在最近的將來就會光降，這一危機牠除掉對於我及家庭之直接的影響外，而在大家應當保持體面的倫敦這個地方，簡直使我在政治方面也受損害。你這一方面我所要知道的是：你可知道有任何人或任何幾個人（因為這種事情不必要公開的）能以五厘至六厘利息借給我一千塔列至少以兩年為期麼？我現在所借的許多大借款，付出利息是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然而就是這樣對於債主我畢竟不能久持，因此我的家庭一齊場台的事已經臨頭了^{*}。自從我上次給你的信以來我的經常之病又復發，因此我只能十分繼續地作理論上的工作（國際聯合會的實際工作依然照常進行並且牠是偉大的，因為我實際上是在領導這個團體全部。）下月我將我的著作的起首各頁寄給邁斯納（Meissner）並繼續地工作一直到我帶着其餘稿件到漢堡去為止。無論如何我要趁這個機會來看你。

我的境遇（身體的和普通的阻害繼續不斷）使我感覺着第一卷應當先出版，不應如我從前所企圖兩者一齊出版。雖然，現在這個著作大概是三卷。

就是全部著作分為下列三部分：

第一冊 —— 資本的生產進程（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 我翻譯這書時，曾參考李季先生的馬克思傳中編二五四頁。譯者。

第二冊——資本的流通進程 (Zirkula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第三冊——全體進程的各形態 (Gestaltungen d. Gesamtprozesses)。

第四冊——學說史 (Zur Geschichte der Theorie)。

第一卷包含着前兩冊。

第三冊，我想將牠充做第二卷，第四冊則充做第三卷。

從新起頭在第一冊中即我在董克爾 (Duncker) 那兒出版的著作再把牠賅括地在論商品與貨幣的第一章中敘一敘，我已經認為是必要的。我所以認為是必要的，不僅因為要美備，並且因為頭腦清晰的人自己不能完全正確地理解，就是對於第一次的說明不能不有些缺陷，特別的是關於商品的分析……

倫敦英國工聯的會議 (二) (牠的祕書是我們的主席亞德加 Odger) 目下在徵求下列的意見：牠應否宣言承認自己為國際聯合會的英國支部。若是承認的話，那此地的工人階級的指導權在一定意義上要移轉到我們手裏並且我們可以十分地“推進”(push on)這種運動。

敬禮

你的加爾·馬克思。

(註一) intercepted letter (就是被留難的) 這就是指着

古蓋爾曼曾因旅行至十一月二十七日才接到的九月二十三日的那封信而言。

(註二) London council der English Trades Union, 德語爲 Londerrer Gewerkschaftskartell.

捌

一八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倫敦。

親愛的朋友！

倉卒數行如下：

- 一。 謝謝你的努力，
- 二。 表示我歡迎這些信和歡迎以前的各信一樣。
- 三。 你誤解我和昂格思的關係。他是我的至友。我對於他絕無祕而不宣的事情。沒有他，我好久就不得不開始去謀“職業”。我決不希望有任何第三者干與我和他的關係的情形。他自然也只能在一定範圍之內盡力。
- 四。 耶可畢 (Jakobi)，如工人們寫信給我所說的，是一個極好的市民，因此他絕沒方法以我的私人關係相

擾。(一)

我應體察我所做爲，然而我知道你之能力所能及的，你都盡到了，所以我希望你把這種事情當做已經過去了罷。

我不在“公益報”上做文章了。

你的加爾·馬克思。

米凱爾一派(Miquel Co.)可以長期地等待，一直到他們做了普魯士的大臣爲止。

(註一)若是此地要改到的輸，耶可畢的事，則馬克思後來把他對於他的批評已經修正過了，爲從一八七十年的一封還待發表的與他的信中推讓出來的。

玖

一八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倫敦

親愛的古蓋爾曼！

請你注意，你能否把下面的質問書(一)送到“北德意

志報”(Zeitung für Norddeutschland)去登載,若是牠拒絕的話,那就送到漢諾威爾其他報紙!這件事對於我是重要的,因為我三兩星期之內,實在要到德國旅行。全部注意紀錄(Notiz)都有斯提伯(Stieber)的臭味。

在最近幾天我把關於日內瓦會議的正式的報告寄給你,牠現在在當地的一個報紙上用英,法文字按號發表。“公益報”完全宥於改良運動(reform Movement)。牠的編輯之權掌在十分拙劣的人的手中。我們雖然可以以股東資格出而干涉,然而我們有暫時放任的各種理由。

我們的團體近來與邦拿巴特氏起了各種爭論。越到最近越多。對不起,請你告訴我,李卜克內西在做什麼並潛藏何處。

你的馬克思。

(註一)質問書如次:致“北意志報”編輯。我以為五五二二號的貴報所載後十分之八陷於惡感的注意紀錄:

“居住倫敦的馬克思博士……好像時運來了要旅行大陸(指歐洲大陸而言。譯者)爲此事變(最近的波蘭叛亂)做宣傳似的”

是一種我所不知其爲何種事件之警察的陰謀製造品。

一八六七年六月十日，

倫敦

親愛的朋友！

這封信的遲滯或許多少有幾分理由使我爲成一個“壞傢伙”的嫌疑。我只有如下的事實做減輕罪愆的理由，就是我幾日以來才“居住”於倫敦。在這個中間我曾到曼卡斯特和昂格思同住。但是你和你的親愛的夫人現只要通常地找出我的久疏簡候的罪過的理由，就足夠認識我了。無論如何我從前每天都在你們跟前。漢諾威爾的淹留，我認爲是生活的荒漠之中極華美和極快樂的沃土。

在漢堡除了我無論如何防範，竟爾與威兼馬爾相識以外，絕不會做過其他危險的事情。照他的個人的丰儀看來，他脫胎而爲基督教督的拉塞爾，自然是更少價值。當我還在住在彼處的幾天之中，倪曼氏 (Herr Niemann) 雖然也曾來談笑。然而我太被漢諾威爾的社會的奢侈之習所染，以致要同少數好的伴侶前往觀劇以爲常。於是倪曼氏就離開了我。

.....
從漢堡到倫敦的海程頭一天的天氣有點不大好，其餘

完全都算是好天氣。有一個德國的女郎，因她的軍人的態度惹起我的注意，未到倫敦的數小時前她宣稱當晚她就要從倫敦啓行到威斯頓蘇普拉邁爾 (Weston supra Mare) 去，並且對於她所攜帶的許多行李不曉得怎樣處置。碰巧，安息日那天在英國正缺少相助，更是倒霉。我自己承認到那位女郎在倫敦上車的車站去。朋友們曾把這個車站名字同樣地寫在一個卡片上了。牠是在西站之北，這個車站也是我所要經過的。於是我就好像一個好騎士獻身於那位女郎以代她之勞。這種獻身是被接受了。然而當仔細思量之後，我覺得威斯頓蘇普拉邁爾是在西南，而我所要經過並人家寫給那個女郎的車站恰恰相反是在西北。我曾訪求過船主的。不錯，那她所去的地方恰恰是倫敦的一個和我相反的區域。但是我一旦應允，就不得不做成好好的樣子來幹這個不稱意的勾當 (bonne mine à mauvais jeu)。(一)我把那位迷途的女郎帶到她上車的車站，她的車晚間八點鐘方開。那我現在就有責任了，於是就同這位小姐到海德公園去散步，坐在飯館裏等等，白費了六小時工夫。結果才曉的，她名叫伊里沙白蒲特加麥貴爵 Clisabeth von Puttkammer 畢士克馬克的姪女，他曾在柏林和他同居幾個星期。他隨身帶有全部的軍隊入名簿，因為“我們這樣勇敢軍隊”的家庭就是充分地供給高貴身段的貴爵的。她是一個活潑而有教育的少女，但

是貴族並且臉上的黑白癍點直到鼻端。當她曉得她是落在“赤”黨的手中 (in “rote” Hände) 她毫不驚訝。然而我們的邂逅已經“平安無恙”地過去了，這是我使她快慰的，而她也活潑而健康地啓行到她的目的地去了。你想，這在布林德與其他俗流民主主義者看來是我和畢士馬克的陰謀的怎樣的好材料！(二)

我今天已經寄去二二四頁的修正稿。這個稿件大半是我從昂格斯那裏取來的，牠對於這個著作非常滿意，特別地有四五十頁他發見了牠寫得十分易於了解。他的批評使我安慰，因為我的著作常常使我不滿足，特別地是當開創的一種見解的時候。

再會！

你的加爾·馬克思。

譯者附白：我本打算把這本書信集中從“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的信”以後，擇譯出來以饗讀者，因為自此以後的信包含着“對於馬克思主義之博大精深的知識之優越的興趣。”但因前面有一封關於馬氏與畢士馬克的一段間接的故事，不忍舍去，故從頭譯起。

寒光。

(註一) Gute Miene Zmn bosen Spiel.

(註二) Komplott mit Bismarck.

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十五月初版

動力 第一期 實價大洋六角

編輯者 動力編輯社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河南路
第六十號

代售者 各省神州國光社
各大書局

本誌預定價目表

期數	價目	郵費	
		本埠及國內	國外各埠
每月一期	六角	五分	二角
半年六期	三元四角	三角	一元二角
全年十二期	六元	六角	二元四角

郵費掛號照加